

政协青龙满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青龙文史资料

第　五　辑

政协青龙满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政协青龙满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前　　言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倡导而创建的，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开辟了近现代历史资料积累的新领域，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惠及未来的文化事业。它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江泽民同志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我县政协已经征集出版的1—4辑文史资料表明，它起着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弘扬民族精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为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着翔实可靠的本乡本土历史知识，它对于全县人民了解青龙，热爱青龙，建设青龙，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良好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青龙文史资料》第五辑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在各位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以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与读者见面了。在本辑中重点安排了民族、经济、文化、卫生、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诸方面的文稿，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青龙地区虽然历史悠久，由于建治较晚，且屡次变动，积累下来的资料很少，给征集、研究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增加了难度，这就更需要市、县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把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和熟悉的有关近现代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民族、宗教以及民情民俗名胜古迹、名人业绩等宝贵资料，本着求实的原则，整理出来，提供给我们，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文史资料的征集过程中，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从迢迢千里之外的异地，从工作条件很差的农村，撰写并寄来文稿，为我县文史资料的研究出版，提供了丰富的“三亲”史料；在编辑出版《青龙文史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许多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经验不足，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青龙文史资料》办得更好。

政协青龙满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1年12月

目　　录

满族溯源及青龙满族历史概况

刘玉宗　杨佐琪

一

满族，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她的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已有三千多年。在近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满族和他的先世，曾三次建国，两次为朝，在祖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早在五十年代就多次提到：满族是一个有本领的民族，是值得佩服的。满族从白山发源，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清朝全盛时期，约有四、五百万人，今天我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从清朝继承过来的。因此，我们应当学习满族的历史，全面正确地认识满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

（一）从肃慎到靺鞨与渤海王国的建立

满族是最早开发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而满族的名称则是到明朝末年才出现的。满族的流源可追溯到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肃慎人。在先秦文献中的《尚书》、《竹书纪年》、《左传》、《国语》中都有所著录。《竹书记年》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郑玄注："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肃慎和周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关系。《国语》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

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①这段记载说明周武王时，肃慎曾贡献楛矢石砮，表示友好和臣服。《左传》鲁昭公九年记载：“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说明周王朝承认肃慎和燕、亳一样是属其管辖的北方领土。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肃慎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中上游和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早期曾以狩猎经济为主，“楛矢石砮”则是他们特有的武器和工具。春秋战国时代，在肃慎人分布居住的广大地区内，社会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松花江中游及牡丹江流域的肃慎人，已经处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而生活在黑龙江流域至滨海地区的肃慎人，却仍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或更为原始的阶段。

汉代以后至晋朝，肃慎被称为挹娄。《后汉书·挹娄传》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扶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及。”②当时挹娄大体分布在今牡丹江、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和苏联沿海各洲广大地区，社会发展缓慢。汉朝以后，挹娄人曾遭受扶余的压迫和剥削，也进行过不断的反抗。到三国初年，终于摆脱了扶余奴隶主的统治。

南北朝时，挹娄又称勿吉。《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国在高丽北，旧肃慎国也。”③这时的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除狩猎外，还从事农耕和家畜饲养。勿吉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甚为密切，朝贡常常一年数次，人数有时多达五百人。

到了隋朝，称勿吉为靺鞨。《旧唐书·靺鞨传》记

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④当时的靺鞨有数十个部落，其中主要部落有七个——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白山部、黑水部、粟末部。

靺鞨与中原的关系较它的先人更为密切。自北齐至隋唐间，靺鞨各部多次派使向中原王朝进贡。隋炀帝时，徙居营州的靺鞨族首领突地稽，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唐初，因功封突地稽为耆国公。不久唐太宗拜其为右卫将军，封燕国公。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王朝已将黑水靺鞨地区划为地方行政区，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设置了勃力州（即伯力，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设置黑水州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从以上事实看，靺鞨居住的广大地区已是中原王朝疆域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唐朝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在营州（朝阳）设营州都督，营州成为唐王朝统治东北的中心。公元698年，突厥入侵唐王朝，占据了妫、檀、定、赵四个州，截断了中原到东北的道路。大祚荣乘机率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向东进军，回到长白山东北和牡丹江上游一带（原为挹娄故地）。在中原接受了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影响的大祚荣，在东牟山下建立了都城（今吉林省敦化县的敖东城）。公元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建立了以靺鞨族为主体的国家。公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这一地方政权的建立，揭开了靺鞨各部历史的新页——即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的新时期。在二百余年各部落不断发展、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新的

民族共同体。渤海王国从大祚荣建国，经过武王、文王到第十代宣王时，统一了靺鞨各部，成立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疆域包括现在吉林省的绝大部分，黑龙江省的大部分，辽宁省的一部分，以及苏联滨海地区和朝鲜北部四道的大部分。由于它的幅员辽阔，政治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被誉为“海东盛国”。

九世纪末，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发展变化，渤海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公元９２６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大军进攻渤海国，末王大諲譔投降，渤海国灭亡。渤海王国前后更换十五个国王，历经２２９年，时间上大体与唐朝相始终。

（二）女真族与金王朝

渤海王国于公元９２６年灭亡后，靺鞨人南迁，移居到渤海故地。据《文献通考》记载：女真一名在唐贞观年间已为中原所知，女真是古肃慎人，五代时才称为女真。这说明，靺鞨人改称女真是在五代(公元９０７—９６０年)。实际上女真族并非是靺鞨在五时简单的名称改变，是以靺鞨人为主体，与渤海遗民及其他部落或部族杂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女真族分布地域广阔，南至辽南；东至图门江、鸭绿江流域和松花江上游；北至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下游；东北至海及库页岛等地的广大地区，都分布着女真的各个部落。

辽王朝时期，把女真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分布在松花江以南地区，生女真分布在松花江北岸、黑龙江中下游直达于海。生女真最为强盛，分成许多部落，此时的生女真地方千里，户口十余万，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内

部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原属于黑水靺鞨一支的生女真完颜部，在几个部落的混战中，逐渐强大起来，在十二世纪初统一了生女真各部。完颜部的统一过程，也是其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即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辽王朝对女真族的统治和掠夺是很残酷的。据文献资料记载，女真不仅要向辽贡献人参、貂皮、黄金、名马、海冬青等，而且还要承担辽派往女真各部的使者、地方官员的各种礼物及摊派，因此引起了女真族对辽王朝的反抗。完颜阿骨打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杰出首领，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立了金朝。1125年金灭辽，1127年灭北宋。随着辽和北宋的灭亡，女真族也陆续迁入中原。在中原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汉化过程，到金王朝后期，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差别就大大缩小了。

金亡以后，留居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转而为元朝统辖。元末明初，居住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纷纷向南迁徙。由于在几百年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几经迁徙，分布地区出现了新的变化。据明朝万历年间《明会典》记载：当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东海三部分。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明开原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一带。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东海女真主要分布在建州、海西女真以东、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至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

明代女真的发展不平衡，东海女真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农业经济处于萌芽状态，海西、建州女真以农业为主，已

进到阶级社会，出现了奴隶主与奴隶对立的阶级关系。

（三）满族与清王朝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女真各部，特别是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各部的奴隶制经济日益发展，奴隶主阶级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出现了互相残杀，战争频繁的混乱局面，这就形成了女真各部要求统一的趋势。在这样动荡不定的年代里，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顺应形势的需要，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努尔哈赤具有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从1583年起兵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把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鸭绿江畔分散的女真族全都统一起来。

在统一各部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建立了亦农亦兵、兵民为一的牛录——八旗制度。牛录原是女真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进行，每十人由一人为首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把从战争合并来的各部落中的诸申、伊尔根（平民、百姓）统一组织起来，规定三百人编一牛录，每牛录设一牛录额真（佐领），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每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汉语译为旗，首领为固山额真（或称固山贝勒，后改称都统）。

1601年努尔哈赤建立四固山（即旗），此四固山旗纛颜色都是纯色，后称正黄、正白、正红、正兰四旗。1615年又增四旗，所用旗纛分别在黄、白、兰旗上镶红边，在红旗上镶白边，这就是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合称八旗，又叫满州八旗。八旗之间各树一帜，互不统属。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并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其他六旗

均由努尔哈赤的子弟统领。八旗制度具有军事、政治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由于八旗组织严密，纪律严肃，令出即行，奖惩分明，八旗兵一旦立有战功，升擢很快，因此八旗兵作战勇敢，有着很强的战斗力。

随着统一事业的完成，八旗制度的建立、满文的创制，努尔哈赤于１６１６年称“英明汗”，建立了“后金”。它是大清王朝的雏形。后金的建立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后金的统治时期，由于统治区域不断向南、向西推进，政治中心曾几度迁移。１６２１年由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迁至东京城（今辽宁省辽阳市郊），１６２５年迁至沈阳。１６３５年皇太极废除诸申（女真）的旧称，定族名为满洲。次年即帝位，定国号为“大清”。

随着辖属的汉人和蒙古人的增多，从１６３３年起，先后增编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与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力量。１６４４年，清军进关，清朝也由沈阳迁都北京，满、汉、蒙八旗军队绝大部分相继入关，他们的眷属也弃置故土，分批南下。到清朝中叶，八旗驻防星罗棋布，满族的分布也普及全国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八旗，并不是说满洲八旗里都是纯一色的女真族，事实是，从一开始编旗，一旗之内的成员情况就很复杂，只不过满洲八旗中原女真族占绝大多数。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编入满洲旗份的汉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因年代久远，长期共处，其精神面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和语言文字，与满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遂被视为满族成员。而满、汉、蒙八旗成员，在辛亥革

命以前近三百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于聚居共处和经济生活的频繁交往，其互相依赖的程度及各方面的交流和影响，也日益增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是构成满族的核心部分，在满族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成份。因为满族隶属于八旗制度之下，所以也称为“旗人”。其实明末女真人也未完全成为后来的满族，部分边远地区的女真人，就未纳入满族的共同体，他们就是今日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祖先。

皇太极时期，削弱王权，集中汗权，太宗皇帝独掌正黄、镶黄、正兰三旗，称为上三旗，其他为下五旗。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滚死后，对八旗旗主做了调整，在上三旗中剔除正兰旗，纳入正白旗，归皇帝自将。下五旗是：正红、镶白、镶红、正兰、镶兰，归诸王公管辖。

满洲贵族进关后，在畿辅各地扩大农奴制生产方式，圈占汉民土地十六万多顷，一部分被满族皇室、王公、贵族占有，建立农奴制庄员，称为皇庄和王庄。其他大部分赐给八旗官员、兵丁，通常称为“旗地”，以与皇庄、王庄相区别。

1667年康熙亲政以后，作了一些改革。永停圈地，实行奖励农民垦荒等项政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各族人民获得比以前较好的生产条件，全国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十八世纪中期，全国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手工业的产品都有显著增加和提高，资本主义萌芽有新的增长，超过了明代发展水平。在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反对分裂祖国，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保卫边疆的斗争中，满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

青龙满族自治县位于燕山东段，长城北侧，是河北省东北部的一个山区县，总面积为３５０８平方公里。这里居住着满族、汉族、朝鲜族、苗族、蒙古族、回族、壮族、侗族、藏族、白族、瑶族、土家族等１２个民族。全县总人口为５１６７８９人，少数民族３３６９８５人，占全县人口的６５．２％。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为３３６０７１人，占全县人口的６５％（１９９０年９月人口普查统计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满族的历史概况综述如下：

（一）康熙手谕

青龙于１９３３年建县，县龄虽短，历史却很悠久，从古至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周朝至元代，这里先后居住过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直至明代，朱元璋为保卫边疆安全，派兵将蒙古人击退，沿长城以北２００华里划为中立地区，汉蒙两族人民均不得在此居住，致使这里土地荒芜，草木丛生，成了山禽野兽成群出没之地。

清王朝定鼎北京统一中国后，清廷为解决随帝入关的旗人的生计，顺治初年颁行圈地令，当时指定的圈地范围，只限于近京州县无主荒地和明朝皇室勋戚所遗庄园。但在执行中很多有主土地被圈占，造成汉民流离失所。当时有识之士纷纷向朝廷建议，请求允许关内百姓到关外开荒种地。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兵部给事中刘鸿儒上书朝廷：“今

喜峰口、冷口诸关外，大宁以南一带地方，弥远千里，咸称膏壤，请令民愿出边开荒者，许以为己业，永远承种沃土。数年后，渐次起科，成聚成邑，堪作神京之保障。”⑤但是，这一良好建议未被采纳，直至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春又圈民田，京畿一带百姓迁徙，多至失业，非委身于沟壑，则走险于绿林。康熙为抚慰民心，安定天下，于同年六月十七日手谕户部：“……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者，悉令退还民间，尔部速行晓谕，昭朕嘉惠生民之意。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将古北口等口外空地拨给耕种。著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⑥户部接旨后，急速派人到古北口等口外勘察，于康熙九年二月上表奏道：“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于镶黄旗、正黄旗，罗文峪口外地拨给正白旗，冷口外地（今青龙一带——作者注）拨于镶白旗、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于镶红旗、镶蓝旗。”⑦康熙帝准奏，晓谕随帝入关的有功部下：“汝等赴关外对所有未垦之地跑马占圈，一日之内统一周者均给汝等。”⑧于是各旗按照户部所拨地区，遵照康熙口谕，纷纷到关外“跑马占圈”。

（二）赏赐皇亲

清廷为皇亲俸禄计，曾把冷口外部分土地以王租、祭田等名目赏赐给他们，以减轻朝廷负担，皇亲受赏后，便派“皇粮庄头”带领庄丁出关占地，由皇粮庄头驱使庄丁耕作，并将租税按年交给皇亲。

青龙大石岭乡小岭东村王家，其祖先么道侯王某属正蓝旗，系清太宗皇太极的驸马。其妻固伦公主死后，顺治皇帝便将冷口外部分地方赏给王某作为固伦公主的祭田。当时王某并未派人出关。直至康熙九年，大批旗人来这里占地后，

其后裔才派王进昌、王进灵兄弟二人率领庄丁出关，王进昌占冷口，王进灵占草碾，双双为掌管公主祭田的“皇粮庄头”。这个“皇粮庄头”一直传袭到民国年间。现在，王进灵的后代还保存着一份《皇粮庄头执照》，其文云：”自国初顺治年间，蒙世祖皇帝恩赏公主祭田，地方座落在永平府迁安县之冷口外草碾等地方，除另派遣家人取租差外，所有草碾房间地亩，历年共交租差银壹拾伍两整，除去另派王庆，王棋交纳租差七两五钱外，其一半租差七两五钱，着派王宽充当庄头之差，于历年十月十五日自行进京交纳，不准拖欠。倘不遵谕，革除另派。自谕之后，各佃亦遵照限期交纳，勿许延抗，如敢故违，即行惩办，决不姑宽……”

田庄制度在清初是落后的农奴制度，因为满族在进关前还处在早期农奴制度阶段。清统一中原后，又把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带入关内。八旗宗室设在畿辅山海关外、张家口外、冷口外的田庄达1335所之多，设在青龙境内的大约有100所左右。清廷规定，每庄庄丁10名，选1人为庄头，庄丁繁衍留于本庄，缺则补足。庄丁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耕种所获全交庄主，为保证田庄有较足够的劳动力，清廷曾颁布《投充令》，强制汉人到清廷贵族的田庄上劳动。投充汉人因不堪庄头的剥削，时有逃亡。于是清廷又颁布了《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⑨这些法令虽严，但无济于事，终于迫使清廷不得不把奴隶制生产关系转变为封建制生产关系，庄丁成佃户，建立独立经济，每年按额交租。王进灵后代保存的《皇粮庄头执照》，就是满族奴隶制生产关系转变为封建生产关系的最好例证。

（三）奖励军功

自户部按照康熙手谕把冷口外土地拨给镶白旗和正蓝旗以后，二旗对帝有功者纷纷出义院口至冷口之间各关占地。

居住在青龙南部三岔口，官场一带的正蓝旗董家，其祖先董宜道系辽宁铁岭董家堡人，其子世祯、世杰、世英弟兄三人随帝入关，杀进北京，攻取西安，抚定河南，克服杨州，先后降文武官员２４０人，降马步兵３１７７００人。后来又遇茶汉王造反，董家弟兄再次出征，迅速拿下松江、大凌河、锦州等处，活捉茶汉王，扫灭其国。继而又征朝鲜王，因董家军威名四震，朝鲜王闻风而逃，董家弟兄追至南汉，生擒朝鲜王而回。因其战功卓著，得功牌数十面。后来吴三桂背叛清廷，董家弟兄又率子侄文献、文理、文通、文昌等１０余人随主南征，一路上平定浙江、金华、福建等处，扫灭吴三桂，又得功牌１０余面。天下大定以后，清廷按功行赏，恩赐董家行圈占地，使后室子孙永沾皇恩。他们除在关内滦州（今滦县）、昌黎占了部分土地外，又出关占了刘家口、徐流口、河流口、青山口、桃林口五口之外大部土地。董家子孙为了纪念祖功，在官场建起祠堂，供有祖先的刀枪，弓箭和血衣，每逢年节，后世子孙都到祠堂祭奠。

出冷口圈地来的正蓝旗有李、冯、于、翟等姓，他们圈占了青龙北部和中部等地。李、冯二姓住在蒿村一带。李家二世祖李明诚系清代六品文官，其夫妇身穿官服的巨幅画像至今仍保存完好。于、翟二姓住在大巫岚一带，其中翟家祖先翟春艳住在大院村，其院深华丽，人称“翟家大院”，大院村即由此得名。翟春艳是庄头总管，俗称“庄头搭子”。三岔口、双山子、土门子一带正蓝旗庄头统统归其管辖。他立号“九思堂”，堂上悬有黑红二鞭，用以刑讯佃户，乡里十分畏

惧。大门外竖有上马石和下马石，经其门者必须下马。至今，翟家仍保存着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二月初四平泉州发的《简明户单》6份，上边标有所辖地域界限和应交地租数量。

上述董、李、马、于、翟等正蓝旗庄头皆系豫亲王所派，庄头收齐地租后交给总庄头，总庄头收齐后交给豫亲王，故清代《抚宁县志》载："口外四堡（即双山子堡、杨树窝棚堡、哑叭庄堡、大榛椤树堡——作者注）拨为正蓝旗豫亲王圈地，隶抚宁版图。"

（四）出关狩猎

清代《永平府志》载："口外野兽有元貘、巨虚、虎、熊、豹、黄羊、野猪、豺狼、猴、猨。八月，义院口温泉堡外辄有猴数万至，尔月乃去，农家苦之。"

口外禽兽繁多，清廷早有所闻，为了满足奢侈生活，早在顺治年间内务府就曾派"三肖（即三户姓肖的，以下与此同）四邵五马一支杨"来冷口外猎取野鸡，时隔不久，被调往遵化马兰关。直至康熙九年，才又派正白旗１２名千总各率１５０名旗丁来这里猎雉开荒。这些千总和旗丁共分张王李肖、佟宋满高、刘杨谢马、金于崔邵十六大姓，他们圈占七道河、高丽铺、肖营子、娄子店等大部地方。这些千总实行世袭制，他们除轮流到内务府值班或当差外，主要是管好所属旗丁。男子成丁（年满１６岁为成丁）或死亡，都及时上档或注销，报内务府备案，一旦国家有事，即可随时应征。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既然户部已将冷口外拨于镶白旗和正蓝旗，为什么不叫他们狩猎又另派正白旗呢？这是因为在八旗制度中，正黄、镶黄、正白属于上三旗，亦称内务

府三旗，凡禁卫侍卫等职皆由内务府三旗充任，猎雉属于内务府卫班鹰户之职，镶白、正蓝二旗没有资格充任，只有另派正白旗。

正白旗十六大姓在圈占的土地上自耕自种自食，不纳税租，唯每年要向京师内务府都虞司御膳房缴纳７４２０只野鸡，当时称为“雉税”，也叫“野鸡捐”。为完成此捐，每名千总手下设１０名鹰手，专司猎取野鸡之职。活鸡每年各交雌雄一只，冬至前送到，备天坛祭祀之用；其余全交死鸡，每年分冬、腊、正、二月４次交纳，由千总亲自压送北京，车上竖有三角形黄龙旗，上书“御差”二字，沿途州县见到此旗必须及时护送。

初出口时，猎取野鸡极易，后因人口不断繁衍，荒地多被开垦，林木多被砍伐，山禽野兽逐渐减少，故单靠鹰手很难完成雉税任务。鉴于这种情况，千总不得不把雉税按照地亩多少摊给各户，由各户自行设法交纳。到光绪年以后，野鸡愈趋减少，各户亦无法完成此税，遂又改为折成银两交纳。开始时，活鸡每年随市价高低折算，死鸡则每只固定交一吊钱；以后变为不管活鸡死鸡，统由千总一人任意折算。从而，雉税成为肖营子一带正白旗满民的沉重负担。

（五）奉命垦荒

按照户部康熙九年二月的奏表，拨给镶蓝旗地域在张家口外。但因张家口外空地不足，故而一部分镶蓝旗满人奉命来冷口外垦荒，居住在王厂等村的王、郑、邢、龚等姓就是这部分满人的后裔。

当时，由１名前锋率领２０余名骁骑及其子女，来到都山南麓圈占了南北长５０华里，东西宽４０华里的坡岭和荒

滩，这里山势高峻，峰峦起伏，较平坦的河川地仅有15华里长。他们议定五里一村，遂由东往南建立三村，邢、蓝等姓住的村庄取名为“邢厂”，王、郑等姓住的村庄取名为“王厂”，龚、杨等姓住的村庄取名为“龚厂”（今误为“公厂”）。为了处理三村各项事宜，他们在三村中间的王厂建立武备衙门，衙内竖有“红黑漆棍”，专门用来处罚违纪骁骑和庄丁，当时流传着“红黑漆棍，打死勿论”之说。

康熙帝亲政以后，“三藩”割据势力叛乱，沙俄在东北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在西北勾结蒙古准噶尔丹汗进攻内外蒙古。至18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勾结西藏封建地主武装侵略后藏。在这峰火四起的几十年里，八旗制度始终保持具有军事、政治、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满族自牛录额真（满族社会的基层行政组织负责人）以下的八旗壮丁，坚持三丁抽一，披甲当兵，余者务农，狩猎，交纳贡赋。战争频繁时，则都要应征入伍，这就是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传统。八旗出征时需要自备马匹、器械、粮秣，因此，邢厂、王厂、龚厂三村骁骑，除垦荒种地外，还要饲养战马。他们把邢厂东部一带碧草繁茂的地方作为三村公用牧马地。

康熙帝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平定了“三藩”之乱，亲自率领八旗军队打败了噶尔丹，在黑龙江流域击败沙俄的入侵，自此，国内较长时间太平无事。从而旗人对八旗制度日趋淡漠，渐渐由原来的军事、政治、生产兼而有之的组织形式转变为单一的生产组织，旗人由原来的亦军亦农转变为单一务农。既已不再外出打仗，战马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作用，于是，王厂三村旗人的公用牧马场，渐渐被开垦为耕地，并在这里立村定居，“牧马村”便由此得名。

（六）驻军屯田

青龙土地被满族皇室、王公、贵族圈占，分别建立“皇庄”和“王庄”以外，其余一些地方则赐给了驻防长城各关的八旗官员和兵丁，这部分土地称为“官员田庄”和“兵丁份地”。

青龙东部的干沟、木头凳、龙王庙一带多属于驻防山海关军的屯田之地。设置在这一带的庄头大部分是辽沈随军而来的汉军八旗。初时由关内招募汉人来此耕作，后渐渐把土地租给他们，庄头负责收租，然后转交驻防山海关的田主。木头凳镇大杖子、响水、北台子、牛角沟等村的周、林、匡、李、丁姓都是庄头，他们持有印着“康龙凤”、“上至青天，下至清泉”的《红契大诏》，任何人不得进入其所占范围采矿、伐树。

这一带的庄头见干沟东达沈阳，西通承德，北达赤峰，南通秦皇岛，交通发达，商贾云集，就在这投资办起了“五行八作”。“五行”有烧行、粮行、店行、药行、钱行，“八作”有首饰铺、杂货铺、果子铺、鞍子铺、屠铺、成衣铺、绸缎铺、鞋铺。每逢集日，商贾从赤峰、凌源、平泉等地把粮食、皮货拉到干沟，同从关内而来的商贾交换布匹、杂货，然后运回。由于往来货源不断，当地有“拉不败的干沟，填不满的建昌”之说，从此干沟成了临榆大镇。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同治二年设立干沟汛，配把总1员，驻兵20名，隶山海关管辖。随着干沟镇经济的发展，开办五行八作的庄头个个成了富翁，因而临榆县令肖德宣作诗叹曰：“一百里外是干沟，多少庄头作市头，不应官差种官地，山中别有古春秋。”

（七）分丁拨户

出关跑马占圈的旗人多数住在关外，但也有一些驻在关内，只是把庄丁分派到关外，在圈占的土地上搭起简易窝棚居住，看守和耕种圈得的土地。故而清代《迁安县志》载："迁邑口外，居民每以田野为庐舍，或三家，或五家，户口畸零，难编牌甲。"诸如"三家"、"平方（房）子"，"马架窝棚"就由那时而得名。

清朝入关日久，关内满族人口日繁，闲散余丁日增，原来的居住地难以容纳，于是，关内旗人便采取分丁拨户的办法，把子孙及庄丁大量地分迁到关外圈地范围内居住，从而使青龙一带满族人口逐渐增多。例如正蓝旗董家在关内外圈占大量土地之后，因关内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家庭主要成员仍然住在滦洲（今滦县）法宝庄，每年秋冬，派人到关外收取地租。后来由于亲门近支不断繁衍，闲散人丁日趋增多，法宝庄实在容纳不下，于是，他们便把四支迁于刘家口、徐流口、河流口、青山口桃林口五关之外，长门住在山拉嘎，二门住在官场，三门住在庄窠，四门住在稍枝峪。其中三门始和董珩为皇清太学士，据乾隆二十八年腊月立于三门祖茔的墓碑载："蒙吾皇上念吾祖辈有功，恩赏功勋地三百余顷，座落口外，延及我辈相传五世，近又迁居桃林口外王家庄窠，屈指以算已有近一百二十年……"

除了旗人由关内向关外分丁拨户外，居住在关外的旗人由于原住地较狭窄，他们也实行分丁拨户。肖营子正白旗杨家，于嘉庆十四年将子孙及庄丁分迁到圈地范围内的响水沟、孟家铺、榆树沟、土石门、大杖子、井沿子、河南等地，并将此事记入《家谱》："我杨氏始祖，本系铁岭人

也。清初随龙定鼎，标入正白旗包衣牛录，赏功赐地。故康熙九年出冷口，居住横河肖家营子，至今传十三世。而子孙繁衍，宅地狭隘，有分处他乡者……”

有些旗人在分丁拨户时，为防止后世子孙相见无凭，他们便各执家里某一制作完全相同的物件，做为见面凭证。正蓝旗于家弟兄 8 人分别居住在马圈子西庄、大狮子沟、大于杖子、东赶河子、温家河子、小汇河等地，他们分手时每人带走一个大小相等，图案一样的瓷冰盘，其中东赶河子庄头于家的冰盘至今保存完好。

（八）塞外避难

青龙满族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出关避难而于清代来到塞外定居的。因这类事既有损于朝廷尊严，又不能给祖宗增光，所以地方史志，家谱墓碑不予记载，只是在同姓宗族内口头流传。清代大臣安国保率子出关到城根（今山东乡）避难一事，就在山东乡东洼子村一带流传至今。

东洼村赵家，始祖安国保，家居东北，系正蓝旗。吴三桂叩请清兵入关时，安国保随帝进京，因在统一中原的历次战争中屡建奇功，被顺治皇帝封为大臣。当时康熙帝年幼，一次母亲问他，你即位后选什么样的妃子？康熙帝见漂亮端庄的姐姐正靠在母亲身旁，就不加思索地说，选姐姐那样的妃子。因康熙金口玉封，母亲只得把女儿送到一位大臣家里，作其义女，日后，这位大臣将义女送给康熙作妃子，康熙认清是姐姐，遂永远未入姐姐宫中。尽管宫内守口如瓶，但这件事仍迅速传遍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议论。安国保刚直不阿，对此十分不满，便提笔写道：“头戴飞禽羽，身穿走兽衣，父子不同姓，姐弟配夫妻”。以此讥讽帝王伤风败俗。刚刚写

完，恰直某大臣来访，遂藏入袖内。让茶时，不慎失落，被这位大臣奏告康熙帝。安国保料知不妙，便收拾细软，带家人星夜离京。康熙派兵追赶，只捉住了安国保的第四子，其余人等出冷口，奔城根（今山东乡东洼子村一带）落户，以开荒种地为生。安国保最喜欢第四子，后返回京城，以身相赎，后来被杀。其四子收起父亲血衣，逃出关外与家人团聚。弟兄们为防皇帝灭族，遂改为赵姓。从此，这一带即生出“安赵不分”之说。上述传说虽无史料可考，但在赵氏宗族和周围众人中却广为流传。至今赵氏已传十三世，他们世世代代保存着始祖的血衣，逢年过节，总要供奉在祠堂里，由后世子孙拈香祭奠。直至“文革”初期，血衣才遗失无存。

除正蓝旗赵氏以外，还有些旗人因在皇宫述职有失，惧怕严加处罚，而由京城逃到关外避难，他们当时即将满族改为汉族。

（九）逃荒迁居

在清代，尽管有很多满民来到青龙垦荒，但同关内相比，这一带仍是地广人稀，山坡河畔还有许多未开垦的荒地。对于青龙东境，清代抚宁县令张上和在《十八盘》即事诗中描写到：“人家在何处，鸡犬白云隔，……短垣修且整，四顾无一邻。”对于青龙西部，清代《迁安县志》有确切记载：“白羊峪口外，道路崎岖，仅可通马。俯视河流如线，由北而行，自二道拨至七道拨，计三十里，至八字岭，皆深山无人烟。”因青龙从东到西闲地较多，所以一遇灾害，满汉各族贫民就纷纷逃荒到关外，他们或垦荒自食，或租种耕地，或投亲置产。从此这里除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四旗外，又增加了镶黄等旗和其他汉、蒙、回等族人，使这里成了

许多民族共居之地。例如，大于杖子乡铁炉沟村镶黄旗徐家于康熙中期从北京逃荒来此定居，现在徐家人口已从铁炉沟发展到牛心坨，白城子一带。青龙镇马杖子村正白旗马家因山东老家闹灾荒，于嘉庆年间来这里垦荒定居，三拨子乡的五拨子、六拨子、七拨子等村名，就是因当时逃荒人群出关定居的先后顺序而得。对于这种情形，清代《承德府志》也有记载："口外隙地甚多，直隶、山东、山西人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今中外一家，口外仍系内地，小民出入原所不禁，一转移而向旷土，游民兼得其他，实为古所未有"。清代迁安县令靳荣藩见昔日渺无人烟的荒草地，变成了五谷丰登的米粮川，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冷口迢迢近热河、八沟三塔广坡陀，陪都内外年年熟，容得中原万灶多"。并自注云："庚寅、辛卯间（即公元1770年、1771年），山东、山西，河南人出冷口、喜峰口垦荒就食者多"⑩。

由于以上赏赐皇亲、奖励军功、出关狩猎、奉命垦荒、驻军屯田、分丁拨户、塞外避难、逃荒迁居这几种情形所致，清代满族人口在青龙占相当大的比例，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抚宁县人口调查看，口外杨树窝铺、大梓椤树、双山子、哑叭庄四堡总人口12400人，满族就有5570人，占总人口的45％。

三

自康熙九年（1670年，满族在青龙一带定居，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县满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一）两级分化

为防止庄头在地方胡作非为，渔肉百姓，雍正皇帝曾手谕户部："……庄头人等，有在州县地方生事者，著该州县官竟行呈报尔衙门，尔等追查训饬，若不悛改，即行斥革。著行文直隶巡抚，凡有皇庄州县地方，通行晓谕。至各庄头交粮时，须逐一查问，将生事之人，严加训斥，不肯悛改者，即行斥革。"⑪尽管朝廷三令五申，怎奈山高皇帝远，千总庄头仍为所欲为，对庄丁佃户肆意盘剥，致使满民生活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在旗人内部买卖旗地现象有所发生，而且有些旗人还迫不得已把土地典于汉人。为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蔓延，清廷规定：不准买卖旗地，也不准典地于民。如有私行典卖者，业主、售主俱照违犯例律治罪，地亩银价一并追缴入官，失察地方人员，交部严加议处。清廷规定虽严，然而并不生效，乾隆十年，旗地典卖于民者已50%余，无奈，清廷只得用国库银两代旗人赎回卖出土地，但不久又被卖掉，清廷银库有限，难以尽赎，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遂于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嗣后旗人田地，遇有缓急，情愿典出者，呈报该旗佐领注册，若因银价较高，情愿出卖者，准其不计旗分，通融买卖。"⑫大量失去土地的满族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得租地耕种，从而沦为佃农。嘉庆年间，每亩地租银二钱五分左右，光绪年以后，地租形式变为"四六"分或"五五"分，地主得大头，佃户得小头。至于当雇工的满族农民，每年工钱只有六斗至一石粮左右，生活更为困难，有的甚至靠高利贷续持生活。

辛亥革命后，青龙满族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同清代并无区别，民国初年，这里进行过一次旗地清

丈，按照千总和庄头所存的《红契大诏》上的亩数，给原土地占有者发放土地执照。但因为当时并不实际去丈量土地，所以土地使用权和数量并未发生变化。贫苦的满族农民仍无地或少地，继续靠租种土地或当雇工维持生活。特别是在直奉大战中，青龙是双方军队必经之地，并多次在这一带打仗。那时，无论哪方军队到来，都拉壮丁，抢耕畜，摊粮米，抓猪鸡，满汉等族青年农民，只得逃离家乡四处避难，留下老弱病残照看门户。战争过后回到家里，经常是庄稼被糟踏，衣物被抢掠，房倒屋塌，无处安身。长期的军阀混战，使青龙满、汉各族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二）奋起抗日

１９３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热河地区（含青龙）。同年五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塘沽协定》，不仅出卖了东北三省，而且也出卖了热河。从此，青龙满族人民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度过了长达１３年的亡国奴生活。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竭力宣扬"满洲国"是"满洲人的国家"，歪曲满族历史，蒙骗满、汉人民，破坏两族人民的团结，消除满族人民的抗日情绪。日军与汉奸、地主相勾结，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建立伪政权，日军还实行强制性的"集家并村"政策，在全县建立了３５８个"人圈"，规定每天太阳偏西外出的人必须返回，否则就严刑拷打，进行追查。他们还将老岭山区、都山周围、长城沿线划为"无人区"，对这里进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据统计，到１９４５年止，日伪军警在讨伐，扫荡中共杀死５００多人，放火烧房１００００多间，抢走粮食、衣物、牲畜不计其数。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青龙满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拆围子，扒公路、炸桥梁、剪电线，进行各种抗日活动。满族农民常景泰往大石门子送情报，途中恰与日军相遇他机智地把情报装入挖空的木棒里，随手扔进路旁的小河，日军搜查过去之后，他跑到小河下游捞回木棒，把情报及时送到联络点。青龙满汉人民处在日伪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开展抗日活动十分困难，但他们克服艰难，不怕牺牲，千方百计支援抗日队伍。满族农民肖玉重，多次夜间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鞋袜、药品送给八路军。他家是抗日“堡垒户”，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抗日干部来家开会他便和妻子站岗放哨，烧水做饭，照顾得十分周到。有的满族同胞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组织农民暴动，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

（三）满族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龙满族人口同清末相比，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清末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5%，1956年则下降到17.8%；1982年下降到17.5%。

满族人口为什么逐年下降呢？经调查，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老年人认为清朝灭亡之后汉人当家，满人受岐视，因而纷纷“出旗入民”，把满族改为汉族，有的在“入民”时大摆宴席，以期邻里承认。二是三纲五常”封建残余的影响，满族姑娘嫁给汉人后，子女族别随父不随母，甚至连自已的族别也随丈夫，但汉族姑娘嫁给满人时，子女族别却随母不随父。三是“左”的思想残余的影响，1957年，有的领导同志因主张建立青龙满族自

治县，而被扣上“妄图恢复满洲国”“地方民族主义”等大帽子。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时，没有认真宣传国务院有关部委《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干部群众回顾以前，心有余悸，因而不少满族同胞报成汉族。原因找到后，通过广泛宣传民族政策，认真恢复和改正民族成份，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现在，青龙满族仍保留着明显的民族特点，从风俗上看，有些地方仍住南北炕，刚生的小孩要睡头，绑腿，逢年过节喜吃粘食；一些山沟小岔的满族老人至今还保持满族的服饰。从语言上看，一些满族词汇至今还夹在汉语中沿用，不守信用叫“秃鲁”，肉变质了叫“哈拉”，粘豆包叫“饽饽”，猪后腿骨叫“嘎拉哈”。从民族自我意识上看，青龙不少满族家庭都一代一代地传述着本家的祖源和旗别，老人常给子孙讲祖先是从东北哪个地方随王进京，立了哪些战功，得了多少功牌，又于哪年出口占地的；不少满族家庭，至今还保留着家谱、墓碑和祖先画像，这说明满族人民有着明显的民族意识和感情。正因如此，满族人民强烈要求建立满族自治县。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国务院批准撤消青龙县，设立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满族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满、汉等各族同胞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亲如一家，在祖先开辟的这块物产丰富的良田沃野上，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注：

①《国语》卷二。楛音苦，灌木，做弓矢的材料。砮音奴，可作箭头的石片。

②《后汉书》卷８５。

③《魏书》卷１００。

④《旧唐书》卷１９９下。

⑤清代《迁安县志》

⑥《清圣祖实录》卷３０

⑦《清圣祖实录》

⑧《热河省各县情况》

⑨戴逸《简明清史》

⑩清代《迁安县志》

⑪清代《永平府志》

⑫嘉庆《大清会典事例》

青龙历史上个体手工业的烧酒业最为悠久。据《中国名酒志》记载，我县白酒起源于金代（公元１１１５年—１２３４年间）；１９８５年４月，我县“都山古贡酒”在河北省酒类大赛中第一次被许为省级优质产品。

青龙四时记

杨贺春

青龙，是满族集居的县。除满族外还有汉、朝鲜、苗、蒙古、回、壮、侗、藏、土家等11个民族。三百多年来，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和影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即充满乡土气息，又具有共同特点的民族民间文化，这里即有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古老纯朴的遗风，也有汉族传统的多姿的生活印记，这些异彩纷呈的风俗习惯又都融于一年四季某月某日的节令之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带来希望的寄托和永久的回忆。

春　季

春季里含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六个节气。青龙人尤以立春、清明、谷雨为重。

立春：春为四时之首，立春又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第一个节气。因此，过去每逢立春这天，有以彩杖打春牛的习俗，故又名为“打春”。青龙民间至今有立春这天吃脆萝卜的习惯，名为“咬春”。这天新娘不能住娘家，要在婆家团聚，酒肉庆贺，谓之“春比年大”。

清明：清明是祭奠节日。每逢这一天，家家都起大早到坟茔地添坟上土，焚烧纸钱，妇女还于这天戴上柏树枝，谓之“避邪”。新娘要回娘家，名为“躲清明”。

谷雨：谷雨是春季里最后一个节气，其间天气温和，而谷雨一过，预示炎热多雨的夏季将要来临。因此，每逢这天，青龙民间都做豆腐晾干儿，切片冷食或与菜煮食，其质绵软细嫩，颜色外黄里白，味道也好。

春季里含正月、二月、三月（注：本文月日均为农历），统称"春三月"。

正月：正月为一岁之首，故称岁首，又称元月、寅月、孟春。初一日，古称"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又称元日、元旦、岁朝。俗称大年初一。清晨，家家燃放爆竹，早饭吃饺子。饭后，家族晚辈向长辈请安问好，谓之"拜年"。民间还有正月初一迎"喜神"、"财神"之俗；初五日，俗称"破五儿"，民俗初五日以前妇女不串门、不动针线，扫地时土不向外收，家人不得用火烧生食。初五过后，破除禁忌，恢复正常。有初五日民间还给６５岁老人做"六十五"、初六日给６６岁老人做"六十六"、初八日给８０岁老人"庆八十"之俗，意在表示对老人的尊重和祝福；十五日，古称上元节，也称灯节，又称圆宵节，家家吃圆宵，表示合家团圆之意。在农村，过年杀猪的猪头都要留在这天吃，早饭后，男女还要滑冰，名为"走百冰，百病不犯"。晚上家家放烟花，挂彩灯，满族还习惯于办秧歌。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为"填仓节"之期。家家做馒头、豆包放在仓柜上，讲究二十四日填仓底，二十五日填仓，至二十八日"收仓"。农村还习惯于二十五日请"老康婆"，即用秫秸编成小人，以纸做手，口诵五谷，并用鸡毛或椿椤叶相吸。纸手前伸者为可望收成的谷物，春耕时即可多种此粮。除了上述一些活动外，青龙还有自初一至初十日，每一日为一种畜禽和果菜的象征

日，以阴晴占卜吉凶之说。即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驴七、马八、九果、十菜。除大年三十晚上外，从初一到十五日，满族家庭还在院里竖起灯笼杆，上挂红灯，彻夜不熄，以示人寿年丰。

二月：农历二月，为仲春之月，故称仲春，又称卯月、杏月、令月、丽月。初二日，古称中和节，俗称“二月二”。民间以这天为“龙抬头”日。这天家家摊煎饼，吃春饼，名为“吃龙鳞”。妇女停止做针线活儿一天，以防伤害“龙目”。家家用红黄纸剪鸡，贴在墙上，以示驱除虫害。十三日，为青龙县城“铁器会”集日，每逢这天，县城市场商贾云集，尤以铁器买卖最多，还有卖膏药、眼药、拔牙修脚的，耍猴卖艺唱西洋景儿的，好不热闹。

三月：农历三月为春季最后之月，故称季春、暮春、晚春、末春。又称桃月、蚕月、辰月。初三日，俗称“三月三”，相传为西王母蟠桃会之期。

夏　季

夏季里含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个节气，青龙人以立夏为重，过去一般都吃红术米干饭水豆腐，谓之“不怕晒，脸色有红似白。”

夏季里含四、五、六月，统称“夏月”。

四月：农历四月，为夏季之首月，故名孟夏，又名梅月、槐月、麦月、清和月。初八日，相传是释迦牟尼诞生日，又称“浴佛节”。

五月：农历五月为夏季之中，故名仲夏，又称午月、榴月、蒲月、皋月。初一日，旧俗是城隍出巡日，至初四日为

城隍庙庙会。初五日为端阳节，又称端午节，古称天中节，俗称“五月节”，“当午儿”。家家用粘黄米包粽子，意为纪念屈原，此乃汉俗。满族家庭清晨踏露拔艾蒿折桃条置于门上房檐等处，並用红黄纸剪葫芦贴于酱缸、水缸、门等家俱上面、以求“解瘟”。妇女为小孩抽（做）荷包戴在胸前，用五色线系于小孩手腕脚腕，意在“避邪”；五月十三日，相传是龙王爷接闺女之日，如下雨，谓之久别重逢的泪水，故民谚有“大旱不过五月十三”之说。

六月：为夏季最后一个月，故称季夏，又称末月、荷月、禾月、暑月、伏月。初六日，古称“天贶节”。民间于此日晾晒衣服等，以防潮湿虫蛀。农事活动又有“六月六。见谷秀”一说，其意思凡谷子长到此日，大多数都能打苞吐穗。

秋　季

秋季里含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六个节气。民间尤以立秋为重。立秋为秋季之始，民间视为节日。这天一般家庭做豆腐或吃“五谷粥”，名为吃“秋膘”。

秋季里含七、八、九三个月，统称秋月。

七月：农历七月，为秋季第一个月，故称孟秋、首秋、初秋、早秋、新秋，又称申月、兰月、瓜月。初七日，相传是牛郎会织女之期。清晨不见鹊鸟飞鸣，谓上天给牛郎织女搭桥去了。十五日，古称中元节，也是“麻姑日”。新死人的家于这天要办酒席宴客。

八月：农历八月，为秋季之中，故称仲秋、中秋，又称酉月、桂月、观月、壮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也称“八月

节”，俗称“八月十五”。这天家家吃月饼，以庆团圆。青龙民间过去有供月之举。即将瓜果、毛豆（未成熟黄豆角）、月饼做为供品，放于院心桌上，点上香烛，由妇女向月叩拜。男人则不拜。故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

九月：农历九月，为秋季最后一个月，故称季秋、杪秋、暮秋，又称戌月、菊月、霜月。初九日，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为阳月阳日，故又称“重阳节”。古人有重阳节赏菊、登高之习，也有借此日祭奠还愿的。

冬　季

冬季里含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六个节气。满族人尤以冬至为重，有描“九九消寒图”的习俗。九九消寒图有三种：一、小孩描仿影。底字为“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风为繁体字）”。这九个字每字九笔，由冬至这天起，每天描一笔，九九八十一天描完；二、描圈。在一张纸上划分九格，每格划九个圈。自冬至之日起，每日描一个圈，以记阴晴风雨。歌诀为“上涂阴，下涂晴，左风右雨雪当中”。也是八十一天涂完。三、画梅。老人描九九消寒图，则是在白纸或轴上光画一丛梅枝，然后自冬至之日起，每日添上一朵梅花，共画八十一朵。以上描仿影、涂圈、画梅，时间均是九九八十一天，是时九九已出，寒尽春来，实为苦度严冬的一大乐趣。

冬季里含十、十一、十二，也称冬三月。

十月：农历十月，为入冬第一个月，故称孟冬、初冬、上冬，又称亥月、阳月、良月、正阳月、小春月、小阳春。

初一日，俗称"十月一（yī）儿"。民间于此日上坟祭祖，焚烧纸钱。也有买彩纸做衣，上书死者姓名焚之，名为"送寒衣"，满族人称"烧包袱"；十五日，古称下元节。相传是水官解厄之辰。民间信佛之家，有送香烛、斋供者。

十一月：农历十一月，居冬季之中，故称仲冬，又称子月、冬月、复月、葭月、龙潜月。十五日，晚上人立于地，月照当头，人影极短。一年中只有此夜皓月当头，故民谚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之句。

十二月：农历十二月，为一年最后之月，也是冬季最后一个月，故称季冬、暮冬、杪冬、末冬、残冬，又称丑月、腊月、除月、嘉平月。初八日，俗称"腊八儿"。民间吃"腊八粥"，即以各种米豆杂粮煮粥食之；二十三日，俗称"小年"，民间有过小年之俗，晚焚灶王牌位像，名为送灶王爷上天，此日家家还要清扫房间卫生，贴画、剪窗花、糊窗户；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为杀猪"造厨"之日，家家走油炸丸子，准备过年；三十日，古称"除日"，又称"除夕"，满族人于清晨祭祀祖先，白天要在院中竖起灯笼杆夜晚将灯笼挂起，使满院一片通明，晚上家家包饺子煮面条，午夜食之，名为"接神饭"，家人团坐，谈古论今，儿童欢笑非常，名为"守岁"，至午夜，燃放爆竹，辞旧迎新，然后方寝。

上记四时之俗，是青龙各族人民几百年，承袭先人古俗和自己独创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有许多习俗至今保留，也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进步，逐渐的被弃舍。尤其是一些带有封建糟粕和迷信色彩的东西，已自然地

被人们所取缔。但所有这些，毕竟在青龙的历史上有过风行的一页。我们今天记载它、研究它，就是为了更好地鉴别它，以改革那些旧的传统观念，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那些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

注：本文参照布尼阿林同志的《滦阳岁时记》和根据笔者调查资料整理。

青龙盛产最多的水果是苹果。引进于1952年10月是从辽宁省的熊岳县购进苹苗1.6万株，扶助给土门子区的吴杖子（丰果村）黄杖子，肖营子区的沙沟、肖营子四个先进初级社和互助组，建立了第一批苹果生产基地。

青龙宗教概述

金　城

青龙有世界性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我国的道教。这些宗教传入青龙的历史有长有短，流传和影响面也有所不同，在历史发展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天主教、基督教在我县活动情况杨金珍同志已在《青龙文史资料》第三辑中作过介绍，现将我县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情况作简要记述。

道　教

道教在国内是封建时代早期形成的宗教。其信仰内容具有我国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史学界和道学界一般都认为它形成于东汉顺帝（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至今已有１７００多年的历史。

道教何时传入青龙的，没有文字考证。传说最早是在辽代，到清代中期是鼎盛时期，民国初年以后，由于文化的发达，该宗教逐步走向衰落。道教的传入方式，是外地云游道士游到青龙定居並逐渐发展起来的。据现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湖南衡阳市南岳玄都观道长王信安（原籍青龙县柳树底下人，现属宽城县）介绍青龙道教情况时，有这样记述："先师李智山，原籍山东蓬莱人，１６岁投戎于冯玉祥麾下，年四十解甲求道，遍历名山，后至西岳华山南峰拜张礼椿道长为师，侍师朱久，游至热河（即今河北），先在都山上龙泉观居住，晚年移都山下大同观居住，

最后于1941年5月5日羽化去世，终年81岁。”据王信安道长推测，青龙道教历史至少也在三百年以上。

道教信仰十分庞杂，神、仙、人（祖先、英雄先烈）、鬼不所不信。所以寺庙中的偶像也很繁杂。历史上道教对青龙的影响，比其它宗教也广泛的多。最能说明道教影响程度的是寺庙。道教寺庙本应称“宫”或“观”。青龙称“庙”的多，称“寺”的少。可能出于称呼上的方便而改称的。据调查，青龙受道教影响寺庙很多，分布很广。早年流传着“有山就有道（路）、有庄就有庙”（多指过去的老村庄），可见寺庙之多。在众多的寺庙中，多数是一庄一庙（供全庄人共同祭祀、祈祷的地方），亦有一庄二、三个庙的，在道教兴盛时期，全县庄庙不下二、三百座之多。除了庄庙之外，还有名声较大的寺庙，一般是几个庄或十几个庄共建的寺庙。这样的寺庙多有塑像兼有壁像。少数的有雕梁画柱，十分壮观，观之如身临神仙之境。还有的有地狱之险，看了阴森可怖。这样较大的寺庙一般都住有道士，还有庙会。

在道教寺庙中，出家住寺庙的道士、道姑在解放前全县至少有百余人。现调查了解这些人均与世长辞了。

过去虽然在思想上崇信道教，信仰神鬼的人很多，但真正受戒，履行入教仪式的人，除了道士、道姑以外，没有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信神信鬼的人越来越少。

道教组织。据王信安道长说，伪满洲国时期青龙设有道教分会，会长张树理，全会有十几人，全县有教徒百余人。道

教派别，据朱杖子三皇庙的道士墓碑上记载有："都山龙门派"的字迹。从碑文上分析："都山"虽是山名，是代表青龙全县道教的代称。"龙门派"，过去有人传说我县有"丘祖龙门派"之说。"丘祖"可能是道教全真道派创立者王重阳的徒弟丘处机。丘处机曾在陕西省宝鸡东南龙门山修道七年，青龙道教派别可能属此派。

佛　　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在公元一世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开始传入中国，距今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了。青龙佛教的影响仅次于道教，多于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初步识别，青龙明显的佛教寺庙有：

铁瓦乌龙殿，

座落在青龙第二高山—老岭的主峰黑尖顶东南的山谷里。殿堂早已被拆除，仅剩二层石砌的高台上，高台有一卧着驮过石碑的贔屃（音必细），台南放着舂米用的杵臼，台东有四塔墓，传说是"和尚坟"。此殿建于辽代。和尚坟于1980年被盗墓者所挖，已无存。

喇嘛岭庙

地址在张杖子乡拉拉岭村喇嘛岭上，与宽城县相邻。

传说在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位由北京来的姓陶的喇嘛（喇嘛是宗教职业者的职称，也是喇嘛教的名称，喇嘛教也属佛教），云游到此，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在民间集资建造喇嘛庙，此岭也就更名为喇嘛岭了。

传说，在没建庙以前，喇嘛岭早已是辽宁省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原计划喇嘛庙有三项工程。一是在喇嘛岭的通道

上，建造型似隧道的砖垒洞庙，洞内中间为道路，可通车马，两侧靠墙壁塑十八罗汉像，一面不尊。洞长六丈、高 1．5 丈，宽1．2丈左右。洞庙十分雄伟壮观，砌庙的砖全是长城的砖，洞庙上还有一个娘娘庙；二是在洞庙南口西侧建三间菩萨庙；三是在洞庙口东侧建戏台，与菩萨庙相对称。在一、二项工程完工后，陶喇嘛突然病逝。戏台工程没有实现。洞庙中的十八罗汉像、菩萨庙、娘娘庙匀毁于1947年，洞庙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在仍留有残垣断壁。有时还有人到洞庙遗址处祭祀。可见佛教的思想影响在少数人中还存在。

青龙佛教和道教的寺庙中，所供的神像界线比较清楚。但在少数道教寺庙中也供有佛教神像。可见两教之间也有"同流"或"同化"的问题。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信奉安拉的一神教。公元610年由穆罕默德创传于阿拉伯半岛，到现在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有回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等十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

青龙信仰伊斯兰教的都是回族。主要居住在县城，都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陆续从不同地区分配到青龙工作的职工及其家属。以穆、白、武三姓四家人口居多。刘、赛、金、林、伟姓人口较少。

青龙出土的古钱币

王云瑞

青龙境内各地过去曾有大量的古钱币出土，但是收藏下来的很少。近十年来又有大量古币出土，并且大部得已收藏，现将出土的古币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燕国“明”刀币

一九七七年在双山子乡小巫岚村、靠青龙河东岸一百米处的园地里，发现燕国“明”刀币二十五枚，其中四枚完好，币形为平首折背、青铜质地。面文均为一“[illegible]”字，背文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文字。（图一）

该地出土的“明”刀币，系燕国晚期刀币。据《中国古代货币通老》记载：“第三为明刀。面文皆有明字、又较尖首刀稍小，其制分有先后。凡明刀从日月，作园折如“[illegible]”、如“[illegible]”。方折如“[illegible]”者，皆较在前。园折变“[illegible]”、变“[illegible]”，递变为“[illegible]”、为“[illegible]”者，（欲体笔划展至刀郭、左右为刀郭所限、离折不连，明刀此类最多）则较在后。”背文中的“[illegible]”和“[illegible]”字（即左、右）皆为铸币的地址。据《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载：“左、右、外、指国都而言，铸地在国都左方称左、亦称左邑，在右方的称右，亦称右邑，区域皆不远，远则称外。”由此可知，小巫岚出土的“明”刀币，是燕国“明”刀币中最晚的一种刀币。

燕国尖首刀 一货 布币

一九八四年在西双山乡龙潭村宋丈子庄东，北山坡上发现一古币窖藏，出土有尖首刀币约四十五斤，“一货”环钱一百八十九枚（破碎的有四十余枚），布币三十余枚（完好的十一枚），“明”刀币二枚(均已残)四种货币共出于一个窖藏。

此窖藏出土的尖首刀币，首尖、背为弧形、无背文、面文均为一个字，其文是：“上”、“王”、“ᗜ”、“非”“六”、“ｊ”、“丁”、“ｙ”、“ㇸ”、“ㄓ”十种文字（图二）。此种刀币为燕国早期货币，它是由齐刀币演化而来、要比燕国晚期的“明”刀币，尺寸大，分量重。据《中国古代钱币通考》记载：“尖首刀又出于齐刀，体制无异、只削薄轻小。盖先有齐刀，演为尖首刀又演为明刀。由刀首变形及大小轻重、亦可见也。”尖首刀币的面文是标识：地名、数目、干支、币名和花纹等。据《中国古代钱币通考》记载：“第二为尖首刀、较齐刀轻小，尖首薄削，文字简率。有署地名者，如易字、文字、于字诸刀。有署数目者，如一字、二字、三字、五字诸刀。有署干支者，如乙字，丁字、己字、卯字诸刀。有署币名者，如化字、斤字诸刀。有作花纹者，如刀形、云形诸刀。”

宋丈子出土的尖首刀面文中有：“ᗜ”、“上”、“王”三种文字，这种面文的发现还是首次，就是《中国古钱大辞典》中也未曾见到此种面文的著录。它的内涵是什么？标识什么？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出土的尖首刀中还有一种是“非”（即非字的古写）字

的面文，有记载称为“非”字刀、为晋刀（即晋国货币）。可是和“非”字刀同时出土的尖首刀在形制，重量上均别无二样，这“非”字面刀币是否为晋币值得研究。

“一ﾌ”（即化或货）环钱。（图三）亦是燕国货币，为刀币的辅币、即刀为正币，环为辅币，也就是母钱和子钱。据《古币通考》云：“疑燕初只铸明化一种，与明刀为子母。后出明四，别铸一化新币相配。今传明化绝少，亦或后时异地异制，不必通行。一化别承明化之后，削减为此，都未可定。要之燕亦铸有正辅两币，与齐制相通。”由此可知，“一化”可能就是由“明化演变而来，成为燕币中的一种主要辅币。宋丈子的尖首刀、明刀一化配套同时出土的机遇实属难得，对于今后研究青龙古代货币流通情况，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宋丈子出土的“一化”环钱数量之多，保存完好，这在我省目前尚属首次发现。

“差阴”、“益昌”布币（图四）与上术尖首刀，一化环钱是同一窖藏出土。十一枚比较完好，其余二十余枚均已破碎。其中有一枚面文为“益昌”，其余面文均为“差阴”。过去一般认为布币多为三晋货币，其实燕亦有布币，而且铸造年代尚早于刀币。据《古钱钱典》记载：“今谛视右文，似是籀文益字，地理志益昌属涿郡，春秋时为燕地，此品同前差阴币，尽出燕市，其为燕币无疑。

汉、唐至清代的园钱

一九八〇年在双山子乡、张丈子庄辽金遗址出土唐至金代古币环钱十八种，出土的钱币大部锈蚀，而且互相粘在一起，文字很难辨识。文字清晰，尚能辨识的有：开元通宝、

太平通宝、景德元宝、元丰通宝、咸平元宝、至和通宝、天禧通宝、祥符通宝、绍圣元宝、宋元通宝、天圣元宝、治平元宝、元祐通宝、明道无宝、熙宁元宝、政和通宝、崇宁通宝、大定通宝。

一九八二年在当丈子乡小菜峪村发现一古币窖藏，出土汉至唐、五代十国、宋 南宋、金代货币四百多斤，其中钱币有：汉半两、汉代五铢、新莽时期的货泉环钱隋朝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五代十国时期的唐国通宝、周元通宝；宋代二十五个年号的货币和金代大定、正隆两帝的货币，总计三十四种货币。（图五）在一个窖藏中同时出土这样多朝代的货币、还是不多见的。这给研究青龙古代自汉唐以来直至金代，民族居住，市贸、货币流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九八六年在娄丈子乡北庄户庄发现古代货币窖藏，出土唐至金代货币三十种、其中北宋货币最多，总重量一百四十余斤。

一九八六年在大巫岚乡和平庄村北庄、出土唐至宋代货币五十多斤。

一九八七年在青龙镇南街出土一枚新莽时期的“货布”布币一枚，布币左足已残，面文尚能辨认。由于王莽的货币复古，铸有多种形制的布币、刀币、环币、我县发现的“货布”布币是新莽时期布币中的一种。在我县发现这样货币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一九八七年在西双山乡出土清代货币四十余斤，钱币年号是：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同治重宝、光绪通宝等九帝货币，

只少宣统一帝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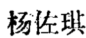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县近十余年古代货币出土情况。以前也并非无有古币出土，只是没有收藏下来。如：一九五四年，县土产公司院内就出土汉至唐宋时代货币数百斤。一九七〇年大于丈子乡大于丈子庄，一次出土唐、宋、金等时代货币一千四百余斤。（上缴承德离宫博物馆）一九七五年以前、马圈子乡三十六滚子村，曾先后出土一千余斤唐宋货币。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在牛心坨乡付丈子、曹丈子，凉水河乡下草碾，三间房乡的起河村等处都有过大量古币出土。

从我县古币出土情况看，它无可辩驳的证实，古代青龙这一地域不但有人定居，从事生产和各种社会活动，而且从战国时期以来，直至清代（明代除外）货币流通，商贸活动是很活跃地，很普遍这一事实。

一个地域货币出土情况，它直接标志着这一地区，当时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生产、以及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等各种情况。因此青龙各地出土的古钱币是研究、探讨青龙古代经济、政治、生产、生活、文化乃至军事情况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附：古钱（铜）币常识



杨佐琪

为了使读者便于学习理解《青龙出土古钱币》一文，根据我县出土的古钱币全部是铜币的情况，仅将我国古钱币中的铜币发展变化情况，做简要介绍，供学习中参考。

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世界里，古钱币的数额最大，分布最广，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能找出几枚古钱币，古钱币中有贝币、骨币、陶币、铜币、金币、银币、纸币等，其中最常见的是铜币，在我国，以铜币为主要货币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处于原始状态，没有交易，当然无货币可言，随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以物易物，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我国已将海贝作为货币使用，到了商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贝的使用明显增多，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许多涉及到"赏贝"和"赐贝"的内容。贝币的计算单位为朋。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既见君子，赐我百朋"。随着交易的扩大，天然贝供不应求，便用骨、石、铜制作仿贝，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铜贝是西周时期的，后来楚国用青铜铸了一种蚁鼻钱，椭圆形，背面像磨平的贝币，正面突出，并铸有文字，文字像人的脸，所以也叫鬼脸钱。

春秋时期出现青铜铸造铲形币和布币，这种货币流通

在韩、赵、魏三国。在布币出现的同时，还铸造了刀币，这种货币主要流行在齐国，后来扩大到燕赵等地。齐国的刀币大多有“齐法化”三个字，“齐”表示铸币的地点是齐国，“法化”是法定货币的意思。它的特点是铸造精制，体大厚重，刀身边缘隆起。燕国的刀币多铸有“明”字，所以被称为明刀。

铜币中最便于携带和使用的是环钱，环钱最初是圆形圆孔，后来为了便于加工打磨，改为圆形方孔。据史书记载："周太公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目前发现最早的环钱是战国时期的一货环钱。秦国铸造的半两钱，在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到全国各地。

西汉建立后，开始时仍用“半两钱”，由于国家没有统一铸造货币，钱币的大小不一样，轻重也不同，造成很大混乱。汉武帝在公元前１１３年，下令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由于五铢钱铸得比较精制，自身的重量与钱文所标的“五铢”又完全相符，这样，便在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了五铢钱制度，使五铢钱流通了七百多年。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推行复古改制的币制，曾铸造一种名为“一刀平五千”的金错刀币。由于这种铜币既少又精美，历来被收藏家视为珍品和“钱绝”。

唐朝建立后，决定在钱币上不铸重量，而铸上“通宝”二字。不久又决定在“通宝”二字前加年号，称“××通宝”，自此，以年号铸钱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只是“开元通宝”中的开元”二字并不是年号。这种钱币是唐高祖武德四年下令铸造的，用“开元”二字表示创立新的钱币制度。一枚“开元通宝”重二铢四絫（絫：音垒）。铢和絫都是重

量单位，古代用十粒黍的重量作为一絫，十絫为一铢，六铢为一锱（锱：音兹），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唐、宋时期，不仅铸钱数额大，而且铸造精工，文字优美。这个时期出现了篆书、隶书两种字体钱，钱币学上称为"对钱"。而宋朝的"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则是真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钱，且均为宋太宗亲书。有些钱币，对于我们了解历史变化，朝代兴衰很有帮助，如唐代的"乾元重宝"，与其他"通宝""元宝"平钱的大小、重量相仿，何以要铸成"重宝呢"？从唐史上可以找到答案："乾元重宝"是唐肃宗乾元元年（578）开始铸造的，当时国家财政困难，铸此钱以一枚当十枚"开元通宝"平钱，号称"乾元十当钱"。结果造成通货贬值，不久此钱币值就不得不降为一当一。借鉴这段历史，我们就会进一步懂得，乱发货币，必然造成货币贬值，这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有些朝代铸钱数额很大，有些朝代如金代铸钱数额很小，主要使用历代旧钱，从历史记载和历年金代窖藏铜钱的出土情况来看，上至两汉，中经隋唐五代十国，以至辽宋的旧钱，金代都可流通，而主要使用的是北宋钱。其他朝代也有这种情况，据《天府广记》记载："明初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并行"。

清朝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铸钱数量也随之增大，是目前各地最常见的铜币。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康熙元年铸记元钱，后凡嗣位改元，皆铸如例"。因此清朝各代都铸有年号钱。据同治年间史书记载：百年来，或铸或停，与时变通，而铸钱之式无复改易"。清朝历代铜币，面文均

记年号，背文均记钱局名。“康熙通宝”凡宝源、宝泉二局（国家铸币局）所铸者以满文纪局，各省所铸者，以满汉文纪局。“雍正通宝”以满文纪局，“乾隆通宝”左为满文，右为回文。其后各朝通宝纪局多用满文，少用汉字。

清朝后期出现了铜元和银元这两种新的金属货币。铜元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在广东始铸，清代自铸银元始于吉林，但大规模机铸银元自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广东造币厂开始。

❋❋❋❋❋❋❋❋❋❋❋❋❋❋❋❋❋❋❋❋❋❋❋❋❋❋

青龙第一家国营企业是印刷厂。它的前身是“振兴印刷厂”，有职工７人，业主于凤恩，１９５２年从平泉迁到我县厂址。原青龙镇北街西桥路南，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公私合营。

❋❋❋❋❋❋❋❋❋❋❋❋❋❋❋❋❋❋❋❋❋❋❋❋❋❋

浅谈《猴打棒》的民族特点

杨贺春

《猴打棒》，是流行于青龙满族自治县西南部长城沿线一些乡村传统民间舞蹈。自清代以来一直传承不衰。最近，县文化馆通过挖掘、整理，将这一艺术瑰宝搬上舞台。1991年9月，在秦皇岛市少数民族歌舞大赛中，它以超群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观众，並荣获编导、组织、表演、总分四个项目的一等奖。

《猴打棒》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它少则可用二人、四人，在地秧歌中做领队开路的先导。多则可用八人、十人，一起在舞台上表演。脸谱、着装与神话中的"孙猴儿"相同。道具为两根长45厘米，直径3.5厘米的硬质木棒。表演时，它动似灵猿，柔中有刚，二棒相击，节奏分明。因此，深受观众的欢迎。

那么，《猴打棒》这一传统的民间舞蹈艺术是怎样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又有哪些民族特点呢？笔者通过多方调查和有关资料考证，现辑录如下，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

青龙是满族聚居的县，自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满族正蓝、正白两旗人奉御旨出口"跑马占圈"以来，至今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三百多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满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创造了许多多彩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化。舞蹈《猴打棒》就是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朵奇

葩。

据三拨子乡老艺人马景山讲：满族正蓝旗马、陈二姓，初来时，因这一带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常有虎狼出没伤人。为了使人丁平安，就由两个人装扮成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手持两根木棒，借逢年过节的日子，到各家各户屋内四角敲打，以示“降妖驱邪”。还于晚上在院中村边击响，使野兽闻之远避。后来随着民间艺术的发展，破除了原有的迷信色彩，逐渐形成了满族地秧歌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具有固定表演程式和特定脸谱着装的民间艺术形式。①

按照这一说法，“降妖驱邪”也好，击响吓唬野兽也好，这些都不难解释。后来将这些生产生活当中的活动，渗透到民间艺术之中也是自然的。唯有《猴打棒》中的道具值得研究。

从古至今，传说中的“孙猴儿”都是使用“金箍棒”，即一根长棒。而《猴打棒》中的孙猴儿，尽管服装、脸谱与其相同，但使用的却是两根各二尺左右长的圆木棒，以此相击起舞。仅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它与满族的传统秧歌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辽海丛书·柳边纪略》记载：“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击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作前导，伴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②

黑龙江另一些地区的满族秧歌，也是“以男子扮妇女，以女子扮参军，手持二尺左右的圆木棒戛击对舞。”③

北京的满族秧歌“主要角色有头陀和尚，手拿一对木棒

在前引路，一面走，一面打，后边都按照他打的快慢来走路。”④

从上述记载中的满族传统秧歌来看，以两根圆木棒为道具，相击对舞，是普遍的表演形式，也是满族秧歌的突出特点。

此外，在有的满族地秧歌中，还有“拉棍”道具（用两根柳树棍做成）。满族歌舞道具中，也有“棒槌”一说。⑤所有这些，都来源于满族及其先人早期的生产生活。

满族是个游猎民族，久居白山黑水之间的深山老林。因此，艰苦的自然环境使他们与木棒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居马架房，备以木棒，以防野兽侵袭；上山时手握木棒，当做拄杖，还可用于分拨草丛荆棘；围猎时带木棒即可防身又可抬取猎物；妇女们洗衣服用木棒捶打衣物，可代替手搓。就连老罕王（努尔哈赤）当年上山挖参也离不开“拨索棍”。后来，拨索棍被满族人奉为神圣祭天用的“索伦杆”，⑥生活中使用的木棒也被满族人加以艺术化、音乐化，成为本民族歌舞中不可缺少的道具。

《猴打棒》中的道具即然是满族的，那么当年这一舞蹈的创始人，为什么又让扮演者画猴脸着猴装，而不以满族“萨满”的形式去“降妖驱邪”呢？这是因为：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向具有优秀文化的汉族学习。特别是入关之后，满族与汉族和睦相处，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吸收了许多汉族文化，就连民族艺术也融合了许多汉族的特点。舞蹈《猴打棒》中的着装、脸谱和舞姿，表现的正是汉族古典文学之精华。也许当年的创始人认为：以神通广大的“孙猴儿”去“降妖驱邪”，

要比"萨满"的威力大的多，所以他们才画猴脸，着猴装。但他们本身又是满族人，加之又是入关之初，在生产生活和民族艺术等方面又不可能完全抛弃本民族的特点，所以，他们在《猴打棒》中又习惯地、自然地用上了"二尺左右长两圆木"的道具。这即是满汉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又是对满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其创始人可谓独具匠心，其艺术形式也可说是独具特色。

今天，通过县文化馆编导们挖掘、整理的《猴打棒》，在保留原来的传统艺术风格基础上，又大胆地进行改革创新，使这株民族艺术之花开的更加鲜艳夺目，大放异彩。那铿锵清脆的棒击声和粗犷健美的舞姿，即体现了满族人民勇敢彪悍，机智顽强的性格，又反映了满汉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加之与具有浓郁民族民间特色的唢呐为主奏乐器的乐曲和气势雄壮的打击乐浑为一体，更给人以热烈活泼，明快优美的艺术享受。

注：

①《青龙文史资料》第三辑。

②《辽海丛书·柳边纪略》卷4，《宁安县志》。

③⑤⑥李德《再论满族歌舞》。

④《定县秧歌选·绪论》。

青龙民间剪纸的演绎与发展

杨 友

剪纸这一民间艺术，据考证在我国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从我县满、汉人民共同开发青龙的历史看，半随岁时风俗流传于民间的剪纸，也不下三百年。三百年间经过无数的民间剪纸艺人的努力，在继承民俗的传统基础上不断地探索、创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绎过程，使今天的剪纸艺术以光彩照人的风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

剪纸之所以能够在民间得以盛行，主要是因为剪纸这一艺术形式来自民间习俗。从我县民间习俗上看民间剪纸的起源、演绎和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供神、供祖的卦帘（亦称卦笺）。即用红黄绿各种颜色的纸剪成各种图案，花纹的卦帘贴在神龛和祖宗牌的门脸上，以示对神、祖的崇敬；②由民间传说而形成的习俗，如"二月二"剪鸡和"五月节"剪"葫芦"。二月正值初春，万物萌动（即民间所说"二月里龙抬头"），在农家便有了剪鸡鹐蝎子、蜈蚣、蚰蜒……等，以示消除"五毒"，祛病除灾。"五月节"剪葫芦是来自满族民间故事：据传说，因世间人心变坏，天帝命一神仙下凡察访，神仙变一卖油老头来到人间，这天来到一个村庄大声吆喝："卖香油，一葫芦四两，四葫芦半斤……"旧时秤制十六两

为一斤，四葫芦本该一斤。人们听到便宜便纷纷前来买油，而且都买半斤。这时一位老人来到跟前，觉得大家都想占便宜便很不平，于是就对卖油老头说：“这样卖是要赔本的。”但老头不听。油卖光后，卖油老头来到那位老人家里，对老人说：“我是天帝派来的神仙，奉命访察人心。果然人心变坏，只有你一个人心眼好。天帝要向人间降灾难，你在五月初五日把水井、水缸及盛食物的家具和屋门贴上用纸剪的葫芦便可免除灾难……”神仙说罢便不见了。老人听说要向人间降灾便匆匆忙忙到各家各户告诉除灾的办法。这样，到五月初五日这一天，天神见家家都贴了纸葫芦无法投药，便回天去了。从此，每年五月初五日这天便家家剪葫芦，以免除灾难，剪纸葫芦的工艺也越来越精致，成了民间剪纸的精美艺术品；③办丧事的纸扎也是民间剪纸的一种形式，如“领魂幡”、“聚宝盆”、“九连灯”等都剪刻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④节日美化环境、贴窗花，每逢春节农村家家户户的窗格子上、墙壁上都贴上各式各样的窗花。主要是花鸟虫鱼兽和“八仙”、“福、录、寿”三星等喜庆吉利的内容，这种习俗最为广泛；⑤民间皮影的“人茬”（头）、戳子（身）和桌、椅大帐、金銮殿等道具都是刻工精细的艺术作品，只是不用纸而用驴（牛）等皮刻制而成。清末民初，我县皮影极为盛行，并出现了李秀这样誉满中外的皮影艺术家，同时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刻制影人的能工巧匠，如南丈子乡前炕土峪村的民间艺人潘俊刻制的影箱在当时极负盛名，他演出的影目《大香山》（即《三皇姑出家》）是全堂景，山、石、树、花、鸟、宝殿古刹、佛像刻制得形象逼真、非常精细，令人叹为观止，双山子一带还有一位艺

人“蒙公”（艺名）刻制的影籍在当时也是令人赞叹不已的；⑥民间印花布的漏版也属于刻纸艺术。这种用纸板刻制成的漏版以豆面、石灰调合漏印，再用蓝靛染花布，用做被面、褥面、门帘、枕顶、兜肚。至今这种工艺在我县农村仍然保留着。做为装饰生产、生活二具的图案、箱、柜、厨和衣服的边角，也多有用此艺术进行美化。

以上六种形式成了我县民间剪纸繁荣的局面，六种形式的相互影响，决定了我县剪纸艺术的演绎与发展。

二

解放前，我县剪纸艺术的演绎与发展，由于我们知之甚少，脉络不很清晰，许许多多的颇有成就的艺人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给考察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需要下番功夫做些调查研究。

解放后，人民生活的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使各条战线各项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剪纸艺术也更加兴盛起来。在建国后的四十年中，遍布全县农村的剪纸活动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剪纸艺术人才，剪纸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显示出勃勃生机，以崭新的面貌在群众文化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剪纸作品从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保持传统的优秀成份的同时，剔除糟粕、大胆创新，使剪纸艺术增强了时代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的剪纸艺术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李鹤：娄丈子乡娄丈子村人。自幼酷爱剪（刻）纸艺术。解放初期，为了配合宣传，他剪刻的作品《支前》、《做

军鞋》、《武装斗争》等，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各级领导的赞扬，是我县早期剪纸作品的精华。李鹤如今虽已年迈，但仍坚持从事剪纸活动，并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剪纸人才。

杜猛：南丈子乡影午山村人（七十年代迁往辽宁省西丰县。辽宁省剪纸学会会员、中国剪纸学会会员）。他是我县剪纸艺人中成就最高、从事剪纸事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自幼喜欢刻“影人”、“窗花”，是当地的负有声望的“巧人”。１９５５年，年轻的杜猛去黑龙江走亲，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这期间他试着将自己的剪纸作品《木兰习武》和《蜻蜓蝴蝶戏何花》寄给了《黑龙江农民报》，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作品很快被发表出来。成功的喜悦使杜猛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他的剪纸作品《孔雀》又在《黑龙江日报》发表。１９５７年他从东北回到家乡，继续努力刻苦创作，同年他的剪纸作品《凤戏牡丹》（窗花）在《承德群众报》发表。从此，他的作品连连在《承德群众报》刊登，一发而不可收了。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是配合党的中心和以农村生活、农事活动为题材，很受读者欢迎。在创作中，他苦心揣磨，不断探索，使他的技艺大进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多年的勤奋创作，先后在《黑龙江日报》、《承德群众报》、《河北日报》、《河北文学》、《中国青年》、《陕西妇女画报》、《河北妇女》、《河北画刊》等４０多家报刊发表剪纸作品三百多幅。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在省、地美展中入选、获奖。这时期的代表作有《大白菜》（载《中国青年》）、《喜丰收》（载《河北文学》）、《植树》（载《河北日报》、《河北画刊》）等。杜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１９５８年县筹建皮影

剧团。他和黄玉洲被抽调参加皮影团工作，负责对皮影人物的刻制与改革，这期间他大胆设计了影人的脸谱造型，得到了承德地区文化部门的肯定。后皮影团解散，杜猛回乡务农。到六十年代后期，县社商业局组织生产出口的工艺品，杜猛和黄玉洲又被邀请参加刻制外贸出口剪纸。他和黄玉洲负责设计和刻制指导，并且亲自刻制了许多精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他设计并刻制的代表作品有《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和一些花鸟作品。后因经营和销售的原因，外贸出口工艺品生产下马。杜猛又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因身体不支，迫于生计，于１９７６年全家迁往东北。

黄玉洲：大巫岚乡黄丈子村人。他自幼喜欢绘画、刻窗花和皮影人。六十年代他的窗花作品即在大巫岚、土门子、双山子一带市场出售，颇受欢迎，后又在辽宁省的建昌一带市场畅销。１９５８年他同杜猛被县皮影剧团邀请刻制影人，在旧影人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他同杜猛做了积极的探索。《承德群众报》对杜猛和他在影人的改革中做出的成就曾进行过报导，并刊登和介绍了他们刻制的皮影头茬。六十年代又和杜猛一起应邀参加商业（供销）外贸组织的工艺美术社，专门刻制彩色剪纸供出口创汇。他和杜猛还到张家口地区蔚县参观学习。黄玉洲的剪纸特点是构图优美，刻工纤细，生动逼真。他的作品主要以花鸟、仕女、历史人物为主，代表作品有："八大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红娘子等历史英雄人物以及皮影人头茬。由于他的剪纸艺术高超，七十年代被承德工艺美术厂招工，现在承德工作，专工剪纸和玻璃画。他的剪纸作品离宫三十六景和外八庙诸景已蜚声国内外。

于长海：双山子镇双山子村人。现在家为农。他于七十年代开始从事剪纸。他的剪纸作品注重严谨的构图和画面的协调。他的刀法娴熟，刻工精湛。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在《承德群众报》、《河北日报》、《河北画刊》等省、市报刊发表，并有部分作品在省市美展中入选。主要代表作品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庆祝国庆》、《学科学》、《女民兵》等。

郝玉兰：女，三间房乡三间房村人。她是我县新一代剪纸艺人的突出代表。她自动受母亲熏陶，十二岁开始学剪纸，她的剪纸不用刻刀，全用剪刀剪。她初期的作品多来自民风民俗，花鸟虫鱼和龙、虎以及一些剪纸小品。１９８５年乡文化站为她举办了剪纸展览，同年她的剪纸作品《摘山楂》在全国民间美术品展览中入选，并被国家收藏，１９８６年县文化馆专门为她举办了个人剪纸作品展，展出作品八十余幅，１９８９年她的一组剪纸作品《农家小院》（四幅）在全国剪纸作品展览中被评为优秀奖。同时，她被中国剪纸学会吸收为会员，１９９０年５月被推荐到天津学习，深得全国剪纸学会主席、著名剪纸艺术家、评论家仉凤皋先生的赏识，以优异成绩结业。结业作品《春蚕》和一套亚运会“熊猫”藏书票均受到好评。《春蚕》被送往日本展出并被收藏。在短短几年里，郝玉兰刻苦钻研、勤奋创作，剪了上千幅作品。她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从题材、构图处理以及工艺方面一反前人的传统，大胆地赋予主观的意识，使她的剪纸作品活脱而不拘泥，给读者以一定的想象空间和咀嚼的余味，富有一种韵律美，在经过大胆尝识和不断地追求中，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给我县的剪纸艺术带

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令剪纸艺人和观者耳目一新，也给剪纸艺术提出了新的思考。

李素华：女，木头凳镇邱丈子村农民。她是一个中年家庭妇女，她的剪纸也同郝玉兰一样只用剪刀。但她剪出的作品酷似刀刻，精制纤细，极富美感，非常适于农家贴于窗户和墙壁。她的剪纸作品曾在镇文化站和全县剪纸作品展览中展出并获奖。主要代表作品有《鸡》、《猫》以及《蜜蜂与花》、《扭稻秧》、《回娘家》等。

陈文亮：朱丈子乡陈丈子村人。农民。他的剪纸作品粗犷、奔放。他的代表作品如《龙》、《凤》和《回娘家》等曾在全县剪纸作品展览中获奖。

此外，如木头凳镇的李素之、刘来兰、胡连（哑人）、张贺母亲；牛心坨乡张首中；草碾乡马素兰等人的剪纸作品都很有特色，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

剪纸艺术在我县有着深厚的基础和众多的艺术人才，使我县的民间剪纸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领导对剪纸艺术已经重视起来。文化部门和剪纸艺人热情空前高涨，这就为我县剪纸的发展、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相信剪纸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必将越开越鲜艳。

建国前和建国初期青龙县县城医药卫生概况

穆广文

建国前的1947年，青龙县城仅有“保春堂”“庆余堂”“鸣九”三家私人开办的中药铺。“保春堂”中药铺（铺址现图书馆处）为马丈子村马兴武开办，他的药铺是三家中比较大的一家，有坐堂先生（中医）杨百川，中药调剂籍承章、籍明远，切药采药工有白景荣等二人，采购员有籍海燕等十余人。经营方式以为县城或附近村镇群众看病卖药为主，兼营中成药批发贩运，由采购人员从天津购进药材，运到辽宁沈阳、锦州等地销售。

马兴武的“保春堂”中药铺在1949年土改时被冀东十八分区全部没收，中药材运往口里迁安县建昌营镇出卖处理了。当时，马丈子村农会清算马兴武剥削帐，向马兴武提出要18石小米，马在无力付米的情况下，逃离青龙去四川了，马离青前把马丈子村农会要米事委托籍承章、籍明远，一年后，籍承章，籍明远按数把米交付给马丈子农会。

另两家中药铺，一个是岳丈子村头道沟马秀朋中医先生开办的“庆余堂”中药铺，（铺址在三叉榆树村东头）；一个是三叉榆树店道子吴鸣九开办的“鸣九”个人药铺，（铺址在现公安局临街房屋）。这两家中药铺都是人员少资本小

的小本经营。当时是从“保春堂”中药铺随买随卖中药材和中成要。

土改时马兴武开的“保春堂”被十八分区没收处理后，青龙县县城医药状况由原来的三家发展到六家中药铺。

一是籍明远（已病故），开办的“明德堂”中药铺，（铺址在现在的图书馆），人员除籍明远本人外，还雇有李泽，李山等人，资本在2，000元以上，在1956年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时，被人民政府接收。

二是籍海燕和白文汉（已故）合开办个“隆记”中药铺，（铺址在现在的新华书店），由于1949年洪水淹没双山子，县委、县政府迁来大丈子，动员“隆记”中药铺搬迁，他们又迁到现在的六区社商场楼地址，雇工有龙计先，资本有1，000元以上，也在公私合营时被人民政府接收。

三是籍德厚在现医药公司西临街处开设个“德盛汇”中药铺，坐堂中医先生有徐少先（已病故），中药调剂有白光普、李泽等人，资本有800余元。

四是响水沟村的常××在现在的镇一小对过处开的是“福纪堂”中药铺，资本在500元左右。

另两处仍是马秀朋、吴鸣九在原址开的“庆余堂”“鸣九”药铺，资本均在400—500元左右。

（以上六家中药铺的资本均按当时人民币折算。）

1948年秋季，青龙县人民政府为解决县直机关干部看病吃药问题，由县财粮科提出4，000斤小米，公办一个中医诊所，人员有关馥庭先生，另有调剂和打杂各一人。除为职工干部诊病治疗外，还为当地群众做防疫灭病工

作。

１９４９年８月，原热河省医学院本科毕业生高凤仪等三位医护人员经热河省人民政府分配来青龙县从事医务工作；１２月份原热河省医学院第一期医疗系本科毕业生刘云龙、刘克夫、姜太章、刘浩儒等五人来青龙。上述医务人员到青龙后，中共青龙县委和人民政府决定，在现在的文保所处建立国办卫生院一处。区级卫生所两处：双山子区、宽城区各一处。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条件所限，县卫生科与国办卫生院合一，卫生科长兼卫生院长。卫生科长第一任是邹志远同志，第二任是刘云龙同志。县卫生院下设一个医疗部，主要任务是诊治门诊和往诊病人，医疗第一任主任是刘克夫同志，第二任是刘浩儒同志，卫生科下设两个股，一个是防疫妇幼股，一个是总务股，防疫妇幼股第一任股长是田洪远同志，第二任是陈宝瑞同志。总务股第一任股长是蒋明玉同志（已病故）。

建国初期县卫生科先后有陈维新、杜汉臣、田洪远、蒋明玉、张殿荣、孟祥一、穆广文等七名科员。

建国前塞外青龙人民的卫生保建条件十分低下，人民群众患病仅靠中医草药来医治。一些较偏避的乡村，普遍存在缺医少药或无医无药。现代医学（西医、西药），流入青龙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至今仅是４０余年。

近四十年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大大改进了塞外山乡的医疗防疫条件，全县不仅九个区设立了卫生分院，４２个乡镇也先后设立了卫生院。３２０个行政村也成立了医疗站。县城医疗事业也有很大改观，现有县人民医院一

处，有病床２５０张，医护人员２５０余人，共分９科一室；县中医院一处有病床４０张，有医护人员４０余人；县卫生防疫站一处，医务人员３０人；县妇幼保健站一处，有医务人员２０多人；有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计划生育服务站一处，病床３０张，医务人员２０人；县城工业卫生所一处，医务人员５人；县卫生局主办的卫校一处，职工５人国营医药公司一处，职工和医生７０人。县城东起三叉榆树，西至土坎子有集体和私营开办的医疗点１１处，有中西医务人员２３人。

青龙县城从建国至今仅仅四十年间，人民的医疗卫生和保健事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建国前的六家单一的中药铺，２０几名从业人员到建国后的今天拥有医院、所、站、校达２０多处，从业人员已达４５０多人。医疗单位是建国前的五倍，医务人员是建国前的２０倍，县医院和中医院是全县各级医疗单位的技术业务指导中心，在保护和提高全县人民身体健康上在发挥着的积极作用。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伴随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和治理整顿，青龙人民的卫生事业前景是光明的，卫生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发展前进也是大有希望的。

妙手回春　各有千秋

——记建国初期青龙几位中医大夫

王　青

世界瞩目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解放初期，我县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关馥庭、王翰章、刘天锡、王金文等人，在继承基楚上，弘扬中医之长，防病灭病，虽然没有像金元时的主火、攻下、补土、养阴四大派明显。但是，他们各有千秋，多年临床过程中，获得发展和提高，对昌明中医，保障当地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妇科见长的关馥庭。

关馥庭先生，生于一九〇一年，卒于一九七一年，本县娄丈子乡朴丈子村人，先祖随罕王在齐鲁镇守有功，后随主进关封占此地。关馥庭先生原名桂华，从小随父学医，后拜迁安县建昌营御医大夫刘建堂为师。一九三九年间，凉水河群众为感激关先生扑灭这一带伤寒病的高尚行径，赠送“普济群伦”匾额一块，同时，送号“馥庭”。

做为御医门生的关馥庭，不是抱着老师衣钵一成不变，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治疗妇科疾病常用的熟地、当归、白芍、川芎四物汤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按辩证论治加减它药，几十年积累一套丰富经验，撰写五万余字的《妇科临

床验方新编》。

《新编》中四物汤的当归为补血圣药，能活血调经，去淤生新，血虚寒胜尤为奏效。熟地对补血滋阴，气血两虚最为适宜。白芍养血敛阴，用于阴血不足引起的月事不调及带下、崩漏等症。川芎为活血行气，以气滞寒凝血淤为宜，并见长祛风止痛。此四物，前二者重在补血，后二者重在行血，两相配伍，可补而不滞，行中有补，营血调和，为治疗妇科疾病基本常用要药。关先生在此基础上，根据妇科生理和病理，如经、带、胎、产、哺等实际，进行全面辩证分析，得出正确诊断，适当加减它药，效果明显。

关先生妻氏徐桂兰未婚时，因患崩漏，经水淋漓不尽，精神抑郁，面色萎黄，各处求医无效，身体逐渐虚败，元气渐泄，命不保夕。家父宣称，有治好女儿病者情愿招为东床，以女相配。关先生闻知，以治病救人之医德前往，经诊断，辩明阴阳，确定虚实表里，采用有止有活有补有行的止经汤，很快治愈其病，成为眷属。他根据师教和多年临床经验，丰富了祖传专治妇女崩漏的止经汤。当建国十周年时，关先生把以四物汤为主，加香附、贡膠、黄芩、蒲黄、柏炭、艾炭、砂仁、生地、茣芋、棕炭和甘草等药的秘方，做为礼物奉献予国家和人民，表达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热爱。患崩漏经关先生治愈的青龙镇杨玉芬和八道河村廉庆祥妻等，每当念及此事，都倍感关先生再生之恩。

一九五〇年四月青龙医院成立后，关馥庭先生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身兼县医学会主任、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等职。但是，他把为患者早日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放在了首要位置。每天早上班晚下班是常事，当下班时患者仍

在等候，就要家人送饭。他常对家人说："在吾面前有病人呻吟，吃饭都不香"。使得家人送饭习以为常。

一九五九年，关馥庭先生以满族知识分子身份被选为出席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大会代表。当见到北京城和天安门换然一新，关先生心情格外激动。尤其，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坐定人民大会堂，见工程之宏伟，联想起旧中国幕幕割地赔款和军伐混战与盗贼蜂起，中华民族被外国人辱为"东亚病夫"时，更是热血沸腾。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与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使他心情实难平静。回想起教过自己的御医刘建堂老师，在给滋禧太后行头针时，八拜九叩后，再冒着不能治愈死罪之有的危险进行治病。今天一位平民大夫与党和国家领导一起平坐商谈国家大事，即肝脑涂地有何惜哉！

关馥庭先生，年迈劳累成疾后，他柱杖为患者消灾祛病；身体半瘫后，要家人搀扶为来院求医者举脉开方；当在弥留之际，只以对事业未竟为憾。可见关先生对自己追求一生的医疗事业多么赤诚，这赤诚之心又体现一位旧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多么的热爱啊！

补脾土见长的王翰章

王翰章，原名文阁，号翰章，生于一九一一年，卒于一九八三年，宽城县缸 窑 沟 人。王先生自幼聪慧好学，接受力强，小学毕业后，为了生计，一九二五年春经姐姐王松年委托王达臣做保，介绍到平泉县存仁堂药铺从师学医。当时名曰学徒，实为勤杂，更加坐堂先生存有教会徒弟饿死师付思想，只要徒弟干活，很少从医教诲。三年后，王先生学医心切，私下在宝泉堂拜认常海珊大夫为师，经常利用夜晚求

师赐教，不耻下问，多得所传。存仁堂见王先生医药知识见长，头角崭露，并有独到之处，改变了过去封闭保守态度，从正面多加指点，并要其重点接触医药。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泉后，亡国奴的生活，使王先生爱国学医志坚，欲拯救平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抗战开始后的一九三八年，王先生到天津国医函授学院学习一年。回存仁堂后，求医者颇多，临床经验不断丰富，加之王先生勤奋苦读，精研方术，除见长常见病和多发病外，还逐步积累了从"后天之本"的脾胃入手治疗疾病方法。王先生认为脾胃健壮，方能消化饮食，则全身自然健壮，何曾见有多饮多食者，而疾病缠身？在临床中，他先从纳食入手，要患者能进食进水，增强抗病能力，有针对性的治疗疾患。此乃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补土派"之法，根据"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而先从脾土入手，祛逐它疾。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先生要把多年所学和临床积累的知识贡献家乡人民。可是平泉县政府卫生科长系医大四分校毕业的吴宁悦，很注重人材，不允王先生离开平泉，并要其参加医学联合会，为存仁堂劳方代表。

建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先生感到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报效祖国，热爱家乡心切，拒绝存仁堂重金聘用，以自己追求医疗事业为重，经多次要求，一九五三年春，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从医。

王先生回到青龙县医院时，已進入不惑之年。为了追求自己未竟医疗事业，继续勤奋攻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本草等书籍，孜孜不倦地钻研医术。尤其对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爱之手不释卷，意在勾通中西

医学，继承发扬和丰富祖国医学遗产、促中西医之结合。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王先生总结了脾胃学说的特点，即要注意脾胃之实症，又要注意之虚症。阴虚者，当用玄参、黄精等滋阴养胃，调里中焦，行气消导；阳虚者，当用附子、肉桂、补骨脂等温胃助阳药物，以温养脾胃，行气止痛，助阳暖中，使"补土"从诊断到方药趋于完整与具体。突出的，王先生注重火能生土和木能克土的相生相克关系，善用镇惊安神，平降肝阳的龙骨、牡蛎和党参、白术等补益脾胃要药，达扶正固本与益气之作用，符合李东垣"元气为本"的观点。

王先生在医疗上，像白求恩那样精益求精，对患者极端热忱，极端负责任。一九五六年三月被选为承德地区医务先进工作者，同年九月选为青龙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为王先生对《医学衷中参西录》多有研究和利用，于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曾先后在保定、石家庄、北戴河等地参加河北省召开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讨论会，并聘请为省中医研究员。他在研讨会上也受益非浅，自感荣幸和责任重大。当建国十周年时，把自己多年临床积累专治妇女子宫肿瘤验方，献给了党和国家。该方以活血去淤扶正祛邪为主，收到明显效果。处方为：当归、川芎、赤芍、红花、桃仁、香附、元胡、五灵脂、文术、川军、油桂、别甲、赤木等药。宽城县板城乡尖山子村伍凤仪妻，四十七岁，宽城县南沟村王洪业母，五十五岁，腹部和腰部疼痛，医院检查为子宫肿瘤，经王先生用上述验方治疗，很快肿块减小并消失，恢复了健康。

王先生从医严谨，一丝不苟。在处方上，处之有据，组

合有规，加减有理，煎服有法，使之用药疗效卓著。王先生喜爱郑板桥书画，几十年来，练就近似板桥书法。所以，他的经方规范，字字清楚。青龙医院老调剂籍明远，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常拿王先生处方做样板，介绍全院医务人员，言明处方可贵。每方中分别贯穿汗、下、吐、温、清、消、补等法，药物组合有度，君臣佐使逻缉明确，用药精炼，顺序清楚，说明煎服注意事宜和方法。更可贵者，方中字字端方，使他人从字看出医德高尚和医疗造脂之深矣。

温病见长的刘天锡

刘天锡先生，生于一九一九年，卒于一九八二年春，宽城街人氏。刘先生系中医世家出身，从小受家父影响，对医药兴趣浓厚。私塾八年后，就能背诵汤头十余首。一九三三年，日冠侵占青龙，大好山河，变成凄凉一片，刘先生感于[illegible]之苦，民族之危，年仅１４岁的刘先生为求得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继承父业，立志学医。在学医和行医过程中，刘先生坚持既要继承，又要发扬的精神，对温病从病因到诊断和治疗颇有见长之处，为当地留下一些可贵的理论和验方。

医分门户，各有所长，古来有之，金元以后尤为明显，各家各派多有形成。明末吴有性就是一例，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由外感而引起的温病原因、传染途径和治疗方法，创立了温病学说。刘天锡先生，根据《内经》、《伤寒论》和结合多年临床实践，对温病很有研究。他认为温病即系外感热病的总称。它的成因，主要是人体感受外邪侵袭而使人患疾，即自然界气候的风、寒、湿、署、燥、火的六淫之气和带传染性的戾气侵垄人体而造成的。同时，刘先生认为，单纯

的外在因素并不能使人发病，而是与人体内在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的，外界气侯变化，虽然能对人体发生影响，但不可能直接致病，必须在正气虚弱，不能适应外界气侯的情况下，疾病才会发生。

刘先生根据温病来源和人身脏腑特点，对温病按“三焦进行诊断和治疗。他在诊治温病过程中，又分温、署、湿、寒。温，一般为春温，治宜以凉解处之。署温，常发生夏日署热之时，治以寒解为宜，若有汗者当以和解加生石膏为宜。湿温多得于夏秋之交，阴雨连句，湿气入肺，传入上焦，窒塞胸中，治宜以白虎汤加苍术为佳。寒温，为冬月患感，本多伤寒，若迂有寒时之暖则为冬温，往往过时而发疾，表看很像伤寒，实为表寒里热，如单纯开泄或凉解仅助邪内藏，必开泄与清解结合为妥。刘先生为了对温病从诊断到治疗便于记忆，编写了《温病心法歌诀》。全书以“三焦”论证和治疗，上中下各焦三十五首，另外有二十句温病热疾凶脉证诀一首，共一百零六首，达五千六百余字，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温病的起因、症状和治疗方法。例如刘先生在上焦温病脉证歌诀中说：

上焦温病脉可知，寸口宏大头有疾，
脉数为阳表有热，有力无力辨实虚。
中焦温病脉证歌诀：
温入中焦脉浮宏，数大沉实在脉中，
若迂浮脉无表现，间有促脉相应生。

在治疗上，一般根据春温、夏署、秋湿、冬寒的特点，实行凉解、寒解、和解、清解和宣解等方法。为了便于记忆与使用，撰成歌诀，如主治上焦温病的桑菊饮歌诀：

温症微热与微渴，辛凉轻剂桑菊合，
杏仁薄荷连翘桔，甘草芦根治热咳。

又如主治中焦温病的大承气汤增补汤歌诀：

中焦实热大承气，厚朴硝黄共枳实，
体弱当下增补剂，元参麦冬细生地。

又如化斑汤歌诀：

温病恶汗出与凶，反发斑疹热毒攻，
化斑解肌石膏君，犀角元参草知梗。

又如治疗署温三才汤歌诀：

署邪久热寝不安，神志不清食不甘，
阴液元气两亏损，三才天冬参地添。

刘先生根据临床经验，曾撰写《防治流感的几点体会》、《谈谈传染性痢疾的辩证论治》等论文在省刊出，对关于温病的病因、病机、转变和治疗方法等问题很有见长之处。一九五三年被河北省中医学校聘为业余辅导员。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请为中医研究员和中医情报员。

刘先生不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进行积累，对民间有效验方也进行积累和整理。治疗五更泄的固元散验方就是一例。即：硫黄１５克和新做热浆豆腐一块、稻草二根。把豆腐块切下三分之一做盖，把三分之二的豆腐块挖成能放十五克硫黄大小一个坑，把硫黄轧细装入坑内，上面用事先准备的三分之一豆腐块盖好，再用两根稻草横三竖四的缠好，放在瓦上用火将稻草焙胡，豆腐里外皆焙干，然后将焙胡的稻草、焙干的豆腐块和硫黄一并轧细过箩成面。成年人每次一克半，日服三次。五岁到十岁每次半克，白开水冲服。无论是

久泄或五更泄，服后当日见效，连服三、五日即可全愈。此方虽系民间偏方，但对元气不足，命门火衰，脾肾两虚，清阳下陷者都可用之。青龙镇张建国、杨素珍和安达石村苏玉山妻，都患五更泄一年以上，每到鸡鸣必须起床便泄，经打针服药均无明显效果，用此方几日后全愈。

针灸见长的王金文

王金文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卒于一九五九年十月，本县隔河头乡吴丈子村人。王金文先生，家境贫寒，自幼体弱多病，十六岁为了生计，经亲友介绍到甘肃省安西县城一家饭馆学徒。此间，他又拜在一位针灸大夫门下为徒。由于自己饱偿了体弱多病的痛苦学医认真刻苦，对《内经》中的“灵枢”部分和《针灸大成》等书，埋头钻研，不耻下问，潜心体会，深有所获。老师见王金文如此用心攻读的精神，实堪可佳，加之自己飘泊一生，虽然身获绝技，但膝下无嗣，即收王金文为义子，将多年临床经验倾注王先生一人身上，王先生白天在饭馆干活，晚上承师亲传，教者无私，学者有意，很快掌握了针灸基本知识，饭馆三年学徒期满，王先生拒绝了饭馆重资聘请，愿侍俸古稀之年的义父，以报效师徒和父子之恩，老先生见王金文一心无它，品行端方，又把经络之外的几个穴位和专治骨髓炎的绝技和全部书籍，授予了王金文。

王金文送终义父回到自己家乡，正是青龙解放前夕，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王先生为了把所学针灸医术解救家乡人民病痛之苦，夜以继日奔波在家乡的沟沟岔岔，尤其日冠投降青龙解放后，饱偿旧社会之苦的王金文先生，精神焕发，继承师教，并根据临床经验不断创新，把针灸从实践到理论向

前推进了一步。

王先生对针灸事业，虽经名师教诲，但他在临床实践中，以大无畏的变革精神，开拓进取，多有创新，促进了针灸事业的发展和提高。突出的，是以三十六穴，代替人体三百六十穴的经验，轰动了针灸界。一九五九年七月，河北省卫生厅在保定召开全省针灸经验交流会，王金文先生在会上，从古人的四总穴、八法、八会、六十六穴太乙神针、马丹阳天星十二针中，进一步研究发挥，证实了古人这些临床中的主要穴位，确实具有独到的治疗效果。所谓主穴，均为经气在人体转输交会处所。他根据腧穴的特点，在临床中采用主穴疗法，减少多针的麻烦和患者痛苦，收到了满意疗效。王先生灵活运用三十六个主要穴位，治疗各种疾病，甚至一些疑难和绝症，都收到了理想效果。

王先生常用的三十六穴位如下：

手太阴肺经：列缺；

手阳明大肠经：合谷、曲池；

足阳明胃经：足三里、天枢、解溪；

足太阴脾经：公孙、阴陵泉、血海；

手少阴心经：通里；

手太阳小肠经：后溪；

足太阳膀胱经：申脉、昆仑、承山、委中、肾俞、大杼；

足少阴肾经：复溜、照海、三阴交；

手厥阴心包经：内关、间使；

手少阳三焦经：外关；

足少阳胆经：足临泣、阳陵泉、环跳；

足厥阴肝经：行间、中封、章门；

督脉经：灵台、风府、人中；

任脉经：上脘、中脘、下脘、气海。

王先生在“腹肚求三里，腰背委中留，头顶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四总穴基础上，重点抓住八脉交会穴位：公孙交会内关、后溪交会申脉、临泣交会外关、列缺交会照海。在临床中，王先生反复实践得出足三里交会合谷。交会即是五行中相生之意。如水是金之子，列缺者肺也，照海者肾也。（五行说，肺属金，肾属水）二穴相会即母子关系，母有病当取子之穴以救之，子有病当取母穴而补之。由此推出肾经循行部位有病疾可针列缺；肺经循行部位有疾患可针照海。其它类推。本县隔河头乡王秀峰之妻，唇吻生疔疮，恶寒战慄，冷汗出，面肿口难开，脸色青黑，痛疼难忍，家中已做后事准备。王先生取穴内关与合谷，对侧交差取穴采用泻法进针，每日一次，两次即愈。

王先生对所有患者，从诊断到治疗认真负责，用四诊明辩疾患，抓住阴阳总纲，辨清表里寒热与虚实。根据“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者泻之”和“虚补其母，实泻其子”的法则，学会运用寒、热、补、泻的不同针法，达到疏通经络，调理营卫，使阴阳平，脏腑安，手到病除。

王先生针灸具体手法，主要是弹针验虚实和病疾轻重与寒热补泻法。即将针刺进机体后，找到感觉时进行弹针，若有热感则为虚寒症，若有凉感则为实热症，若在某经俞穴上针后无感觉，证明此经病重。如：胃病针两足三里穴位时，左侧感觉明显，而右侧无任何感觉，证明病在右侧。王先生在

补泻法操作上，正手拇指向外捻或摇针向外，患者有热感，此乃补法。反之，拇指向内捻或摇针向内，患者即有凉感，则为泻法。若正手拇指向前捻四转，向后捻三转为阴术；向前捻三转后捻四转为阳术。向前捻主凉而泻，向后捻主热而补。本县平方子村彭泰之女，十八岁，严重近视，连炕席纹都看不清，腰部疼痛。王先生诊断为肾虚寒，肾阳不足，取穴照海，用补法针三次全愈。青龙镇谢丈子村谢林，两眼近视多年，而各地求医无效，经王先生六次治疗全愈，是年义务兵体检合格入伍。本县下抱榆槐村刘德明，下肢患骨髓炎成漏，浓血淋漓，只待截肢而求王先生治疗。王先生针刺要穴并外用药洗，很快治愈。刘德明念念不忘王先生高尚行经，称王先生的针法为"神针"。

关馥庭、王翰章、刘天锡和王金文四位先生业已相继逝世，他们留下的医疗见长独到之处和高尚的医德风尚则是后人难能忘却的。建国四十余年后，总结整理他们医疗实践经验和著作，是发掘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工作，是党和政府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政策，对发展我们国家和当地中医与卫生保健事业，以及青龙历史的研究都有现实意义。四位先生只是建国初期我们县医疗界的代表，今天回顾他们，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昌明医疗卫生事业。由于本人水平所限，虽然对几位先生做了多方面调查，但是，难免有错误之处，请知情者予指正。

青龙镇解放前后

工商业发展概况

邵毅然　　韩文儒

青龙满族自治县驻地青龙镇，是个比较古老的城镇，早在清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乃至解放前后，工商业发展曾出现过几起几落，清末民初曾有烧锅两座，东烧锅位于现在的县委院内，西烧锅位于现邮电局院内；当铺一处；粮食、糕点、日杂百货店铺多处。

自民国十三年直奉交战后，直军从奉天败退途经我县丢弃了很多枪支弹药，促使地方匪患叠起，当时由于兵戈搅扰和匪队的抢掠，使工商业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外地来此经商者被迫移往它地，烧锅倒闭一处，仅剩一处，当铺也因此无法经营而倒闭，很多店辅门面不敢正常营业，那些本小利微的经商者有的弃商务农，有的避逃外地。

在民国十五年前后，青龙镇的一些商号有：德发号，经营日杂百货，地址是现六区社院内，东家叫马老玉；德成永，经营日杂生活用品和糕点，地址是现政府前院，东家是马老文；成发合，经营日杂百货，兼营中成药；正发达，主要经营日杂和糕点，地址现青年门市部处；同巨成，主要经营米面粮食，地址在蔬菜公司楼及院内，东家是马老明；德发号饭馆，地址在国营第一饭店处，东家叫陈老祥。工业方面：公巨泉即东烧锅，主要酿酒，东家是马圈子乡二道丈子王举

人，烧锅经理叫曹老井；西烧锅主要是酿酒，地址在现邮电局院内；手工业方面：香铺一座，地址在现教委院内；烘炉一座，地址教委院内，东家邵老秀，经理陈老仕。

在民国中期，在商业上曾出现"贴子热"，凡设有门面的商号都以帖子顶现钞。当时出过帖子的商号有：公巨泉（烧锅）、余庆永，他们经营染房带肉铺，东家是土坎子村小秋沟老马家；三益成，主要经营肉铺，东家是大丈子北山马家；涌兴成，主要经营日杂百货，东家是三叉榆树池应洲；成发合、致纪粮店地址在现医药公司西院，伪满时期又改成花纱门市部，东家是大丈子南街马老致；龙凤斋，主要经营制做糕点，地址在书店西面，东家是北街郝凤楼。当时按上边规定，凡出帖子的商号都要根据本商号资金多少来定出数额。致纪粮店经理马老致则不然，他依靠迁安县建昌营商号有门路和熟人多，从那里赊货来当地出售，他在东街路北设立门面出帖子，马老致表面上人议道德，骨子里却是阴奉阳违，利用帖子放高利贷，贫民借他家的帖子每百吊钱当时他就给扣下十吊为上缴利，借户仅能得九十吊，这仅是一个月的利息而其他商号或富户放贷月收三分，就这样马老致坑人甚多。他不仅在经商上刻苛贫民，而在家中也是丧失人伦，不顾廉耻，竟将儿媳霸为已有，将其亲子马德福气得下关东另谋生路。马老致暮年很不得意，临死之际，儿子也没回家，死后妻子又带着子女改嫁他乡。龙凤斋老板郝凤楼更是个贪财如命之徒，他也是以帖子高利放贷而发了家。其长子郝玉芳三十余岁患痨病死去，次子郝玉芝不务正业，解放时入伙会随赵辅臣逃往口里，后收编改为解放军在一次战斗中打掉一支胳膊，不久复员回家，该子对其父甚为不孝，郝凤楼死时，

连口棺材都没给买，用芦席裹尸而葬。其它商号放贷均好于致纪粮店和龙凤斋。当时的工商业发展上无多大进展。

自日本侵华改伪满政府以后，青龙镇的工商业一度形成稳定局面，当时，外地绅商来此经商的比较多。如北极春饭店就是天津人与当地伪警务科长、警察大队长张金祥合伙经营，大部厨师也是天津人，饭店的主食与当地不同，有锅贴、烧麦、大米饭、水饺等，在菜肴上真是山珍海味样样具全，在烹调技术上，可称是味鲜香美，手屈一指的饭庄。每逢伪县府宴请宾客和地方僚属都包席此饭店，饭店地址在现在的农业局和法院院内。第二处是宽城药王庙杨兰斋来此开设的广生客栈，临街设有主副食齐全的餐厅，中间设有供旅客寄居的客房，后院还有客商们洗沐的浴池，由于饭菜和住宿条件优越，买卖很兴隆，地址在现在的百货商场院内。大丈子五道庙前（即百货商场处），曾有四五家商号占用，广生客栈居中，东面是双益成，由方世昌、孟玉棠二人连东代掌所开设，经营的商品有日杂、糕点等，双益成由于经营得法，买卖一直较好，方、孟俩人友谊甚厚，合伙经商多年从没有闹过意见分歧，直到解放前夕，双盖成关闭时他俩仍友好如初。广生客栈的西侧面是卖鞍马套具和挽手的货摊，再往西是东升客栈，西邻又是永成合染房，再往西南就是东烧锅后院，即张金祥的宅院，当时大丈子街中心还有东升商号，经理叫宋升九，该商号所经营的商品有：胶鞋，纸烟等，他们是批发、零售兼营，地址在现在的六区社门市部北街。益源昌商号，经理王贺修（玉田县商人），所经营商品是花纱及各种布匹，其门面设在现医药公司的门市部处。籍老德、籍明远药铺设在老东胡同东侧临街，主要是医药兼营，并有小量的药

材批发业。通盛永商号是由平泉商人在此经营，他们主要经营批发火油、火柴，纸烟等。上述几家商号，资金较雄厚，在伪满时期他们的生意都比较兴隆。

当时小本经营的商号有：恩义兴，经营日杂生活用品，买卖比较平常；义发兴商号，经理张长春，其本人有制做糕点技术，加之该人能说会道，经常从大商号那里赊来面粉、油料等，做出成货销售，售完再归还原料成本款，他的买卖搞的较为活跃，该人在同行中也较随合，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于1954年县政府成立工商联合会时，被推选为工商联合会主任。他所经营的义发兴商号1953年就已停业了。

青龙镇的工商业在解放初期至土改建国前又出现一度潇条。原因：一是1945年冬赵辅臣的叛变，对刚刚解放的县城进行了袭劫，闹的当时社会不安，人心不宁；二是1946年至1948年土地改革运动，农会应运而生，没收地主、富农、绅商的土地和财产，使一些经商者受到波及，当时除几家药铺外，所有的商号门面几乎全部关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青龙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了喜庆解放的大道上，县政府再次从双山子迁到青龙镇，在国家安定，人心思治的大好形势下，青龙古镇的工商业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县城内的工商业情况是：由双山子迁来大丈子的国营贸易联合公司一个，经理是刘荣歧，当时我也在贸易公司工作，不久调刘允复任联合公司副经理，这两位商业领导人，对商业知识非常丰富，各业的生意也很兴隆，当时因条件所限，所经营的商品也受到制约，所经营的商品有：日杂百货、布匹、五

金、医药、粮食、食盐、农资土产等；联合公司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新成立了农副产品收购部门，收购的项目有：棉花、药材、油料、木材、皮毛、农副土特产等。1951年后半年，根据社会发展，城镇人口逐年增多的消费需要，在以贸易联合公司为母体的基础上分为三大公司：即百货公司、粮食公司、土产公司，马成奎为百货公司经理；李树荣为粮食公司经理；杨显庭为土产公司经理。根据当时的供销需要各公司在县政府西头征用土地扩建房屋和商业门市部，五十年代末期，商业上又分出五金公司、医药公司、服务公司。那时私人商业仅剩二、三家药铺，别无门市。在当时政策允许下杂货小摊点还有多处：肖庆明、于富、肖庆丰、历永宽、齐成、阎臣丰等，他们从百货公司批发部以批发价进货，到市场上按国家限定价格出售。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把上述的人员和摊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他们分别设立几个门市部，出卖日杂百货及食品等，他们统归国营领导，各门市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核算。

青龙镇的工业起步较晚，最早建立的工业是小烘炉（现戏校院内），后迁到三叉榆树路南，改称青龙机械厂（现水轮机厂）。该厂创始人许子贤、马玉、王贺修，在建厂初期的资金是由10个股东筹集的。后来从平泉来了一位自带资金、带技术人员的于凤恩，创办了印刷厂。青龙县城这两个较大型的工业企业都是由个人集资建起来的，又经公私合营而扩建发展起来，由于经营管理得当，在文革前都是我县盈利单位。五十年代的中后期相继又建立起了缫丝厂、硫磺厂（后来倒闭），酒厂等企业，这些都是国家投资兴建的。

青龙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概况

徐恩霁

１９５５年我县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取得主要成绩，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缩小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以１９５５年为例，全县工业总产值为2，８３６.６００元，其中私营占４.２３％，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５０％。私营工业如铸造业（铧、铁锅）、食油加工厂等基本实了全行业的加工定货、收购等初级形式的改造。在商业方面：私营经济（包括经销、代销）的比重据１９５５年底统计仅９９４.０００元，占社会零售总额的８.３２％，社会主义经济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已占绝对优势，私营商业被改造者为６５户，占私营总户（３７６户）的１７.３％。在全县个体手工业者中，已组织起来的社组人数为２１３人，占总从业人员（５８３人）的３６.５％，产值为２９８.６００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４９.２％，迈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并为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现把基本情况概述于下：

一、改造的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巩固试点成果，县政府成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委员会，县长刘允复为主任，王兆林、马胜林为副主任，委员6人，下设办公室，由有关部门抽调15名干部充实办公室或工作队，以便协助领导掌握情况、研究政策，推动改造工作。

二、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工作

据1954年普查，全县共有陶瓷、铸造、印刷、木器、烘炉、磨坊等7个行业（陶瓷主要在缸窑沟，当时青龙、宽城未分县）。雇用三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业有7户，职工共56人。1955年产值120，000元。这些大部分集中在大丈子、干沟、宽城等较大集镇中。其主要特点是：小型的多，大型的少；合资的多，独资的少；行业多，户数少；没有机械动力；全是手工作坊，资本家带技术参加生产；经营分散，产品主要销往农村，手工业产品的产销带有很大的季节性。1956年春节已把印刷、铸造锅铧二户完成合营，（即县印刷厂和机械厂后改为水轮机厂），又把三户陶瓷业改为公私合营。

根据政策采取以下两条措施：第一，在同一地区有两个以上相同的私营企业（如缸窑沟的三户私营瓷厂）根据国家计划，结合全行业改造，分别技术先进与落后，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整顿，产销平衡，技术设备修整，改善经营管理后，进行合营；第二，在同一地区只有单独的私营工业户，在确定私股股息后由当地相同的地方国营吸收进行公私合营，（如大丈子印刷厂、锅铧铸造厂）。

三、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小贩的改造工作

1955年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小贩进行普查，全县共有私营商业365户，从业人员422人，总资金为75,800元，每户平均201元。在总户数中日用百货占55.1%；食品业占10.7%；饮食业占21.5%；其它占12.7%。其中绝大部分人占有一部分土地，多是经商为主兼营农业。在1955年底，农村经过经销和经营小组等社级形式改造的小商小贩占私营从业人员的27.3%，其中，合作饭店占3%，合作商店占4.3%，代购代销占4.3%，经销户占12.7%。

经过改造的私营商业在经营过程中，普遍反映："收入固定，营业正常，生活有保障，社会地位变了"。到1955年末社会主义的国营、合作商业零售额占社会零售总额91.68%，全县44个供销社和零售点布满农村，从业人员613名，平均每638居民中有一购销人员。全县私营商业人数为422人，至1957年全部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在对从业者改造中，转化为供销社商业网职工203人，采取企业过渡为商业网点86人，以固定代销员形式活动在指定区域，以手续费形式作报酬代替工资。其余有35人是以农业为主，有季节的兼营卖小吃为副业的不予改造。

对私营商业和小商小贩的改造采取的形式是：一是依据小商小贩独立经营的特点，主要采取全行业组织起来。对摊贩组成合作小组，对个体商店以组织合作商店。二是零星小商小贩在较大集镇者，组成合作小组，统一领导经营，在农村的实行代购代销。三是农村富农兼商者采取合营形式。

未改变成份或政治不纯的商人，暂用代购代销形式组织。四是对跨行业经营者，以其经营特点，有口的归口，无口可归的与相近似行业组织在一起进行改造。

四、对个体手工业改造工作

据1954年调查，全县个体手工业共有八个行业，207户，从业人员583人。流动资金额47，610元，到1955年总产值为306，900元，特别是生产高度分散，半数以上为农民兼营，生产产品多为当地产，当地销，且季节性很大。到1956年底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成立19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社员340人，手工业生产小组23个，组员144人，由国营改造的41人，弃工从农的58人。

1956年8月，我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完成，原个体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在县城进行游行庆祝。

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龙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81年10月21日召开。第一届委员会推荐委员79名，会议选举于深同志为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Ж

青龙水运简述

彭书正

水上运输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运输办法之一。青龙县利用水上运输是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县境内虽有青龙河、起河、沙河、星干河、都源河等自然河流，但能搞水运的仅有青龙河，还是季节性（汛期）航运，其它季节因河水流量减少，均不能航行船只。现将建国前后青龙河水运和渡口情况，简略述之。

一、青龙河水运概况

青龙河是滦河的最大支流，它发源于平泉县抬头山乡五道梁子，流经凌源、宽城、青龙三县，至卢龙县注入滦河。该河由大石岭乡老岭湾入境，流经土门子、大巫岚、大于杖子、双山子、朱杖子、茨榆山、牛心坨、西双山、当杖子、娄子石、南杖子等乡镇，至桃林口出县境，本县境内流长223公里，流域面积3，188.29平方公里，河床宽50—700米，汛期最大洪峰流量每秒17，400立方米（1949年测于南杖子乡前炕土峪），枯水期最小流量每秒1.13立方米（1972年测于桃林口），多年平均流量每秒22立方米，结冰期为90—100天的长年河。

青龙河的航运历史发展，现已无籍可查，仅据部分老人介绍，五、六十年代以前，由于本县陆路交通运输不能满足

沿河两岸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农民联户和集体将本村生产的农副产品，主要是木材，利用汛期河水上涨季节，编排成筏，俗称筏子”（每个筏子约三、四立方米木材），成帮结伙，顺流而下，运往滦州（今滦县）出售。也有的商人利用河水上涨之机，由关内（滦河沿岸）雇用小帆船载运面粉、食盐、火柴、石油、红白糖、棉纱、布匹和日用百货等人民生活必需品，运往青龙各地，但由于逆水行舟，需人拉纤、风餐露宿，赤脚登程，异常艰辛。进入六十年代后期，由于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取代了青龙河的季节性水上运输。

二、青龙河渡口概况

河流虽能水上运输，但从陆路交通来看，若无津梁以渡，则交通中断。万里路途，系于一舟一桥，实为陆路交通的咽喉。青龙满族自治县境内的自然河流，纵横交错，自古以来，都是秋后搭建便桥，次年春季拆除，历年如此。直自六十年代后期，由于公路交通的发达，河流上永久性桥梁的建筑，基本结束了靠水运渡口。现在，仅青龙河尚有民间往来的渡口27处。

青龙河两岸人民，汛期河水上涨时历来靠小木船摆渡。至1968年大汇河渡口上游，半壁山大桥建成后，两岸人民才摆脱了涉水之苦。其余渡口没有什么建设，依然如旧。

大汇河渡口（建桥前）是青龙河重要渡口之一，青龙—建昌、青龙—秦皇岛、青龙—绥中、青龙—抚宁公路必经之处，车马行人往来络绎不绝。1959年以前，该渡口船只较小，汛期只能摆渡行人和马车，汽车无法通过，造成交通

堵塞，影响客、货运输，1960年，青龙县交通运输局补助大、小汇河二村造船款588元，制造了两只较大木船，把两船联结在一块摆渡汽车，使这条路线运输有所缓解。如迂洪水暴发之时，由于水势凶猛，船只仍不敢下水，需等候数日水势渐消，才能摆渡，直至1968年架起半壁山大桥，才使我县东部公路畅通无阻。

东蒿村渡口，位于东蒿村东侧，是青龙一龟石岭公路要冲之处。历年汛期交通堵塞，机动车辆不能通行，渡口仅能摆渡马车和行人。

另有瓦房渡口，它是青龙一抚宁公路必经之河流一起河。建国前虽建筑过起河木桥，均被洪水冲毁，每逢汛期就靠木船摆渡车马、行人，直至1979年双山子大桥建成通车后渡口木船随之淘汰。

除上述三处较大渡口外，其余24个渡口，均为乡村道路渡口，木船较小，摆渡行人不多，是专为本村和邻村居民提供方便的，所以造船、船工都由本村统筹安排，仍沿袭过去旧方法，不收渡船费，等到秋收之后，到各户，齐"船粮"，给多给少均可。齐"船粮"范围一般是受益邻村居民住户。

彰树化青龙

张治文

青龙满族自治县位于燕山东麓，史考，燕山原为唐初天然北境，青龙属幽州柳城，毗邻山海关。那时山海关乃为九塞其中一险，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而青龙扼据其咽喉，以古长城贯穿其境。以长城为界而称为口里、口外。青龙彰树也是从那时开始。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重林果于国基，传奇故事颇多，其中以彰树固边为首闻。何谓彰树？就是表彰以树，以树彰民，忠于霸业，固于疆土。唐太宗率兵东征平定边乱后，凯旋长安，举行庆功大典，将所征的幽燕大片土地分封随征的有功将士，并命其屯田守边。为了使这些将士安居乐业，尽心戍守边关，由皇家金库中拨给银两，建立屯舍和庙宇，屯舍予以安民心，庙宇用以祀功。在京城修筑"凌烟阁"等建筑物，而对边关荒丘，奖给大量树苗树种，广为栽种，称为御彰之树。当时皇家提供的树苗有：梨、桃、栗、柿、枣、核桃、山楂等食用干鲜果，还提供了松、柏、榆、杨、椴、柞、柳等十多种用材林木。至今在民间还流传有动人的传说：长安取果，终南取树，於铄贤圣，总统邦域，燕塞安心，封土英雄，千佚万担，运彰树苗，车行山海，马步居庸，甚为隆重，此谓大唐慰戎盛举。守边戍民为防范野兽危害人畜，将御彰之树密植在屯子周围，作为屏障，故屯名多为障子。屯与屯之区别则以姓氏区分，如李障

子、张障子、王障子等。屯头、屯中、屯前高岗、离村近处的山头分别植彰树相照。照树分单照、双照及山照，故有的屯子以照树命名，如柏树底下，柳树衍，杨树底下等村。屯照、山照谓之立屯的吉祥景物，以表示村永远安乐。将御彰果木植于向阳的屯边荒丘、溪边、川岸或专造的果山苑。为此，也有以花果梨苑命名为屯名的，如花果山、大梨苑（园）村等。还有以彰树植成界丈，以示袭有。因此，又有以界丈为分支为村名的，如头道丈子、二道丈子、三道丈子，小大丈子村等。彰树为丈，彰树为照，彰树为苑，彰树为界，彰林相接，根苗繁衍，立地千秋，蕴育百宝，珠露成荫，林绿果红，水山相映，娇美寓富，造福子孙，代代相传。屯屯、村村座落在郁林花果之中，鸡鸣知天晓，鸟语显地灵，人才辈出，康乐无穷，幽燕边塞生机勃勃，自然风光更为壮丽。

从唐初至今历经了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十三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历程中，由于广大戎民的辛勤劳作，变荒凉幽燕为绿洲，对开发山区作出了巨大贡献，清顺治入关后，御封八旗子弟，燕山以西镶白旗，中间为正黄旗，燕山东为正蓝旗，跑马圈地不侵障，障子历代扩大，遍及幽燕，北到热河八沟（现平泉县），南抵长城，西至京西延庆，东跨山海关直到渤海滩。唐彰林果随障成林，亦蔓满幽燕，延伸于长城内外。古屯、古树、名果、名碑沿革至今均无大变化。尤以承德地区和秦皇岛市所属各县处处可见，青龙满族自治县是燕山腹地，全县４２个乡镇，仅有两个乡无丈子村。全县有自然村２２１５个，其中有丈子的自然村３３３个、照树村１０个、花果苑（园）村１４

个。三种林丈村共357个，占全县自然村的16%；但现在的林果早已突破丈子，现每个自然村都已绿树成荫。龙王庙乡榆树底下村，村头的古庙前后的双照彰树仍负有盛名，庙后的古榆、庙前的古松，都有千年的历史，故称该村为长寿村。该村的古榆、古松树干粗大、三人合抱有余，主干高达五十余米，两树覆盖遮方园三亩，七十二条旁枝侧干似群龙飞舞，支干缠绕相叠呈巨大伞状，树冠十余棚，棚棚参差如披发，针叶蜜蜜叠叠，泼水不漏，光照不透。每逢盛夏三伏，村民不约而同会聚古树之下，乘凉午休，真可谓古人栽树，后人纳凉。民间还传说，老岭背牛顶的柏木梯也为唐彰树所制，现为秦皇岛旅游开发绝景。现在，留存的古唐彰树虽然不多，但唐彰林果已繁衍成族，覆盖着幽燕大地，绿化着长城内外，养育着山区人民。龙王庙乡榆树底下村在1978年搞农田水利时，掘出梅氏古墓一座，有墓志铭："大唐赐福，荫子孙千秋；幽燕屯田，恩荣林果木；塞外桃苑，松柏榆寿久；镇夷伏地，钦封永袭有"。可见古人以此为殊荣，引为骄傲。

唐彰林果，也是后来燕山林果苑的基础。燕山林果，历代为农民栽种嫁接的主产业之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果政策的落实，出现了大兴植果热，个人园圃、集体果园、联办果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燕山和京、津、唐、秦各地市的很多县成为国家干鲜品基地，八达岭的枣园，燕塞湖的桃林，易县的柿子，迁西县的燕山板栗，兴隆县的山楂和板栗，昌黎的梨，抚宁和卢龙核桃，青龙的苹果都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果品基地。

青龙的果树遍及全县，乡、镇、村、组、户的各类果园

8.5万个，户均250棵，人均51株，全县共有果树3100万株。青龙的彰树化在燕山具有代表性，其立地条件得天独厚。解放前的青龙就曾有四大片原生林区：都山、老岭、东大天和北冰沟。青龙果林近年来发展可观，保持传统的名优果品盛誉中外，板栗、苹果、核桃、杏仁曾出口香港、苏联、蒙古、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保持名优果种的基础上，近年还从外地引进很多新优品种，如苹果、桃、梨、葡萄等十余个品系和百多个品种。其中红星苹果，在七十年代曾多次参加全国及河北省苹果芽变选种鉴评会，均名列前茅。1985大巫岚乡蛤子汀村生产的红星苹果在河北省果品鉴评会上名列第一，双山子镇古楼寺村的红星苹果在全国鉴评会上被国务院选为国宴佳品。

青龙彰树化，是满汉民族祖辈繁衍生息之基业，在彰树化中付出了大量血汗。使全县的植被覆盖达47%，果品生产由解放初期的不足千吨，发展到现在的三万吨，增长二十二倍，已成为山区农民的经济支柱。建国后的四十年中，青龙人民继承戎民先祖的遗志，开发建设家乡，在“科技兴农，林果先行”的方针指导下，青龙人民不断奋进，把林果的发展视为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党的十三大精神鼓午下，认真贯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不断深化改革的方针，完善农村经济结构，不断改变山区面貌，使唐彰林果永保根深叶茂。

张金祥讨伐队的成立及活动情况

郑连平

解放前，我县有一个最大的反动武装—警察讨伐队，司令为张金祥，故称张金祥讨伐队。根据有关资料和实地调查，兹将张金祥讨伐队的成立及活动情况概述如下。

一

１９３１年初，青龙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称都山设置局，当时张金祥任都山设置局公安局第二区公安分局长兼任公安分队长，共有３０多人，负责本地区的社会治安。同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被日军占领。１９３３年，向热河、华北侵犯，二月七日，日军飞机轰炸双山子街，将都山设置局长王珣炸伤，陆呈审炸死，设置局其它僚属逃往口里，从此，都山设置局解体。此时青龙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活动猖獗，但张金祥负责的二区公安分局并没有解散。七月份，张尔舟由热河（承德）带宣抚班来到双山子准备恢复县的机构，被土匪老耗子撵到建昌营，张金祥带着公安队成员到建昌营将张尔舟接回大丈子街，张尔舟组织十个民团进行剿匪，将张金祥的公安队改编成日伪保卫队，张金祥任保卫队队长，保护张尔舟的安全。八月份，成立伪青龙县公署，张尔舟任县长，因张金祥

保驾有功，被张尔舟任命为警务局局长，掌握伪青龙县警务界大权。一九三五年由于张金祥任用私人过多，被日本参事官高迁长吉（付县长、掌实权）将其免职，张金祥回到老家牛心坨任村长。

青龙县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以后，随着日伪统治的加剧，人民抗日活动也不断高涨，我冀东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游击队司令员王平陆夜袭青龙境内的清河沿警察分驻所和海关税局，同年六月七日，冀东各县暴发了我党领导的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建立了近十万人的冀东抗日联军（其中我党领导的有七万多人），攻克了昌平，迁安、玉田、卢龙，乐亭，平谷等八个县城和许多集镇。九月、八路军四纵三十一大队一部和地方游击队，在营长吴伟率领下出白洋峪口，前进到狮子坪，凉水河一带，伏击了敌伪四辆汽车、袭击了凉水河警察署和兴农合作社、击毙署长徐吟涛，活捉了五名日伪人员。一九四〇年七月，胡玉升等到凉水河、北马道村组织农民报国会，随后又在东马道村建起了报国会，这一切皆使日伪人员惊恐万状。伪县长与警务科连连向伪热河省警务厅告急，呈求对青龙增派军队，并在青龙组建地方武装，以应付八路军、游击队和群众的抗日活动，这样从一九四一年开始以汉奸、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为骨干的巡防队，特务队相继建立，到一九四二年底，连同伪热河省警务厅从内蒙，东北调来的警察队，会同青龙境内的各种杂牌伪军如讨伐队、派遣队、巡防队、警察队、特务队等达十六个队，约二千五百人，统归县警务科指挥。张金祥重被任用，调到警务科接任刘丰年巡防队大队长职务，在

南丈子驻防，镇守界岭口，桃林口。

一九四三年三月，伪县公署为强化对这批反动武装的指挥，成立了隶属于警务科领导的警察讨伐队司令部，行使原警务科的指挥权。司令部成员由五人组成：司令由警务科长池尾（日本人）兼任，副司令为张金祥，兼巡防队队长，作战主任为日本人金杉担任，经理业务张敏，业务朱云甫。由于池尾平时要主持警务科日常公务，随军行动不多，而司令部军务多由张金祥负责，故称张金祥讨伐队。伪县公署将上述不同的伪军编成十五个讨伐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后来改称特高队），各讨伐大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副大队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掌握全大队的实权。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两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大队有官兵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五十人不等，武器配备有手枪，大枪、六〇炮、手榴弹等。这十五个讨伐大队是：张金祥队（由其弟张金池代大队长），于友三队，张雪涛队，赵辅臣队（后李凤阁接任、称李凤队），李兴绍队（后罗井仁接任，称罗井仁队），朱胜林队，孙德英队，姜大祥队，范文队，姜振中队，刘岐队，王锡祉队，李显队，程斌队，石振队。特务队队长张炳文（以后高占海、张桂林接任）。随着我迁青平，凌青绥联合县抗日政权的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斗争的不断发展，日伪仍感兵力不足，从一九四三年后半年开始，青龙又陆续增建了罗振帮队，李墨林队，张炳云队（后赵辅臣接任，称赵辅臣队），刘福臣队。一九四四年春，调走刘福臣、姜振中两个大队，撤销罗振帮，李墨林两个大队。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伪热河省警务厅从各县抽调大批警察讨伐队，建立了“一心总队”，警务厅长皆川矢之助任总大队

长，总部设在遵化，每个大队由三百人组成，在遵化县一带驻防，以强化满洲国境外围，和我冀东李运昌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对抗。青龙的于友三、刘岐、范文、王锡祉、姜大祥、李显、程斌、朱胜林、孙德英、石振等十个大队被调往遵化，编入"一心总队"，上述的十个大队被调走后，青龙只剩下五个讨伐大队和一个特高队，日伪深感兵力不足，于是又新建了于友增，李墨林、杨东阁三个讨伐大队和张继元骑兵队。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张金祥所属讨伐队共有张金祥、张雪涛、李凤阁、罗井仁、赵辅臣、于友增、李墨林、杨东阁八个讨伐大队和一个特高队，一个骑队兵共两千余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八路军从华北进入满洲，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在满洲西南"国境"—"热南搞了千里""无人区"。青龙地处"满洲国西南国境"，素与华北有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尤其是长城线上青龙一段的义院口、界岭口、桃林口、冷口、白洋峪口、擦崖子口等关隘，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通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一进入青龙，即派兵把守长城沿线。"七·七"事变后，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我党抗日干部，抗日武装频频出口，活动于长城沿线，不时打击日伪。敌人为了防止八路军出口，在长城一带开辟根据地，必须在长城各口增防设卡，使八路军不能进入，长城沿线清室空野，使八路军无处落脚，无法活动。张金祥为了讨好日冠，担任讨伐队付司令后，立即将讨伐队的主要力量布防在长城沿线，并积极配合

日伪集家并村修部落，捕杀抗日干部、群众，迫害抗日家属等一系列罪恶活动。

（一）捕杀抗日干部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是日伪军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基本方法，那里有抗日活动，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就有人被捕杀。一九四三年七月，伪青龙县付县长西岛宽（日本人）接受上级旨意，召开检举会，在县府后院密谋、由警务科、特务股、司令部、弘报股、协和会头头参加，办根除青龙一切反满抗日势力，决定秋前搞大扫荡，秋后大检举。同年十月开始集中大扫荡。日冠由东北调来日军七八个连队一千余人，伪热河省又派来五六个讨伐队８００余人。张金祥把全县所有的反动武装力量都调动起来，重点对黑河、九虎岭、青河沿、凉水河、宽城、宽甸子、老岭花果山、牛心山、隔河头、龙王庙、界岭口、都山周围，口里罗屯，太平寨、龙湾、铁门关等长城内外八路军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张金祥指挥驻防在双山子、牛心坨、三岔口、草碾、牛心山的讨伐队去口里刘营、沿河营、建昌营等边境地区围剿八路军，汤道河警察署和东梨园分驻所的武装力量进入冰沟围剿都山。同时，张金祥指使驻防在大椊椤树（现归平泉县管辖）、板城（现归宽城县管辖）的讨伐队在本管区内搜捕扫荡八路军。张雪涛讨伐队当时驻防在苇子沟（现宽城县管辖），张金祥指令他在驻地附近扫荡。张雪涛带讨伐队到彭丈子北沟枪杀我一名地下工作人员，逮捕去一名带到苇子沟西庄头，张雪涛下令将这名同志绑在一棵大树上，当作活靶枪杀了。在都山东部广茶山附近扫荡，打死我一名地方工作人员，捕去一名同志带到大椊椤树后被张雪涛用战刀砍死。

在龙王庙老区委院内，张金祥组织张向、张雪两个讨伐队二百多人与我冀东军区十二团一营一连作战，我军为了把敌人引开，使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六班长祝守田带领全班十二名战士把敌人引到北部槌子山一带在雪地里与敌人周旋，终因敌众我寡，全班战士光荣牺牲。

一九四四年二月，张金祥指使特务将被捕的六名抗日县、区干部拉到县街东门外满家沟北山，由高占海、张桂林两个特务队长亲自指挥，将六名抗日干部做射击目标枪杀。同年四月，到四区大巫岚一带搜捕八路军和抗日干部。一天夜里在郝丈子村秦木沟打死了凌、青、绥联合县第三总区长池昆，通讯员刘长珠、陈明久及老关系人王国臣，并灭绝人性地将烈士的头割下悬挂在县街东门外大柳树上示众。六月，八路军战士被俘后借机打入特务队的张树义、李品三、谢治国、李连生、何志民、张治民等同志，暗中商量准备遇有机会除掉恶贯满盈的特务队长高占海。由于叛徒谢治国告密，当即将张树义等五人拉到满丈子骆驼岭东沟里，高占海亲自用战刀砍死两名，其余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一九四四年十月，我区干部于相臣和区武装部长王××被张金祥讨伐队包围，在战斗中牺牲，高树义、刘贺被捕后牺牲于青龙县城。

（二）搜捕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张金祥指挥特务队到双山子一带搜捕抗日群众，在丁丈子抓来8名抗日群众，残无人道地摔死抗日群众丁久功的一个女孩，打残了丁的老母。特务队长高占海将抓来的五十多名抗日群众关押在双山子警察署的两间屋里，用凉水掺辣椒面、灌火油、火烧、板子打、夹手指等酷刑进行人身摧残，

在没有得到任何情况后、用汽车到县城审训半个多月，最后按所谓的“政治犯”送往承德监狱，一次判刑三百八十多人，其中判死刑的八十多人；其余送到本溪，鞍山等地服劳役。在双山子抓去的五十人中，只丁久功、于庆元二人生还，其余都受到非人折磨而死。

（三）分化、瓦解抗日力量。张金祥在指使讨伐队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的同时，还通过特务队分化瓦解抗日力量、使抗日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一九四三年十月特务队在全县进行自首活动，以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在前段的检举使抗日工作受到挫折，但抗战的烽火并没有被扑灭，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的日益高涨，因此，日伪又采取动员为八路军办事的人投案自首，可以宽大处理、并给予奖励等欺骗手段，以达到瓦解抗日力量的目的。在全县各警察署，村公所管区内搞自首发动。结果全县六百多觉悟不高立场不坚定的人自首登记。那些在敌人的诱惑面前经不起考验的人，意志动摇，变节投敌，充当了人民的罪人。一九四四年春，凌、青、绥联合县第三区总书记俞从民在四区核桃沟投敌叛变；三总区鸡冠山分区长刘宝友投敌叛变后充当了特务；十二团战士王忠投敌后成了高占海干儿子、成为特务队骨干分子。凌、青、绥联合县干部李运长、陶孟兰、潘守义、张新民等二十五人叛变后在特务队为日冠效劳。

（四）迫害抗日家属。一九四四年，张金祥指挥特务队参加对八路军家属驱除“国境”活动。特务股提出要八路军家属限期将自家当八路军或参加抗日活动的人找回来，向当地警察署投案自首，否则，超过自首期限便将全家驱逐到伪满洲国境外。特务队由二月开始至八月止

将所有抗日人员的家属赶到双山子集中营、最后被驱逐到口里谋生。房屋、财产全部封存交当地甲长看管，大部分被毁坏。那些以种庄稼为生的抗日家属，失去了靠维持生计的土地，在异他乡流浪，过着饥寒交迫的乞丐生活、在死亡线上挣扎。

三

为减少抗日工作的压力和阻力，我党抗日干部与部队首长对伪军伪警做了大量的瓦解争取工作。曾多次给张金祥写信，宣传我党统战方针，动员其联合抗日，同时，又多次责成家族，亲友去做工作，教育其不要死心塌地的当铁杆汉奸，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经多次联系与间接工作，张金祥镇压抗日的活动大有收敛，敌对情绪大大减小，有时还做些让步。他曾对部下说："为他们（指八路军）让让路。"

一九四一年八月，冀东区分党委在遵化县大张屯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大规模地开辟热南山区抗日根据地。会后派高敬之、姚铁民等带领长城工作团到口外探路，随后李运昌率十二、十三团各两个营及地方干部三千多人，分数路越过长城，会同先期到达的青平工作团大规模开辟热南，受到张金祥讨伐队的严重干扰破坏，在我党抗战政策的感召和对其分化瓦解，张的罪恶活动大有收敛。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团一营副营长马冀率一、三连出峪门口，进入青龙东部地区，在花果山，柏树底下，核桃沟，龙尾，黄石硼察地形，探敌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在官场乡鲇鱼洞沟遇上驻防在南丈子乡的张金祥讨伐队，马冀的队伍在前面，张金祥讨伐队在后面尾随，张金祥明知是八路军采地

区（就是开辟根据地），但双方没有正面交火，避免了我军不必要的伤亡，这样僵持了两天两夜，后马冀率队反回关内。

一九四五年初，日冠在苟延残喘之时对冀东进行疯狂的扫荡，作垂死挣扎。张金祥讨伐队配合日伪军在青龙县及附近各县进行大扫荡，并以都山周围为重点。因为都山是我党很早就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九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创造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宋时轮，李运昌率领二万余人向都山推进，拟在都山建立根据地。行至建昌营、燕河营一带，因连日阴雨，山洪爆发，又遇日伪调来大批部队阻截未能越过长城。从此，都山被日伪认为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这次敌人扫荡到平泉县大梓椤树村时，恰逢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带队从都山下来宿营在此村。敌人得知后立即组织日伪军和讨伐队四面合围。其中讨伐队和警察自卫团配合包围了三面，日军包围一面，此时如果我军突围，敌众我寡，势必伤亡残重，且很难成功。危难之时，采取什么万全之策才能化险为夷呢？身经百战司令员李运昌同志试探性地给张金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张司令，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了不当亡国奴，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我们自已的新国家，我们八路军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将很快取得彻底胜利，可是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你们的重重包围之中、恳切希望您不要干出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望张司令念咱们是中国同胞，请让出一面，以尽您抗战之真意。事成之后您是千戴留名万古留芳、前途远大，望您深思，如其不然此一战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我急待您的消息、切切。

夜晚十点，张金祥接到李运昌的信后，被我八路军坦诚的胸怀所感动，同时也被我军坚定必胜的战斗决心所震慑，立即给李运昌回信：请李司令放心，望今晚十二点以后从南开出，勿慢千万千万，李运昌按照张金祥所指的路线，从南面顺利地冲出包围圈，无一伤亡。

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张金祥的讨伐队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多方争取情愿投靠八路军，该部2000余人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东军区第三纵队。

张金祥讨伐队被改编经过见张凯、陈光、阎春正等人的回忆录；改编后该部队曾出现反复见枭峰的回忆录。

1946年春，国民党向解放区进犯，形势很紧张，我冀东军区大部力量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八路军第九纵队经常出关进关与敌人周旋，而敌军以人多为优势到处与我军相对抗，张金祥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动摇，开始了他的叛变活动。我冀东军区保卫部根据掌握的事实材料，为免除内部隐患，将张金祥秘密处决。

注：本文根据杨金珍、佟振庭及统战部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

关于接收青龙县伪军伪组织情况的回忆

许鸿翼（陈光）①

一、接收前的背景②

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极大地鼓舞着滦东的抗日军民。

冀热辽军区为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六月组织了三路挺北支队，向热河、辽西地区挺进，正当日寇作垂死挣扎，派来伪满"国兵"进关对我冀东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之际，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苏联红军于十三、十四日进入东北中部，解放了哈尔滨、长春、沈阳之后，日本于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解放区民众沸腾起来，欢欣鼓舞，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我们迁、卢、青联合县县委，除组织地方武装对迁安县城的伪军进行围困外，并派县委社会部长李国安去接收原迁安县境内的建昌营伪军及冷口的伪满青龙县讨伐队的伪军，用收缴来的大量武器，立即装备了包围迁安县城的县支队四个连。

这时，十六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徐志同志和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张凯同志来迁安城关附近，写信争取前不久来迁安城

驻防的伪满"国兵"一个团，令其缴械投降。同时，调十六分区的十二、十八两个团，由青龙河东赶来攻打迁安县城。由于连日大雨，青龙河水暴涨，部队无法过渡。

中央二号命令要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境内进发，冀热辽军区命令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十二、十八团等即速向东北进军。遵照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成立以李运昌同志为首的前委，包括徐志同志。要徐志同志立即回抚宁地区的地委机关，准备出山海关。

正在此时，伪满青龙县讨伐队司令张金祥派人来迁安县尚武旗村，，找做张金祥联络争取工作的王晓岚。王晓岚是当地的绅士，曾任杨各庄警察所巡官，三八年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最初组织民团追剿抗日暴动队伍，在当时抗日热潮及抗日的正义感召下，毅然率民团一起抗日。李运昌同志任命王为××大队长，后因失败，隐于丰润的腰带山当了老道。在一九四四年间，李运昌同志发现了他，要其做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争取张金祥，经过对张金祥进行一段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又由于张的家在长城外不远的地方——山拉嘎，这时已有抗日部队活动和地方抗日工作，再加上青龙西部都山以西，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已经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和青龙东部从一九四二年后半年至一九四四年已经建立了凌青绥抗日根据地，均已建立了抗日政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同意建立联系，不捕捉抗日工作人员。经过李运昌同志口头给以八路军第三纵队番号。

在日本投降后，所有在青龙县的日本部队和日本人，均已去平泉集中，张金祥在青龙宣布：他是"八路军第三纵队"。随即派人找王晓岚，要求派人去接收。

王晓岚携同来人，到迁安城附近找迁卢青县委负责人。当时，徐志同志、张凯同志和我接见了他们。张金祥派联络人员通过王晓岚提出，任其哥哥张笠生为青龙县长。由于时间紧迫，徐志同志决定，派我去接收，委我为接收青龙县伪军、伪组织主任，张凯同志协助，对外为部长，王晓岚同往（王晓岚是民主人士、五十年代曾被选为迁安县副县长）。

当时，徐志、张凯我们分析了张金祥伪军的情况，成份复杂，而且反动，张本人又存有严重的要地盘要权思想，他同意改编是处于形势所迫。为了稳定他们搞好接收工作，因此，决定按照李运昌同志口头答应给的第三纵队番号，接收改编（在我们去之前，他已经宣布第三纵队相当军一级）。第三纵队辖两个小团（每团四个连），一个机炮连、一个特务连，共十个连。同时，我们同意暂派其兄在青龙县任职。

估计在当时情况下，他会接受的。又研究了谈判策略，由徐志同志（李运昌同志把张金祥的关系交给徐志同志）以奉李运昌司令员的命令，写信给张金祥，告以第三纵队编制，并委派陈光为接收伪军、伪组织主任。要其协助接收伪县政府。

二、接收改编的方针

（1）首先接收改编伪军，使其尽可能缩小编制，并限于讨伐队本身人员，不准扩兵增加人员。

（2）其次接收伪县政府，考虑到为顺利改编其队伍，使其听候我们的调遣，采取过渡办法。任命其兄张笠生为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说明待将来实行民主选举）。下

设两个办事处，以凌青绥联合县为第一办事处（东部），张仲三为主任；以迁卢青联合县的青龙办事处为第二办事处（西部），王平东为主任，驻大丈子县城，都山以西的青龙部分，由迁青平联合县管理。各办事处，区内仍保留原属支队及游击队。全县的工作，完全通过两个办事处，直接领导各区，并接收伪满大村政权、警察署等。

另派王振元同志为民政科长、孟兴为财政科长，直接管理县里的工作。

（3）临时行政委员会只发一般性的指令，实际的具体工作均由两个办事处及其所属各区直接管理——发动群众，接收伪组织，建立民主村政权，收缴枪支（随时武装支队及游击队），以及一切行政事务。

（4）对于伪人员，因为我们已有整套组织，除有需要的小职员外，一般的均遣送回原籍。

为了能及时解决问题，经张凯同志提议，徐志同志决定在迁安秘密刻了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关防与司令员曾克林、政治委员徐志的名章，以便谈好后，随时任命改编军队的人员。同时，刻了一枚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印章，连毛笔、墨盒、委任用的布和纸都是事先准备好带去的。

徐志同志安排好后，要给他抽调三、四十名干部与武装警卫班，由他带去出关。还要再组织几十人，加强原迁卢青的青龙办事处人员，搞好接收建立民主政府等工作。他走后，张凯我们同王晓岚和县支队二十多人及县委的几位工作同志，交通员等，出冷口，去大丈子做接收伪军伪组织工作。第二办事处的几十人，随后到冷口外各地接收与进行区政府的组织安排，随时听候通知到大丈子集合。

这时、正是八月的下旬，阴雨连绵，我们冒雨第一站到达冷口外的肖营子（伪满青龙县大村公所），经过张金祥派来的联络人员电话联系，次日，我们继续北进，张金祥派来马队三十余人来迎接，驻于距县城十八里的蛇盘兔村。并告诉我们，张金祥已安排次日上午在县城街外，军民列队欢迎我们接收人员。

上午到达青龙城外，张金祥等带领军民，伪政府人员一千多人，列队欢迎我们这支只带二十名左右八路军武装队伍及由十余人组成的接收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人员。

进城后，在城内的伪协和会的一个会议室内，张凯同志我们二人接见了张金祥、部分伪军人员、伪县公署的伪县长、科长及地方士绅等三、四十人。首先宣布了我们的职务和任务，其次讲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特别讲了毛主席及朱总司令的各项重要命令，以及八路军出关与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情况。第三，伪县公署等伪组织人员，各按本位，造册等候接收。

三、接收改编张金祥伪军、接收伪县公署。

接收人员驻在当时青龙县城内最好的地方——伪青龙县协和会院内，由我们自已带去的县支队战士站岗，住室由警卫员值班。

当天由王晓岚携徐志同志亲笔信去见张金祥，介绍李运昌司令员对他的关照，任命其兄张笠生为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说明三纵队为旅级建制，改编为两个小团，主要理由是今后要和平建国，青龙县不需要那么多的武装等，果然合乎事先的估计，张金祥全部接受了我们改编的意见。

次日，张金祥亲自到我们驻地拜访张凯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徐志同志写来的信中转达李运昌司令员的意见，随即共同商定几条：

1、除张金祥本人外，要他提出两个团长，十个连长的名单，请求十六军分区和转报军区加委。所有副职、政治委员、政治主任、政治指导员、以及参谋长等人均由军分区委派。

2、十个连均按三三编制，各连均不配机枪。

3、立即把所有各大队集中于县城，造册、听候改编。所有人员必须全部到达，改编之日不到者，作为自动脱离部队。

现在的人员，愿意回家的，不强留在部队内（说明八路军是自愿参军的原则）。

4、原来非张金祥各大队所属人员均不编在部队内，由政府就地接收。因为在我们到达之前，张金祥曾经通知各大村的伪警察人员及民间武装，都必须携枪支报到，编在他的第三纵队内，因此才做出这一规定。

一系列接收过程与问题，每天都是专人向地委送去报告。

经张金祥提出团长、连长名单后，我们即写了任命书。加用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奉冀热辽军区司令委任张金祥为第三纵队司令员，李凤阁为三纵队第一团长，赵辅臣为第二团团长。由军分区任命各连长，经过大约一周后，告诉他已来任命书。

随即召开全纵队大会，宣布任命。当场发给张金祥为冀热辽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李凤阁、赵辅臣分别为冀热辽军

区第三纵队第一、第二团长的任命状，整个部队改编一千多人③。

在这次大会上讲了八路军的宗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指战员都应是自愿参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

把伪军全部接收改编之后，随即着手接收伪政府工作，同时按照徐志同志的指示，通知凌青绥县委书记何济民同志、办事处主任张仲三同志，召开临时县委会，由我主持，共同交流情况。大约作了如下内容的决定：

1、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是在当时我们主力没有进驻青龙之前，同时张金祥又握有二千人队伍情况下，为了临时利用并安抚张的心情，所采用的临时组织。这一组织是一个空架子、宣布张签生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四人：王振元和孟兴，分管民政与财务科，张仲三、王平东兼一、二办事处主任。

2、全县设两个办事处，第一办事处设在东双山镇，第二办事处设在大丈子。一切行政事宜均通过两个办事处向各区进行布置，各办事处仍按原两个县的青龙县境内部分不变。

3、所有伪人员，原则均遣散回家。下级职员分别情况，个别录用。

4、各区人员均由原坚持抗日的工作人员组成，并吸收当地抗日积极分子参加。

5、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村政权，区政权，接收伪村公所等伪组织，检举揭发汉奸特务，收缴武器，扩大县支队与区小队成员。

根据上述原则，宣布成立了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与任命主任、委员等。召集伪县长、伪科长及伪人员训话，讲明

政策。伪县长、伪科长等送十六专署转冀热辽行署。其余除留部分人员外，均允许回家，愿工作者可回当地政府去报名。

全县在接收伪军伪组织时，没有发生抗拒等问题，使我们接收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四、李道之同志带迁安县支队出界冷口，途经双山镇，抵达青龙县署所在地——大丈子。

伪军伪组织虽然已经顺利接收，但青龙县城还没有看到正规的八路军队伍，为了鼓舞全县人民，显示八路军的力量，十六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同志调来换了新军装、新装备机枪小炮，新步枪的迁安支队三个连，临时改名为军分区特务营名义（支队长吴作全临时改为特务营长）出界岭口口，途经双山镇，由东向西北浩浩荡荡进军，沿村扩大八路军的军威、纪律。行军三天，秋毫无犯，抵达青龙县署——大丈子。县支队的战士英姿威武，雄纠纠，气昂昂的四路纵队穿过大街，受到广大群众的沿街欢迎，被誉为真正的八路军。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热情。

我们向李道之副司令员汇报了整个伪军接收情况，进行了军政人员联欢座谈，包括被接收改编的第三纵队的部分干部，由李道之同志派牧野为参谋长，当即到职上任。以后又由分区派去一些同志任指导员等。

经过研究，为了更好更方便的接收伪组织，收缴武器，建立民主政权，动员张金祥改编后立功，由李道之同志带领他们一齐去攻打迁安县城。从青龙县出发进军迁安县途中，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秩序井然，两天后到达迁安县城附近，组织进攻迁安县城。

张凯我们二人随部队回到口里，即去卢龙燕河营地委机关，向当时的代理十六地委书记刘亦如（刘哲华）等同志汇报了整个接收情况，并交回了在迁安刻的军分区的关防及曾克林、徐志的名章。经过请示区党委（张明远同志负责）我仍回迁安县委工作。原迁卢青口外青龙部分，划归青龙县管辖，并任命张凯同志为青龙县委书记。

攻打迁安县城未克，张金祥部下均想回青龙，李道之同志允许其回去。不久，冀热辽军区令其去丰（宁）、玉（田）、遵（化）地区靠近九纵队附近驻防，并任命曹志福同志为该纵队政委。这时三纵队等于离开了青龙县。

大约在十二月份，赵辅臣等数十人借故回青龙叛乱，杀害我数名县区工作人员。经过我部队围剿，赵即跑掉。一九四六年春，苏锋代表地委、专署率领武装工作队来到青龙县，原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张笠生见到苏锋，表示愿到口里向于明涛专员请罪（当时，地委、专署驻抚宁台营）。苏锋立即派人将其送到专署，并随即发布布告，宣告取消了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建立了青龙县人民政府，何济民同志为中共青龙县委书记，张仲三为县长，王平东为县委民运部长，张凯同志即回地委工作。

第三纵队随即由军分区将其与其它部队合编，张金祥改任为军区参议。

回忆接收青龙县伪军伪组织的方针已及采取的临时过渡办法，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与我们军力情况的灵活措施，顺利地完成了接收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迅速地开展了发动群众工作，收缴武器，组建村政权，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由于赵辅臣等人的本质是坏的，虽有些叛乱的迹象，因为情况

通报不灵，和少数人麻痹、警惕性不高，致使几位同志被赵辅臣等人杀害，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但很快恢复了秩序，从此，青龙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新中国的道路大踏步的前进。

注：

①作者当时为迁卢青联合县委书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经委主任，现离休。

②标题为编者加的。

③经多方查证，实际为两千多人。

关于改编青龙县伪军接收青龙县伪政权的补充回忆

张　凯 ①

我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调到中共冀东区党委十六地委任地委敌工部副部长。约于五月下旬或六月初，地委书记徐志同志交给我一项任务：到迁安县尚武旗村找王晓岚了解关于对伪青龙县讨伐队司令张金祥的联络工作情况，了解进一步开展争取工作的问题。于是我带着徐志同志的介绍信去与王晓岚接头。

据徐志同志介绍，王晓岚是迁安县开明绅士，在抗战中政治上倾向于我。在旧中国时曾办民团（旧中国地方反动武装）。张金祥的胞兄张笠生（字筠轩）是青龙县办民团的绅士，因而两人关系较密切。我们为了争取瓦解敌伪军，物色社会关系，认为王晓岚做争取张氏兄弟的中间人较为理想。因此，确定王晓岚做为争取张氏兄弟的中间人，进行争取工作，并收到一定效果。

我从六月到八月初与王晓岚联系两三次，根据王谈的情况分析，张氏兄弟倾向于我，但确实情况如何有待实际行动的考验。七月中旬，为了粉碎敌伪军向我根据地的进攻，扩大我军影响，并对张氏兄弟进行考验，拟通过张金祥的内应，我派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攻打青龙县城。徐志同志组织地委开会讨论攻打青龙的行动计划，并请求王晓岚征求他的意

见，王同意，并答应即刻与张金祥联系，后经地委反复研究，认为伪满国境线上敌伪军配备较强，我军进攻青龙去时易进，并有把握攻下县城，但不能久占，退出时会遇到敌军的疯狂阻击，恐伤亡较大，因而作罢。

八月初，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攻入伪满、蒙，横扫日寇和伪军，势如破竹，迅即南下，我军亦准备北进。在这有利形势下，地委确定通过张金祥的关系，接收青龙伪军、伪政权。当即抽调张化东（地委关外地区特委书记）负责接收伪军工作，刘云鹤（县长）负责接收伪政权工作，和我一起去找王晓岚与张金祥联系。由于连日阴雨、山洪河水暴发，联络人员不能出口（冷口）只好等待。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张化东、刘云鹤都想进大城市，不愿再到青龙，即回地委。我也回地委汇报情况，在迁安城附近找到徐志同志，他带领部队，正在做驻迁安城内的伪满国军申绍志团的工作，我汇报去青龙的情况后，他决定先做申团工作，青龙问题以后再说，并派我与申绍志接头。我以十六专署秘书的名义，到迁安城北门外一个烧锅（烧酒的）与申绍志接了头，谈判很顺利，申愿与我们继续联系，待进一步做好准备具体谈判后行动。回来汇报后，我侦察人员和参谋等不断进城工作。两三天后，由于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不准敌伪军向我投降，等待中央军受降，申绍志立即与我方断绝关系，迁安的争取工作停止了。

这时张金祥处于苏联红军南下，我军北上的夹击形势中，于八月下旬主动派人找王晓岚与我们联系，并进行了改编和接收的谈判。谈妥后，徐志同志即派陈光和我去接收青龙，接收后陈光同志可留青龙县任县委书记，事后徐志同志

奉命与曾克林同志率两个主力团和部分地方干部出关做接收工作去了。

我和陈光同志立即到建昌营做接收前的准备工作，陈光同志从迁卢青联合县抽调部分县区的干部，等待接收地方工作，经地委、专署、分区请示区党委、军区、行署批准，刻制了"冀热辽军区第三纵队关防"、"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钤记"等图章，并用细布写出了委任令（第三纵队司令员）；委任状（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和干部的具体安排工作。三五天后，张金祥兄弟派两个代表迎接我们赴青龙县（王晓岚带领他们的通讯联络人员五六人和我们一同赴青龙县），在建昌营我们设两桌酒席，晏请了他们。

到达青龙后，由王晓岚互相介绍见面，陈光同志以陈政委名义，我以张部长名义（联络部）做了介绍，将张氏兄弟也介绍给我们，然后谈了部队改编和接收政权等具体问题和措施。

关于部队改编，我记得编了三个团，共四千人左右②，一团长李凤阁，二团长赵辅臣，三团长记不得姓名（比较年轻、不到四十岁），都分别接见过。

地方政权暂设临时行政委员会，下设东西两个办事处。东部办事处张仲三为主任，西部办事处王平东为主任，主要是为了架空张笠生，实权均在两个办事处。

几天后，分别举行了仪式，部队颁发了第三纵队关防和团以上干部的委任令。地方上也召开了有关人员的大会。会上除讲话外，由我将临时行政委员会钤记和主任委任状授与张笠生。改编和接收工作即告结束。

为了扩大我军影响，稳定军心、民心，九月十日左右分

区副司令员李道之同志率部队进青龙搞了一次示威性的游行。为了庆祝军队改编、政权接收的胜利和欢迎我军，青龙县街上搭起了大棚，演了几天地方戏，军民欢天喜地度过了青龙县解放的日子。

为了考验和锻炼改编的部队，于九月中旬将三纵队调进口里，围攻迁安县城（即伪满国军申绍志团），由李道之同志率领全副武装的三纵队（配有轻、重机枪、迫击炮），顺利到达迁安城，围攻了几天未能攻下，又将三纵队调回青龙。我和陈光同志以及王晓岚等随部队一起回到口里，我和陈光同志汇报了接收情况，顺利地结束了接收青龙的工作。

后来经区党委、军区批准，委派我任青龙县委书记、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牧野同志任副司令员，柯济民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兼县支队政委，陈光仍回迁安任县委书记。我于九月下旬到达青龙任职，张金祥兄弟和青龙县一些地方头面人物分别宴请以表欢迎，随后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地方工作。军区派来一个同志（姓名想不起来了）任一团政委，并陆续调来一些政工人员，但为数不多。部队各项工作制度均未来得及建立，于十月中下旬军区来令调三纵队攻打遵化县城，经研究确定张金祥、牧野率队去遵化，我留下管理三纵队几个补充连和后勤机关，我的工作重点放在地方上。

三纵队调走以后，县委开会研究当前工作，根据青龙县是新解放区情况较复杂，三纵队调走后，减少了一部分工作上的阻力（因为该队人员成分复杂，大都是地头蛇，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开展工作。决定各区要

以发动组织群众进行建立政权为主，以便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另外，当时正处在国共重庆谈判结束不久，正在深入学习、宣传谈判纪要精神，宣传我党方针、政策，统战工作也必须抓紧进行。因此，决定召开一次全县仕绅座谈会，使上层人物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及谈判纪要精神，减少这些人对我工作上的阻力。决定于十二月中旬召开，参加会议的仕绅由各区选定报县，由县邀请参加会议。

十一月下旬，接地委通知，区党委决定调我回地委仍做敌工工作。何济民同志提议，让我协助把仕绅座谈会开完再回地委，经地委同意协助把会开完再回地委。

十二月初，正当为开好仕绅座谈会做准备工作时，二团团长赵辅臣突然带部分部队（都是我军）回到青龙，声言军区派他到建平争取一部分土匪，并且派来一个加强排，由指导员、参谋带领，另有侦察人员一起同赵辅臣前往建平。他走后我立即给分区李道之同志写信，一方面问问情况，另方面我提出派这个人去争取土匪靠不住，请速报军区妥善处理。

几天以后，跟随赵辅臣去的一个侦察员逃了回来，他说跟随赵辅臣到建平后，很快就与土匪联络上了，并说土匪愿意投城。在一个晚上，土匪大摆宴席，以示联欢庆贺，在饮酒联欢过程中，土匪突然动手袭击我指战员，在我方人员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全部被土匪杀害。他是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待土匪撤走后逃了回来特来报告的。这完全说明赵辅臣事前已和土匪勾结，设下阴谋诡计，枪杀我指战员，投敌叛变。我马上给李道之同志写信，立即派侦察员送往分区，请速派部队进剿匪徒。第二天即谣传赵辅臣等带土匪袭击青

龙，我与何济民同志和县支队长周子丰同志一起研究，并一起查看了地形，做了具体布署。在这种情况下，士绅座谈会已不能召开，我也没有必要留在青龙，即同何济民等同志商量，我马上回地委汇报情况，地委同意即派部队进剿。这时青龙已来报告，说当我离开青龙后的第三天晚上，赵辅臣带领土匪进犯青龙，在战斗中我牺牲干部战士数人（数目记不清了）。地委马上研究决定，由李道之同志带领部队，派保卫部长（专署公安科长）苏峰同志协同赴青龙处理善后工作。他们到达青龙时，土匪早已逃跑了。经过调查，处决了赵进青龙后投向并协助赵进行反革命罪行的青龙商会会长张振羽等罪犯。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张笠生在赵辅臣进青龙后有犯罪行为，因而把他带回专署另行安排，并趁机恢复了青龙县的建制，何济民同志任县委书记，张仲三同志任县长，从此青龙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三纵队，从调军区攻打遵化县城以后，再没有回青龙。

总之，在党的政策指导下，在苏联红军南下和我军北上的强大攻势下，利用抗战期间建立的伪军内线关系，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接收了伪政权，建立了新政权，改编了伪军，充实了我军力量。由于赵辅臣的叛变，我们受到一定损失，但趁机彻底改变了不伦不类的青龙临时行政委员会，使青龙县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坏事也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取得了最后胜利，是我党对敌伪军政策的一个重要胜利。

注：

①作者当时为中共冀东区党委十六地委敌工部付部长，

曾在辽宁省沈阳市总工会工作，现已离休。

②经多方查证，改编为两个团，共两千多人。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青龙县，设立青龙满族自治县，这是党和国家对青龙各族人民的最大关怀。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０日，全县各族人民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任中共县委书记刘向东，第一任县长董先。

往事的回忆

阎春正

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我在青龙宪兵治安队张金祥手下当司号员，三年多的相处，张金祥对我的正直品质深为赞赏，彼此之间成了莫逆之交。当时国难当头，自已觉得前途渺茫，无所作为。到一九三八年，我辞职回家务农。

一九四〇年，张金祥被日本鬼子提升为"满洲国"东南边防司令。此时，我在家务农，有时也做些小生意。家乡一带的人民经常遭到讨伐队的骚扰和掠夺，有的被绑架或杀害，有的牲口、物品被抢走。对他们的残暴行径，我十分气愤。乡亲们知道我和张金祥的关系，便纷纷托我帮忙，很多次我冒着生命危险出冷口，把被抓去的人要回来，把被抢去的东西找回来。

一九四二年农历五月初三，迁安县的朋友王晓岚身着道服来到我家，见其如此打扮我很感意外，但老朋友见面又知心又知已，无话不说，我们便谈到了国家的存亡，谈到个人的心情，更觉彼此情投意合，对王晓岚深感敬佩。我问他："什么时候出家当了道人，为什么？舍得你富豪的家产和老小吗？"他感慨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出家是有原因的"。他滔滔不绝向我讲述了出家的原因，他说："我在东乡团带领团兵，不能为国报效，深感苦恼，正在这时李运昌来了"。我打断他的话，问："李运昌是谁？""就是李大钊的侄

子。"我恍然大悟。这时，晓岚告诉我："李运昌来到冀东也是手无寸铁，我敬重这位爱国人士，所以我把东乡团的枪支都送给了他，以求报国。可是社会的黑暗是不允许我活下去的，由此我选定了出家的道路。"听了晓岚的一番话，我深受感动。晓岚知道我与张金祥的关系，告诉我：李运昌任冀东军区司令员，现在共产党的政策是爱国不分前后，欢迎爱国投诚，并给我讲解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使我深受教育。国难当头的时候，我选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光明道路。随后，晓岚诚恳地对我说："我冀东要争取张金祥的投诚，你是否能深入虎穴，亲自说服他投归祖国，一致对外呢！"我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又危险的任务，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想到受苦受难的人民，我的心情不能平静，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不久，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迁安、青龙、卢龙三县组成的情报站，由王晓岚、张青波、阎春正、雷雨田、阎友均、王青松等在长城一带搞情报工作，我当时的任务是去青龙争取张金祥。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我带着李运昌同志的信出冷口。把信藏在烟袋杆里，我化装成放羊的。第二天清晨，就遇到了日本鬼子和讨伐队，一个鬼子打量着我，说我不象放羊的是八路的密探，顿时，几个鬼子上来举起枪把向我狠狠地打来，打得我遍体磷伤，幸亏大队长余友增（讨伐队一队长）赶到，对鬼子说："这是司令羊群的总管。"鬼子才住了手慢慢地走了。看到鬼子远去，我洗去身上的血迹，摸了摸烟袋还在。到了张金祥的公馆和他见了面。张金祥见我鼻青脸肿，问我怎么搞的？我说："鬼子打的。"听后他十分生

气，很同情我。晚上，我和他同住一处，闲谈间谈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说："你们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接着又谈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见他不动声色，我又对他说："瑞争，（张金祥的号）你就这样走下去。是走不通的。"他点点头说："日本人看得很紧，大哥你看走哪条路呢？"我回答说："只有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时他问："你能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吗？"我大着胆子把李运昌同志的信给了他，看了信他一夜未合眼。黎明时，他写了回信，交给我带到情报站转交给王晓岚。

一九四三年二月上级决定派我从张金祥手中搞到一张军用地图。我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做生意为名，到了张公馆。晚上与张见了面，我把来意向他说明，他说："地图只有两张，日本人一张，我一张，日本人把守得很紧，实在不好办"。我说："你口口声声没忘祖国二字，当需要你的时候，你又说不好办"。见他没有吭声，我又说："把地图交给我，我们复制一张，即可给你送回。"他想了许久说："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最后，还是把地图交给了我，又再三叮嘱。随后，我把图放在骡子的马鞍里。第二天下午，我与王和正走在青龙大街上，刚到特高队门口，就遇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大队长高行舟。他把我喊住，带到他的队部，明亮的刺刀对准我的胸膛。他高声喝道："你经常在青龙出出进进是干什么的，我看你是八路的探子！你不说实话，用刺刀挑了你！"这时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因此毫无惧色的说："行舟，你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反正我没有做过坏了良心的事，如果你有一天有用着老兄之时，兄弟会万死不辞，你挑吧！"我高高地挺起了胸膛。听了我的话，他慢慢的放下了

洋刀，笑着对我说："阎春正够朋友，今日相见，深知胆大多谋，好吧！后会有期。"把我放走了。

一九四三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十二军分区司令员李道志来到潘庄。开饭时，道志同志与我同桌共餐，详细询问了我几次出口的经过。听后，他激动万分，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阎春正同志，此刻出口有什么感想？"我高兴地回答："今天见到首长十分感动，为了冀东人民的解放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司令员又一次握住了我的手，兴奋的说："好！此去任务重大，千万小心谨慎。"他把要求张金祥投诚的具体日期和计划的信交给了我，并送我很长一段路程。

我带着李道志的信，到张公馆，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把信交给张金祥。看他看完信变了脸色，瞪起双眼，对我说："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小心你的脑袋！"他刷地举起了手枪对准我的脑壳。当时我想，人吗，这样也死得其所，死得值得！于是，我坚定地回答："要脑袋，这有一个，我干啥你知道！开枪吧！"。听了我的一番话，他的枪叭地一声掉在地上，对我说："大哥，你别激动，我是怕走漏了风声，万一让日本人知道，你我全家性命难保。"我点头表示明白。第二天，我带着张金祥的回信返回情报站。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接到上级指示，要我设法搞到一些军火。这可难住了我，这比不了传递信件，军火怎么过封锁线？我一夜没合眼，最后决定闯一闯。

第二天我随着羊群，来到大队长佘友增家，他是我的好朋友。晚上闲谈，从他的口气中我察觉到他有悔过自新的愿望，就对他说："你打算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呢？"他说：

“身在曹营，有什么贡献可谈？”我接着说：“眼下共产党。急需军火，你就支援一下吧！”他沉思了好一阵才答应下来。他弄了两箱子弹，并派了亲兵送我与王和出口。走到西双山时被哨兵发现，打起枪来。突然，一棵子弹穿过了我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这时两卫兵打了暗枪，岗哨才停止射击。随后，把我转移到羊群，由王和率两名卫兵把子弹送到刘家口，由阎友均等人将子弹转交给部队。

接 收 青 龙

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终于说服张金祥起义投诚。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天，我带领我方军事人员，从建昌营出发奔向冷口，张金祥率骑兵迎接我方接收人员。当时参加接收青龙的有十二军分区政委张凯、陈光等三十余人。我军接管了张部的所有人马及枪枝弹药，将其部编为第三纵队。之后，我方致电延安，并批准了我与王晓岚、王青松等同志为中共党员。这段历史直至现在仍记忆犹新。

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

青龙荣获国家最高奖励是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获国务院锦旗一面：上面书写着“绿化第一县”五个金字。同时，被林业部命名为“林业元帅县”。表彰了我县林业建设的伟大成就。

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ꕥ

对一支反人民军队的政治争取

皋　峰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我在八路军冀东第三纵队（暂编）担任党代表。这支队伍原是伪满"讨伐队"张金祥部，司令部驻青龙县，约四、五千人，长期被日寇部署在长城一带，与我八路军作对。日寇宣布投降，"讨伐队"六神无主。为防止这股力量投蒋，我冀东军区党委和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进行争取工作，使张金祥向人民政府投诚，同意将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当时，我奉命带领二十二个指导员进去做政治工作。把一支反人民的旧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任务复杂而又艰巨。为此，军区首长一再指示，要积极深入地做好政治争取工作。

这支队伍成分复杂，人称三支枪（长枪、短枪、大烟枪）部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有人甚至偷偷把妓女带到军营。其内部宗亲嫡派盘根错节，控制较严密。在军事上训练较正规，官兵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装备也好，有较强的战斗力。

刚进入该部时，我们受到礼节性的欢迎。对方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大有改邪归正之意。指导员们随即分散到各个中队，我则负责做上层工作。我们工作主要是宣传我军的革命性质和宗旨，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包括讲解我军对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同时要求去做工作的同志必须以身作则，事事处处做模

范，保持八路军艰苦奋斗的光荣本色。不收礼、不徇私，进去时带多少东西，出来时还是多少东西（那时每人只有一个简单的背包和一个挎包）。工作重点放在下层基本士兵群众，同时不放松上层的工作。

不料，工作开展月余，风云骤变，形势急转。

由于美帝国主义大力为蒋介石提供运输力量，蒋已陆续在葫芦岛、秦皇岛、塘沽一带登陆，并布置在铁路沿线和我解放区周围。张部军心浮动，邪气上升，特别是上层中的一些反动分子密谋策划，活动频繁。我们还了解到：蒋介石以"中正弟"的落款亲自给张金祥发来电报，委任他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司令。为防止哗变，除积极工作外，我立即派人赶回军区送信，建议速将张部调到老根据地进行整顿。军区闻讯后，即令张金祥率部参加围攻遵化的战斗（当时遵化讨伐队司令张天熙拒降），命令措词极为恳切。谁知张金祥接此命令后，内部动荡加剧，个别上层反动军官放出风来，说什么"调去打遵化是个阴谋"、"是共产党的调虎离山计"，"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要吃掉我们"等等，张金祥本来也想座镇青龙，就地为王，但迫于我们的压力，还是宣布了第二天出发打遵化的命令。命令虽已宣布，但指导员们和进步分子向我反映，张部仍然不断出现一些异常迹象，张的亲信及部分上层军官都在秘室开会。

到了晚上，我方才得知他们秘室策划投蒋上山。正集思对策，中队长林成山带着一个名叫刘和的小队长急急忙忙来到我的住处。林神色紧张，言语急迫地对我说："不好了！他们已经策划好，今晚要不声不响地活埋你们，然后拉队投降蒋介石。"还说，有的大队策划拉队上山为匪，有的

合伙把枪密封后投入井中，有的已携枪开了小差。天黑后，队伍更趋混乱。

情况紧急，千钧一发。我只带来二十二个指导员都分散在下面，显然很难控制事态的发展。

林成山在一边督促我："事不宜迟，快走吧，再晚恐怕就没命啦。"说着，他同刘和各掏出一支驳壳枪、一支橹子，还有二百发子弹。年轻的刘和拍拍胸脯对我说："我愿用这条命送你安全出去。"他脸色开朗，毫无惧色。

门外为我站岗的哨兵已由平时的二人增到四人，都是张金祥的卫队。哨兵们说："这是张司令的命令，外边有点乱，为了保证梟代表的安全才加了岗哨。"张金祥派给我的随从付官（张的本家兄弟）今天也比往日殷勤，隔不多长时间便来一次，问问有"事"没有。显然，我已被监视起来。

军区首长赋予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把这只队伍争取过来，作为党的干部，在关键时刻决不能临阵脱逃。我断然向林成山说："走，只逃得一命，就这样眼看着让坏人把队伍拉走投蒋吗？不行，不能叫他们这么把队伍拉走！"

"可是眼前你………"林成山十分焦急。

我镇静地说："你们不用担心，咱八路军不能被他们吓住！"我叫他俩回去再摸摸部队情况。

从他俩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一个多月以来的工作成绩。林成山，这个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魁伟健壮，带几分江湖侠气，讲意气、重感情，他是东北人，学生出身，较少沾染社会恶习。听了我党救国救民的主张，他的思想进步很快，跟共产党、八路军干革命的热情很高。在我们的教育影响下，伪军官兵中象林成山、刘和这样觉悟迅速提高的人还有

一些，他们不断向我们提供情况，在混乱中和对立派争辨，有的直接找张金祥陈述应当跟共产党走的道理，这些不都是有利因素吗？况且下层士兵中尽管流氓兵痞不少，但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是我们争取的基本群众。初来时指导员们宣传、演讲，士兵们很冷淡，后来不仅都愿意听，还纷纷找指导员签名留念。每个指导员都交了一些朋友，关系很融洽。由于我们以身作则，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当中已建立起相当的威信。这无疑是我们的有利条件。

对上层军官我们也尽可能地做工作，中队长以上的军官，过去为虎作伥，常年为日寇“讨伐”八路军，对把他们编到八路军来，普遍存有戒心，怕将来整他们。我们初来时，他们争先宴请、送礼、拉关系，便是此种心理的反映。为此，我们反复申明我党对投诚人员的政策：只要站到人民一边，过去的罪过一概既往不咎，共产党言而有信，决不会出尔反尔。从接触中看，上层军官中现在仍然坚持与我们为敌的，已是极少数。

虽然如此，但能否对张金祥构成足够的压力，尚无把握，但是我知道：尽管我们人很少，但是我们有强大的后盾。我党在政治上为群众所拥戴，我军在军事上越战越强，这些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威力，既作用于张部，又鼓舞我们自已。

我正要去找张金祥，争取他坚决把部队带去打遵化的时候，林成山又来了，告诉我他们如何策应我出去的安排，我问他：“部队的情况如何？战士们是否愿意跟随投蒋？”他说：“弟兄们当然愿意跟共产党、八路军干革命啦！”

“为什么”！

“这一个多月，弟兄们有眼看得见，有耳听得到。你们当官的不收礼，我们当官的做不到；你们当官的领头干活，我们当官的用勤务兵侍候；你们当官的给弟兄们端洗脸水，给有病的弟兄端饭，别人把女人领上门，你们当官的给推出去，我们当官的出去逛窑子还不是常见吗？连我们中队的“老顽固”都叫我打赌给赢过来了。”说到此处他笑了。

“打赌？打什么赌？”我迷惑不解。

原来被他称作“老顽固”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士兵，在社会上混的时间长了，颇有些固执已见，经常咬住死理，谁也说不服。林成山夸我们的干部好，劝他跟八路军，他硬是不相信，还提出打赌。于是林介绍他找指导员个别谈心。他以指导员家中贫苦为由，提出要送两个金镏子“表表心意”，并声明这是合伙从当官手里赢来的，决非不义之财，他还“保证”说：绝不会叫任何人知道。”我们的指导员认真地告诉他：“共产党员遵守纪律是自觉的，别人不知道，难道自已还不知道吗？”至此，老顽固表示彻底折服。

林成山又说：“这都是实情，我们大队长听说要拉出去，慑于兄弟们心向共产党，没敢轻举妄动！”

听了他说的这些，我对张部争取工作的决心更大了，腰杆更硬。我对林成山表示，我决不出走，要深入虎口，力阻张金祥。林成山当时显得很激动，表示更佩服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走，坚决跟到底。我叫他回去注意事态的发展，伺机组织本中队行动，林成山刚走，我便直闯张金祥的住室，此时已是深夜十一点。

张金祥出身大地主，四十余岁。他看过不少古书，说话文诌诌的，办事颇为圆滑，内心却很阴险。我同他打了一个

多月的交道，也算有了些“交情”。我进到张金祥的屋里，一见面就直言不讳地问他：“张司令，部队明天能不能出发？今天可是出事不少呢！”

“什么事？”他佯装不知道，我便把逃跑、藏枪、哗变的迹象说了一遍。

“不会不会”，他仍假装不大在意的样子，“兄弟自带兵以来，令行禁止，本部决非乌合之众。”

说罢，他叫道：“副官！去查一查，部队明天出发，看有啥事吗？”我知道这又是他的遮人耳目之术，便直率地对他说：“张司令，你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应当坚持到底，为人民立功，决不能听信坏人的挑拨，决不能被谣言迷惑，现在可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请张司令好好考虑。”

“你放心，兄弟自带兵以来，也想兴仁义之师，为民除害，虽说兄弟不才，过去对共产党的主张所知甚少。但今日有幸得知，岂有再生他心之理？”

“我相信张司令，可是希望不要让蒋介石的电报扰乱了我们的军心。”

张金祥连忙摆手：“我现在身为八路军纵队司令嘛，前几天蒋介石是有一封电报，此举分明乃离间之计，且是明码电报，岂不是想借共产党之手杀我张金祥嘛！”

“究竟是谁想杀谁，听说有人策划今晚活埋我们，张司令大概也有耳闻吧？！”

“这，这从何说起？”张金祥故作惊奇，但内心显然很恐慌，忙说：“不会、不会，这是流言蜚语、别有用心！”

我看到他这种神色，心中有了点底，又紧接着对他说：

"重新走上反人民的道路，那是危险的！不瞒你说，你部下的士兵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广大人民群众也决不会答应的。再说，八路军从无到有，有小到大，越战越强，共产党是彻底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是最有前途的。这些你都应当明白，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舌战了近三个小时。从张的佯装不知到否认，抵触，我断定他是自已不出面，怂恿部下对我们下手。这说明他对哗变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给自已留着后路。针对他这种犹豫不决的心理，我既表现出已经洞察事态，又适当地施加压力，叫他感到我已有对策，成竹在胸，并不断地申明大义，以打掉他反共投蒋的邪念。

最后，张表示道："我的部下不敢干这种蠢事，如查明有萌叛逆之心者，兄弟一定严加训斥。我立即召开军官会议，请臬代表训话如何？"我说："还是张司令讲。"

下半夜两点，中队长以上的军官都集合起来了，张金祥开始训话。大意为：有的人乱造谣言，动摇军心，妄想把部队拉走投到蒋介石那里去，简直大逆不道，我张金祥跟共产党、八路军走定了。有敢率部队乱动者，严加惩处，要坚决听从军区的指示，带部队去打遵化，为人民立新功。我也表示：坚决按张司令的话办，把部队开到遵化去，为人民立新功。会场上的气纷非常紧张严肃，事态这样发展，大概也出乎那些叛乱者的意料。

早晨六点，全队按时出发了。虽然有些人还是开了小差，但是没出现大的动乱。一次哗变谋叛就这样平息了下去。

部队去了遵化，担任攻击城东南角的任务。由于张部有

一定的战斗力，加上我们政治工作的威力，士兵们在战斗中还表现不错。后来，由于情况变化，部队拉到丰润一带打唐山出来的援兵，随后就地进行改编，张部改编为我军两个团，张金祥仍担任纵队司令（后来调到军区当高级参议），我到一个团担任政委，林成山就在我那个团当连长，刘和后来也当了连长，两人先后为革命捐躯。改编过来的干部战士中有不少人为人民立了战功，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建国后仍是部队骨干。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我常常想起这段往事：敌人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部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进去仅一个多月，就争取过来了。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共产党员的坚定沉着和艰苦奋斗本色所产生的远大影响，我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记取的。

注：

此文原载1982年8月23日《解放军报》第四版。

塞外匪患

韩文儒　邱立文

青龙建县前属临（榆）、抚（宁）、迁（安）分属理，由于长城一带及都山、老岭山势纵横，谷幽林深，加之直奉二次交战，直军败退南撤时丢弃很多武器弹药，助成匪患迭起，使青龙人民受到近五十年的兵灾匪患之苦。

一、青龙解放前的匪患

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２年）《临榆县志》载：长城以北地区，有匪众千余人，横行乡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牛心山乡花场峪村五道岭附近村民组织抗匪“联庄会”，然而土匪凶残暴虐且人多势众，联庄会不敌，被击溃。时村民吴弼德为避匪患，率其家人躲于村外山中，唯其母不肯随行，吴母不幸被土匪抓去，将其家中财物抢掠一空，房屋被焚，吴母愤而大骂，抵死相抗，匪怒，欲将吴母投入火中烧死，弼德闻之，挺身而出，愿以己身代母死，于是土匪将弼德枪杀。弼德以身代母死，精神闻名乡里。

１９２４年随直军败退流窜过来“老耗子”（该匪队系辽宁省凌源县匪队，有匪众千余人）匪队属下夏五虎、肖三品率匪众百余人，活动在青龙东部的干沟、邱杖子、木头橙的老大杖子、山东乡的寿桃山一带，为害乡里，扰乱民生。是年冬该部土匪返回岭上，与老耗子匪队汇合，年底该匪队被奉军十九旅消灭在辽宁省建昌县老大杖子猫耳岭上。匪队来

青龙期间，曾把１００支步骑枪散失在邱杖子、烧锅杖子一带的农民手中，１９４３年冀东军分区马骥营长来青龙开辟地区时，将枪支起出，组织成立了周子丰游击队。

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８月，匪首朱玉璞（原名朱宝）、金海龙（原名朱奎元）、大青山（原名王青）拉起一股绺子，有匪众１５０人，活动在牛心山、老岭地区。同年该股匪从梧桐峪入关到沿河营，火烧西吴庄，又在榆林甸绑秧子多人，官兵剿匪司令何柱国率四十六团、六十四团会同抚宁、卢龙地方民团二千余人追剿，匪众不敌，向西留守营逃窜。

是年九月，该匪流窜到了娄杖子乡后牛山大洞北沟，将该地贾家大户财产抢劫一空，并处死贾家两个人。该匪队被何柱国部队及抚宁张任侃民团、卢龙刘鹤汀民团、热河派来的八十三团合围在大洞北沟岭下，经半天的激战，打死匪徒百余人，俘虏匪众五十多，匪首大青山、滚地雷、忠正、于址元被击毙，该匪队被平息。

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正月，青龙西部地区又兴起多股土匪。匪首有任福庆（绰号小白龙）、单田（绰号穿山虎）赵匡印（绰号大灯楼子）、小股土匪头目有：神枪张柱、李润田、梁山、梁海、徐树、张百、马瑞、邵老奉等，啸聚匪众两千多人。他们以都山为基地，活动在青龙的大杖子、八道河、肖营子、马圈子一带。当时匪众声势浩大，百姓闻之丧胆，官府和地主豪绅也十分恐惧。官府和士绅们为维持自已的统治地位和切身利益，为安定民生，多次请求省府派兵清剿，河北省府责令地方就地组织民团剿匪，大杖子一带推举张振羽为民团团长，马圈子推举二道杖子王士昌（举人）张兴舟为民团团长，两地共组织民团

1200多人，枪支弹药及民团给养由当地的地主士绅富户中筹措。河北省府为协助地方民团剿匪，由卢台府调兵两千，责韩、段两位武官带兵出桃林口、冷口到青龙山区剿匪，官兵汇同地方民团3000余人兵分两路将土匪围在都山脚下大营子、老爷庙及黄土坡庄内，匪首赵匡印、张柱等得知官兵进山剿匪的信息后，当即带匪众奔向老爷庙南山，张柱带匪走到影壁山下时，被官兵发现，因当时张柱乘坐一匹大白马，目标明显，官兵齐向白马方向射击，当时匪首张柱左臂中弹受伤，从马上滚下，迅速隐避到一堤墙下，用右手持枪向官兵还击，当即打死官兵8人，官兵不知虚实，后退里许，官兵一官员说："谁抓住匪首有重奖，其财产归谁"。官兵为了奖励和钱财，一齐向匪首冲击，张柱随以有利地形进行顽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抓获。官兵们为泄愤将其人头割下送往县城大杖子，挂于竿上示众。官兵围剿张柱期间，大掌柜（匪队一把手）赵匡印见势不妙，带领部分匪徒撤向都山娘娘顶，官兵回县城后，赵匪才下山经八道河、塔沟奔向西双山龙潭沟、官场乡黄木场等深山中隐藏起来。

是年秋，官兵和民团再次研究进山剿匪，拟定分两路进山剿匪，一路由段××带领官兵1000人和地方民团400人，从县城出发，经马丈子越南大山直抵龙潭沟，一路由韩××带官兵800人，地方民团200人，经肖营子绕道七道河乡石板沟进山直取当丈子黄木场，采取两下夹击，一举歼灭这股土匪。官兵的剿匪行动被匪首知悉后，研究了相应的对策，他们认为匪队人员虽少，但都是本乡本土之人，对山区地理条件了如指掌，可分兵把口与官兵民团抗衡。官兵虽多，但都是外地人，不但地理情况不明，更缺乏

山区作战经验。官兵和民团进山后，不时遭到小股匪队袭击，官兵进山不到一个月，不但没有找到土匪大部队，还损兵折将近千人。统兵剿匪的韩大人被匪头目徐树打死在七道河石板沟里。后来官兵无耐停止了此次剿匪，撤回县城。

是年秋末，当地民团队长刘文轩（北马圈子头道河子人）向剿匪统领建议，派一能言善辨之人去匪窟劝降，胜如以武力戒斗，官兵统领采纳了刘的建议，经研究就派刘文轩为说客，深入匪窟晓以利害，经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匪队提出的条件是：一不要追究过去的坏事；二是匪头目愿降者封予官职，并在军队供职；三是匪徒一律接受改编，不愿从军的准其回家为民不得伤害。双方达成协议后不久，就对该匪队进行了改编，当时愿降的匪首有赵匡印、大林字、马瑞等，不久把他们带到芦台府封为营长、连长等职，从此，民国结束了山里匪患。

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在青龙盘踞期间，没有发生较大匪情，仅有一些散匪在远离我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地方干些坏事。

二、青龙解放初期的匪患

（一）赵辅臣叛变为匪。

１９４５年８·１５日军投降后撤出青龙，张金祥的８个讨伐队和骑兵队、特务队共２０（０人被收编，冀热辽十六地委、十六军分区将其改编为八路军冀东第三纵队（旅级），张金祥任司令员，赵辅臣任二团团长。

改编后，赵辅臣继续敌视我党和人民，不久，乘军分区扩军之机，暗中网罗伪、警、宪、特及反动地主等人员，编成第二补充连，准备待机叛乱。是年１０月赵的二团再次被改

编，赵被调任十三旅参谋长，他的叛乱阴谋被粉碎，更加对我党我军不满。11月赵假借回青龙收降姜克芝、于庆瑞（辽宁省凌源县匪团队），向旅部请求回青龙，旅部批准他回去，并派旅部彭参谋、庞指导员带一个排护行。赵辅臣回青龙后，马上与原特务队长高占海、伪政府旧官吏张其昌、匡占儒、张敏、马宗仁等密谋，一面派人去秦皇岛与国民党都山县党部书记王嘉林联系，以取其帮助；一面秘派人与五区、八区伪满时的旧部下王印轩、冯新斋等人联系，要其抓紧网罗当地反动地主、伪警察及土匪等成立补充连；又派人到凌源通知姜克芝匪团来青龙策应，经多方串连谋划，待机叛乱。

12月7日，赵辅臣叛变为匪的阴谋终于大亮相。赵密令五区王印轩补充连悄悄包围了杨树窝铺庄，以设宴请客为计，把彭参谋以及排长、班长等10名同志请到自己家里作客，宴席间，匪徒们突然发难，彭参谋等猝不及防，当场遇害。在别处的八路军战士也同时被杀害，当晚又在距杨树窝铺的不远的道上，截杀了从县城领给养的庞指导员等三位同志，一手制造了震惊冀东的"杨树窝铺惨案"，此惨案有18名八路军干部战士惨遭杀害。同日，赵辅臣串连姜克芝匪团，攻占了木头橙区委，李复新区长等三位同志被杀害。

12月10日，赵辅臣带叛匪300余人攻占了青龙县城——大杖子，杀害财政科长马良村，九区区长孔恕等8名干部和无辜群众，抢走一部物资和枪支弹药。

12月中旬，在冀东部队和青龙县周子丰支队的围剿下，赵辅臣撤出县城，带残匪800多人出义院口经抚宁逃往秦皇岛投奔国民党，活动于临榆、昌黎、抚宁、迁安、乐

亭、滦县等地，与人民解放军顽抗，杀害我地方干部群众，破坏解放区生产建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赵辅臣预感末日来临，携带财物和枪支，离开匪队，改名彭中兴隐藏于北京市东城区贡院东大院东大街5号，妄想苟延残喘，逃脱法网。4月8日，赵辅臣行迹败露，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解回青龙。

1949年12月1日，根据青龙广大人民的意愿，青龙县政府执法机关判处赵辅臣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作恶多端的赵辅臣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

（二）韩殿臣政攻队（土匪队）。

1947年夏季，逃亡到秦皇岛都山县国民党部的反动地主、伪警察、宪兵、特务等110多人，在秦皇岛组成都山县政攻队，后改为民众自卫队。他们以发展国民党党员，鼓动群众，伺机复辟。政攻队长韩殿臣、指导员曹清，副队长冯悌轩。下设六个组四个中队。总务组长张起，事务组长袁少义，新闻组长谢子恒，谋报组长李香圃，宣传组长黄明远，突击组长谢文英。第一中队长王喜庭，队副李殿存，有匪众30余人；第二中队长张万彬，队副张起，有匪徒40人；第三中队张印，有匪徒20人；第四中队长王永，有匪徒20余人。1947年农历11月17日，四中队王永带匪20人出义院口，18日抵达龙王庙、木头橙、干沟等地，在五区龙头村将农会东西抢光，把农会干部李宝增打死，把出头石农会主任李会杀害。19日到一区起河与我军相遇，打死我八路军干部一名，当晚逃回口里。1948年农历正月初八，王喜庭带一中队出口，窜到五区干沟街，抢

劫商店物资无数，又将农会的胜利果实抢去。杀死干沟街妇女主任田××，在干沟东刘丈子村打死无辜群众孙宝，在黄石磖杀死一名要饭的，还将农会干部王国珍、唐自武杀害，又到出头石把农会干部李长贵杀死，到牛角沟杀害一群众，正月十二日返回口里。政攻队于１９４８年农历８月，被我剿匪一团大部歼灭，一中队长王喜庭，二中队长张万彬、张起，三中队张印被活捉；一中队副李殿存、四中队长王永向我剿匪部队投诚。

（三）张寿芝民众自卫队（土匪队）。

１９４８年夏，张寿芝网罗地主、伪、警、宪、特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成立民众自卫队第五大队，张寿芝任队长，队副贾太增，有匪众近５００人，抽其精干４００人在龙王庙、木头橙、双山子、隔河头等地抢劫财物，杀害干部和群众，骚扰民生。仅据１９４８年底统计，该股土匪杀害的干部和积极分子６５名；一区被抢去公粮７万余斤；抢劫群众骡、马、牛、羊等牲畜８００多头；还有金银、布匹、黄丝、烟土等物资无数。１９４８年秋，一区两名公务人员去双山子县政府开会返回途中，在安子岭被他们杀害；三区桦树岭区小队被他们包围，当场９名队员牺牲；二区区小队９名同志在隔河头被抓去；五区区小队３２名干部队员在木头橙北台子被包围抓去；他们策反五区区小队长朱稳相叛变为匪，损失大枪３０余支。这支民众自卫队第五大队于１９４８年上庄坨解放时，被我剿匪部队全部歼灭，匪首贾太增被活捉。

（四）王庆会匪队

１９４７年冬，王庆会、柳占宽、曹玉丰组织了有３５

人的匪队，武器配有机枪一挺，长短枪３０多支，他们经常活动在三岔口、隔河头、双山子一带。１９４８年农历２月，在三区沙金哨村将农会主任方自武杀害；２月５日，匪队窜到三区周丈子村于丈子庄，抢去农会斗地主所有财物。最后将村支部书记牛得林、副村长徐连、贫农方自顺，区小队长方自富、队员方自国、王庆满、方自民七人挟迫当土匪。他们又抢走农会骡子三头，方自顺衣服２０多件。２月下旬，匪队到刘丈子骚扰，土匪樊得林把该村副村长杨发打死。他们经常到口里抚宁、卢龙的邻村抢粮多次，在郭家坳抓去我地方工作的两名妇女，一名张××，一名阎淑琳，匪徒们把她们带到牛心山乡花果山，当晚，张××被匪徒强奸。１９４８年６月，该匪队窜到三区二道河杨丈子，将我一区组织委员朱玉贵、民政助理王祥抓去，抢去橹子（短枪）一支，又将他二人带到田丈子沟口金掌洞子，匪首王庆会亲自开枪，打死我们的两名地方干部。是年夏，该匪队在三区刘丈子抓住该村妇女主任靳桂兰和在其家养病的八路军战士朱权，匪徒王庆满将靳奸后杀害，朱权也被杀害。１９４８年秋，匪队在三区安子岭二道河子村与三区区小队和民兵相遇，战斗中区干部李海凤和９名队员被打死。不久他们又窜到袁丈子，匪首王庆会、队副王庆义、匪班长樊德林把村干部朱金生非刑拷打后杀死；干树沟村农会主任马余，贫农吕有被匪徒王庆义杀害；匪队又到隔河头把村干部鲍万巨、鲍振明杀害后，劫走黄金５块，银元３００块、烟土１０两，镯子１００付，衣服８０件。９月中旬，该匪队夜袭杨丈子，打死三区区小队队员８名。不久，他们又包围隔河头，抓去二区区长和区小队长等８人。

王庆会匪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骚扰民生，抢劫农会，杀害区、村干部和群众，袭击区小队，罪恶多端，于1948年10月，终被我剿匪三团和县支队消灭在安子岭南沟。

（五）宋绍久匪队。

宋绍久原系地痞出身，伪满时当过警察，1945年随伪讨伐队，伪政权被接收后，被任为七区区小队长，1946年8月末，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三军一百六十师、一百六十一师因战争需要从东北调往华北途经青龙，宋绍久以为有中央军作靠山，秘密与伪警察佟坤、伪自卫团长宋进珠等人搞反革命叛乱，拉出70多名民兵组成匪队，叛乱当天，把王营子农会主任沈永发夫妇活埋在西河边。把农会副主任宋宽用木棍活活打死，匪徒们又连夜到高丽铺、七道河、山神庙等村，将区农会主任孙西海、区组织委员杨春丰、区妇联主任李木清、区武委会委员李印喜四人绑架到王营子匪部，进行报复性的非刑拷打后，将李印喜上交中央军外，其余3人惨遭杀害。抢劫区小队和民兵枪支69条。同年8月底，冀东军区独立四团，将宋绍久匪队包围在王营子，俘虏匪众50人，缴获各种枪支70条，其余匪徒随宋绍久逃往八区狮子坪与李强匪队汇合，在农历八月十五的早晨，该匪队又被县支队包围在朴丈子庄，将其大部击溃，除宋绍久、李强、佟凤楼等少数匪首向平泉逃跑外，其余匪首何连布、佟振峰、宋进林等6人被人民政府就地镇压。

（六）张金忠匪队。

1948年5月，驻守在承德国民党十三军被我华北八路军击溃，以张金忠、高占祥、张其昌为首，组织了五个县

的武装土匪和十三军溃散的散兵共1200多人，高占海（原赵辅臣匪队一队长）亦从平泉带匪徒80人，组成了还乡团匪队。5月28日，该还乡团窜回青龙，占领了县城（大丈子），杀害我土改干部7人，烧毁县街完小校舍12间，放火把县政府粮库焚烧，烧掉公粮和豆油12万斤。29日，又流窜到大巫岚，把村干部王学俊、区长佟文、区农会主任李珠及兵站3名同志一并杀害。6月中旬，该匪队在大巫岚、红旗杆、广茶山等地被冀东八路军警备团和县支队包围全歼，俘虏匪众1080人。

（七）零星股匪和散匪

除上述较大的六股匪队外，在青龙县境内先后曾有张金增匪队、金巨川匪队、郭春喜、李运长匪队、孙格顶、黄大炮匪队，肖成发、刘振彪匪队、宋山、候永来匪队、张振起、张春利匪队、周振国匪队、孙广明匪队、杨明春、杨恒春匪队、李仲甲匪队、张怀志匪队、宋福基匪队、田兴泉匪队、武云中匪队、鲁瑞峰、李梦楼匪队、李文祥匪队、杨俊州匪队、邢文生匪队、曹玉丰匪队、天下好匪队、林中好（孙百增）匪队、张全匪队、肖成宗匪队等二十三股匪队，还有邻县常来骚扰的平泉县刘振久匪队，凌源县的姜克芝、于庆瑞匪队，建昌县的张子文匪队，迁西县的张彦匪队，这些匪队人数多达2500人，活动在全县的长城内外，都山、老岭的周围，大丈子、双山子、龙王庙、木头橙、土门子、肖营子等较大村镇附近。

三、解放初期剿匪情况

为了保护土地改革运动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巩固新政权的建立和支援前线，县委、县政府在上级党、政、军机

关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组织指挥了剿匪斗争。由县里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建立了剿匪委员会，专门从事领导和指挥全县的剿匪工作。１９４６年冬，在冀东十六军分区部队和县支队共１７００余人，对活动在青龙各地的土匪进行围剿。是年１２月末，全县统计全年歼灭土匪五股，打死匪徒９０余人，慑降２７０多人，罪大恶极的匪首被人民政府镇压５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９日，青龙县委发出"剿匪扩军"指示，号召全县扩军，建立武装区小队，整顿民兵组织，配合十六分区主力部队剿除土匪。１２月２２日，县公安局在隔河头召开有１２００人参加的追悼会，追悼被土匪杀害的区、村干部，会上公审处决了首恶土匪樊春林、冯万明等四人。

１９４８年３月，县武装支队在各区区小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继续追剿土匪。４月县政府发出布告，动员协从或被骗当匪者，弃暗投明，回乡生产。全县有４２０名匪徒及其家属向人民政府自首。

１９４８年９月３日，中共热河省委决定成立青龙县剿匪指挥部，县委书记刘保胜为总指挥，张志臣、贾忠业、冯万顺、段络、周化通、郭兰廷为委员。召开会议，研究剿匪政策，形成军区部队、县支队、公安队、区小队和民兵及邻县支队联合大会战的局面，在全县铺开剿匪运动高潮。先后把高占海、张其昌（原赵辅臣匪队残部）为首的还乡团（亦称大肚皮）窜到青龙大丈子，烧粮库、学校，杀害区村干部后逃至义院口，被驻青龙县剿匪警备团和县支队歼灭，虏匪众１１００人。其中有随匪家属６０余人。又把六区战勤指挥

部主任张春利叛变为匪的18人歼灭，独立四团会同县支队在八道河区狮子坪击溃了宋绍久、李强匪队，俘匪70余人。9月上旬，花场峪民兵指导员赵成金率民兵捉捕了匪队长肖成发；11月11日警备三团在花场峪靴脚沟截击逃散的股匪100多人，大部被歼，个别匪首逃往口里。到1948年底在人民武装的围剿震慑下，匪势大为削减。

1948至1949年秋不到两年的剿匪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歼灭匪队28股，打死匪众228人，俘虏匪徒1，427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攻势下，瓦解匪众420人。其中击毙匪首3人。打伤3人，俘虏12人，被俘匪徒中有邻县遣送回119人。缴获六〇炮2门，炮弹12枚，机枪2挺，冲锋枪2支，大枪257支，短枪25支，手榴弹12枚，长短枪子弹2600发，金、银元、烟土、黄丝、布匹、衣物、牲畜若干。

1949年夏，经县公安局处理匪犯案件达218起，群众揭发检举通匪案件28起。双手沾满革命烈士和人民群众鲜血的汉奸，匪首高占海，1948年匪队在义院口被击溃后易容逃往东北，改名高北峰，混入原绥远省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林业办事处当了工人，在一次酒后吐露了本人过去罪恶行迹，群众报告公安部门，经核实将其抓捕归案，解回青龙，1953年4月被处决。匪首金巨川曾在宽城县和青龙县张杖子，马圈子一带作恶多端，1948年匪队被打散后，携其妻、子更名张文山，潜逃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房乡和平村，伪装好人多年，1967年6月28日行迹败露，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于1970年3月23日，在宽城县处决。

在挖匪根起匪枪运动中，共挖出土匪８０多人，起出机枪一挺，大枪３５支，手枪２３支，子弹千余发。其中从本县挖出匪首、匪队骨干有张寿芝、曹玉峰、李文祥、李如军、李强、杨印轩、冯继光、赵国珍、冯首义、丁秀林、李维春、张治、赵文明、王永、王廷喜、张福林等３０多名；从沈阳、哈尔滨、克东、呼和浩特、北京、承德、迁安、卢龙、临榆、建昌、平泉等外地挖出解回青龙的匪首、匪队骨干有赵辅臣、高占海、曹清、王庆会、赵统刚、张金增、韩殿臣、张香久、李国顺、张玉海等２０多名，因他们罪大恶极，顽固到底，均被我司法机关先后处决。

１９５１年５月到１９５２年１１月的肃反镇反运动中，又查出随匪，通匪的３１５人，这些人按有关政策进行了处理。

青龙在清末至建国的五十年中，人民群众深受兵灾匪患涂炭，建国后，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才过上安定生活。

注：本文是参照杨金珍、王海庭、佟振庭、王青等同志提供资料整理。

匪患与都山设治局的建立

王　青

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前身是都山设治局，而设治局是根据盗匪渊薮而成立的。

明、清时，青龙满族自治县，隶属永平府临榆、抚宁、迁安县所辖，辛亥革命成功后，仍沿过去所辖范围。此地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东段，长城北侧。境内有都山、老岭横亘，山峦林立，林密树茂，青龙河由北向南流贯，沟谷交错，地形复杂，资源丰富，乃物华天宝之地。

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永除帝制，人们可享受共和与民主权利。孰料袁世凯窃权称帝，黎、冯和张勋等相继，概仍其旧，酿成群雄割据，干戈四起，军阀之间面临着新的权力和财物的再分配的争夺形势，为此，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混战。农村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政府昏愦，赋税沉重，残民自肥，暴虐百姓。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军伐混战中，自造武器，私卖军火，兵械流散。官吏和地主备武和扩充势力，在于巩固政权，镇压人民，防范匪盗。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者，为了生计，先是秘密结社，招集党徒，聚而成队，进而购械起事。他们初对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地主，常乘不备，进行劫掠，在政治和经济上予以打击。这些人无有远大理想，素性

不羁，组织纪律很差。他们牵挂甚少，很能勇敢斗争，有的在行径中虽然也能做些好事，但带有很大破坏性。尤其到后来，声势强大，股绺渐多，盗者痞子拥入，甚至有枪便是草头王，形成由劫富济贫的绿林，到东抄西掠各处流窜的流寇，进而形成不恤民生，蹂躏群黎的匪徒。

青龙一带，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两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回师沈阳及一九三〇年东北军再次入关，几经战火劫难，民不堪命，几无宁日。这一带称土匪为马达子（注1），一九一四年竖旗拉杆子的是绰号许大麻子组织的常善绺子。他们开始，尚有正义之处，劫击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地主，令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醵资助饷。后来逐渐人多，有的单立旗号，另拉绺子，聚众招朋、各自为政。他们对索要不能按期助饷者，先行抓人，然后要被抓家属用款物赎人。抓人，土匪称"绑秧子"（注2），有钱有物按期赎回的为"金花秧子"，不能按期赎回的为"瓢水秧子"。随着当时全国四分五裂，挺身走险相聚为匪者渐多，尤其是，一九二九年青龙一带起了蝗虫，遍地伤禾，农业欠收，粮食严重减产，盗匪相继蜂起。当时，长城内外有名的匪首小白龙、穿山虎和大林字。他们啸聚二、三千人，与临榆、抚宁、迁安三县武装和地方民团相仇。三县几经共同会剿，未能扑灭。小白龙本名任福庆，一八九五年出生青龙朱丈子乡老李洞村的农民家庭，小时从父务农，冬闲狩猎，练就一手好枪法。从匪后，因身体健壮魁武并有百步穿杨的本领。据当地任仕学说："他与民团顶水（注3），一枪打在民团团佐的手枪口里，从此名气大震。"他根据村名"老李洞"是秃尾巴老李居住的洞府而起匪名为小白龙，名震永平府和绥

中、凌源、平泉一带。抗战时，曾一度被我军收编，后因条件艰苦又从匪，于宽城县崖门子战斗中被击毙。匪首穿山虎，本名单田，系一八九五年生于青龙满族自治县娄子石乡齐集口村，因带匪夜行都山百余里，得绰号穿山虎。一九三〇年战死本县隔河头，其子单学林尚在。大林字绺子匪首为青龙冷口村吴朝汉，本人揭杆竖旗成为大贵（注4）后，强调部下匪徒纪律，注意手下人员作风。因为纪律好于其它绺子，所到之处村民很少逃跑并多有招待。行军时，本人骑匹红马，前呼后拥，绮罗伞盖，气魄如同王公大臣。此人解放初被捕，据传说死于狱中。

除上述有名气的三股马达子外，一九三〇年间，还有：滚地雷、二抖喽、大青山、梁山、梁海、张柱、于址元、忠正、黑山、林中好、大武龙、老耗子、宁山、草上飞、天下好、大登楼子、二、三、四登楼子、常乐、荣山、大老黑、二老黑等二十余绺子马达子。他们利用此地山多林茂的有利地形，经常出没在长城内外，骚扰百姓。三县联合进剿多年，不能奏效。这些股土匪有合有分，无战时自行活动，遇有战事联合作战；战时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进深山老林。此地距离三县的县城较远，各县武装力量鞭长莫及、无用武之地。对此，当河北省一九二八年成立后，请示南京政府剿灭这一带土匪，派旅长何柱国为剿匪司令，带石世安四十六团，李树藩六十四团，会同抚、卢、迁三县保卫团与热河八十三团，南北夹击月余，进剿会师于双山子镇。此次会剿虽扑获和击毙一些匪徒，大青山、滚地雷、于祉元、忠正等绺子被歼，穿山虎被民团在隔河头击毙，但远未肃清。何柱国旅长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以盗匪向系渊薮为由，向河北

省政府建议，采取此地设治县级行政机构措施。为了肃清这一带匪患，维护社会治安，河北省政府立会议决定设立都山设治局。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批准河北省成立都山设治局，所辖地是以长城北侧，东起干沟，西至龙井关，北至虎头石，面积约五千余平方公里，由省直辖，局址设在双山子镇，任王朝凤为设治员（注5），后改称设治局长。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都山设治局，以境内青龙河为据，命名为青龙县，仍继原设治局所辖范围，任张尔舟（注6）为县长。

作为当时流氓无产者马达子（土匪），虽然被国民党政府和当地民团及后来的日本人消灭了，他们骚扰黎民百姓，为群众所憎恨。但对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动摇统治阶级基础，荡涤了一些封建势力，雪白一下群众胸中多年被剥削压迫的积怨又被人们称颂。千秋功过谁与评说？此段历史事实让后人再进一步评说吧。

注1：马达子是群众对土匪的称呼。意取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在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的说法。据史书记载，两宋、辽、金时，我国北方的一支系少数民族，从广义上讲是我国北方诸民族的总称。群众中也有南蛮子北达子的说法。

注2：秧子系土匪的黑话，即无辜被土匪抓去做抵压的人。

注3：顶水系土匪黑话，两军相遭遇。

注4：大贵系土匪黑话，即大头目。

注5：根据都山林丰树茂故取名朝凤。

注6：根据青龙河取名尔舟，意为在河之上自由栽游。

青龙镇匪患目击记

马 威 玉

青龙镇（原名大杖子镇）地处山海关至铁门关之间，是塞外一座重镇，它不但是沟通关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而且是货物贸易的集散中心，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兵灾匪患频繁，平民百姓多灾多难，深受其害。

青龙镇最后一次匪患，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的一天。由于我军在东北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国民党残余大举南逃，当时反动武装、土匪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各股集结，汇合、改编、尾随其后，妄图逃避死亡覆灭命运，在逃窜中，他们仍然不妄己仇，以图报复。

多年危害青龙地方的高占海匪队，集结两千多人，扬言自汤道河经青龙镇过冷口入关。其实，他们不敢走冷口，而是走义院口入关。在他们途经青龙镇东那庄村，分出一股土匪，由青龙镇头号恶霸地主张振雨的儿子张玉山、张玉梅领头，窜入青龙镇进行袭劫报复，他们的烧、杀、抢罪行以及狼狈逃窜的丑态，如今历历在目，现回忆全貌，以告后人。

那年，我十岁，已进入小学读书。对世间生活、事物似懂非懂、似怕非怕，对什么都新鲜，都想看一看。因此我竟意外的看到了这次匪患的烧、杀、抢、掠全过程。

土匪进街的那天上午，人们就得到了消息，男人、青壮

年都已躲起来，家中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物资和粮食也藏起来了。下午，我乘机由家中溜了出来，想到街上去玩。到了大街上一看，整条东西大街，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买卖店铺家家关门、户户上锁，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我正在纳闷，忽听几声枪响，就见一队匪兵由东门窜过来，见到买卖店铺就撬窗砸门，抢夺商品，我赶紧跑回家藏起来。时间不大，听见枪声四起，后来时断时续，约有一个多小时才停止。后来才知道是我军地方武装区小队在区长杨兴国的率领下，占据南北两山向土匪佯攻干扰。当时我军区小队只有二十几人，十几条枪，而土匪有二百多人，人人有枪，虽然我军人少，但控制着制高点，虚实相间、变幻莫测，有效地牵制了敌人，使他们不敢久站，砸抢破坏。

由于枪声停止，我又偷偷地溜了出来，藏在墙的拐角处向大街上张望，恰恰正是匪兵集合准备逃离现场的时候。我见到一名匪兵，急急的大喊大叫 “集合、集合”！还不停地吹着“哨子”，只见一群群土匪个个背着、抱着大包小裹由买卖铺户和居民家跑出来，有的嘴里还在吃东西，他们聚在一起，很久也排不成队伍，当官的土匪头子棒打脚踢那些来晚了的匪兵，折腾了好长一段时光，才拖拖拉拉的向东跑去，匪兵的队里还夹杂有几名不穿军装的妇女和男人，也一同逃走。后来才知道是恶霸地主张振雨的亲属，也一同逃跑了。

土匪逃跑后，我见街东浓烟滚滚、大火冲天，跑到那里一看，是我上学的学校被土匪点着了，烧的房子是六区粮站库房（借用学校房子），还有粮站草垛。设在学校院内的农

会和粮站办公室也被抢劫一空。回来路上又听到哭声，原来是我的一位小伙伴"来头"和他母亲被土匪张玉山、张玉海用枪打死了。我到他家一看，娘俩一横一竖死在炕上，血污一片，惨不忍睹。

这帮土匪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呢？原来这是一次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的报复行动。

张振雨是青龙镇这一带有名的土豪劣绅，为人不但专横拔扈，而且阴险狡诈，善用阴谋诡计。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和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民团"，并自任民团副团长。

组织反动武装要花很多钱，他自是不肯出血，总是千方百计要平民百姓拿钱买枪、买不够就打土匪的主意。当时，县东十里的佟丈子村，有个富户叫佟振川，家中有"一把鞭"骡驮子，经常往返于口里口外作买卖，颇有资产。后来被附近无赖付文清"绑了票"作为人质，家中花了很多钱才把他赎了回来。付文清有了这笔钱垫底，买枪捆人拉起一支土匪武装，群众把这支队伍叫"马达子"。

佟振川丢了那么些钱，当然不肯甘心，总想报复，可是苦于无计可施，这件事被张振雨知道了，自是不肯放过，就给佟振川出了一个"欲擒故纵"的鬼主意。从此佟振川就千方百计讨好付文清，表示不记仇，不怀恨，并继续出钱、出粮支持付文清匪队，时间一久，付文清不但解除了对佟振川的戒备之心，而且还同他拜了"把兄弟"。有一次付文清与佟振川在家里抽大烟，佟振川乘其不备，掏出暗藏的手枪，从付文清的背后开枪打死了他。张振雨也乘机袭击了这支"马达子"队伍，夺取枪支武装自已的民团。

张振雨不但抄了付文清的家，还把付文清的妻子、儿子转卖远方，后来经娘家用钱把他们母子赎回。从此，付张两家结仇。

土改时，张振雨自然是清算被斗对象，当地贫民张林是积极分子，而付文清的老婆恰好转嫁给张林，正好隔街相对而居。斗争张振雨的时候，张林夫妇当然要积极参加。后来张振雨被当地农会镇压，两家仇上加仇，张振雨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自然也不断同张林夫妻打架，更认为张振雨被镇压是张林追案的结果，因而仇深似海，刀兵相对。

张玉山、张玉海兄弟俩为了给老子（张振雨）报仇，就投入高占海匪队，群众称他们这支匪队为"大肚皮"。从此，张玉山、张玉海多次寻找机会要袭击农会，都因我军区大队、区小队的严密防范而未能得逞。

土匪这次偷袭青龙镇，由于区小队和农会干部事先得到情报，疏散了群众坚壁了物资，并把队伍拉上山，不断袭击和扰乱敌人，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破坏活动，保护了群众。

尽管如此，人民群众还是遭受了不少的损失，学校的一栋7间校舍因暂时作为我军的给养仓库被焚毁；农会主办的农民商店（现医药公司处）卷烟厂（手工操作）和东升号商店被抢；张林的妻子和儿子被杀害了。

这支匪队在砸抢青龙镇后，自知罪责难逃，于是星夜赶往义院口，准备入关南下，妄图与国民党反动派汇合。但他们作梦也没想到，恰恰钻入我军予先布好的"口袋"中，一举被歼灭。张玉山和张玉海弟兄俩在这次歼灭战中侥幸漏网。但时隔不久，张玉海就被北京人民政府抓获，解回青龙被当地人民政府处决。其弟张玉山后改邪归正投入人民怀

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上了干部。

青龙境内出土最早，件数最多的青铜兵器，是１９６１年６月，在今王厂乡抄道沟出土的商代青铜兵器七件。其中有鹿首曲柄青铜弯刀一把（长２９．６公分）；铃首青铜刀一把（长２９公分）；羊首青铜短剑一把（长３０．２公分）；七形铜器一件（长２１．８公分）；铜戚一件长（１２．５公分），上述珍贵历史文物，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智除汉奸袁庆汉

王 海 庭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用武力占领中国领土，全国人民面临民族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全国抗日救亡热潮蓬勃兴起，然而有些死心塌地铁杆汉奸不顾民族存亡的危难，暗中同日寇勾结从事搜集情报、剿共、逮捕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青龙县干沟镇据点维持会会长袁庆汉（绰号袁大白话）就是一个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的铁杆汉奸。老百姓恨之入骨，一九四二年秋同干沟街日军小队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用枪弹、刺刀、烧杀凶残手段强迫老百姓拆房，进人圈，对不拆不进人圈的户，穷凶极恶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干沟一带抗日工作遭到破坏，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抗日局面打不开，群众发动不起来，抗日干部杨文楼、潘凯、许忠三个区队长，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和平时掌握敌伪活动情况，决定先除掉干沟这个铁杆汉奸。以震慑敌人壮大人民抗日热情。

怎样除去这个铁杆汉奸？经过研究认为在外面除掉不容易。一是袁大白话不轻易一个人出来活动，都是与日本人一齐出来，不好动手。二是敌人在据点里认为最安全，八路军不敢进去有麻痹思想。决定化装进到干沟街，在敌人窝里除掉袁庆汉。

一九四二年六月干沟大集的一天，区长杨文楼、潘凯、

许忠三人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身上装着从敌人那里搞来的良民证，担着两担干柴，一担红杏随着人群进了干沟围子。门口站岗的日本鬼子和伪军盘问，三个人拿出良民证叫他们看，区长杨文楼说："老母有病卧床不起，卖柴给病人买点药，请长官慈悲慈悲。"并从筐里抓出红红杏子送到鬼子和伪军面前说："太军杏子的咪西咪西。"日本鬼子喊了声，"约西，良心大大好。"伪军和鬼子兵每个人都将口袋装满杏子，然后说，你们统统进去的可以。就这样三个抗日干部藏着手枪担着柴禾混进了干沟镇里。按着关系人告诉的路线在南门里不远地方找到了袁庆汉的杂货店，杨文楼、许忠在杂货店外面一个胡同里等着，由潘凯进店找袁庆汉。说来也巧，潘凯进店一问"袁掌柜的在家吗？"袁庆汉一听有人叫他，就问什么事，潘凯说有点山货要不要，袁问"什么山货？"。潘凯说"几筐红杏儿"，袁庆汉说："带我看看去"。就这样带领袁庆汉出了店房来到胡同内指着地上放着两筐杏子说请看吧？这时杨文楼、许忠已到袁庆汉身后，掏出手枪说："不许动，我们是八路军。"等袁庆汉明白过来企图反抗时，三个人一齐动手将袁庆汉绑上，顺着大街人群中推着袁庆汉快步奔向警察分驻所，到警察分驻所门口，简短的宣布袁庆汉的罪恶后叭叭两枪打在袁庆汉脑袋上，判处了汉奸的死刑。三个人打死了袁庆汉，按着事前计划的方案快速撤到围墙西北面登着梯子越过围墙，回到北面山顶上。这时鬼子伪军乱了营，有人喊，八路打死人啦，八路进城了，干沟街上乱成一团，敌人乱放一阵枪，全城戒严进行搜查，闹了半天什么也没抓到，群众听说袁大白话这个大坏蛋叫八路军枪毙了，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相互传说"八路军都会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

影”，这一行动使日伪人员惶惶不安，吓坏了各村的伪保甲长，为了保住自已性命，托人挂勾与八路军联络，愿意为八路军办事。干沟据点内伪警察所马所长和一名警长偷偷写信要求与八路军接头，表示今后外出讨伐决不伤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并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所以后来抗日活动进展顺利，日伪军每次出动扫荡的时间，人数，地点都能提前 得 到 信息，八路军所需要的粮食、衣服、鞋袜只要交给任 务， 各伪保甲长都能及时送到山上。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巩固了当时干沟地区北岭上武工队活动的根据地。

青龙最早加入国家级协会的会员，是原文化馆馆长张守志。他于1983年10月，被国家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85年被山东大学出版的“中国摄影家”辞典所录入。

民兵英雄赵成金

赵　凤　阳

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青龙人民横戈岁月，烽火春秋。立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汗马功劳。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青龙境内土匪猖獗，为患民生，赋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青龙人民仍不懈秣马厉兵、壮志歼匪，又有很多英雄人物名列青龙史册。赵成金就是青龙人民的骄子，他的斗争事迹迄今传为佳话，有口皆碑。

赵成金，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１日生。曾用名赵金成，青龙县牛心山乡花厂峪村人，是全国著名的民兵剿匪英雄。

赵成金幼小家贫，９岁开始给地主放羊，１６岁即当长工。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在花厂峪靴脚沟建立了临、抚、青、凌、绥抗日联合县工委办事处，从此赵成金开始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哺育。１９４３年初春，一个刮风扬雪的早晨，日寇为消灭我坚持山区抗日活动的部队和联合县政府，扑灭花厂峪抗日根据地，对花厂峪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推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花厂峪一时腥风火海，许多乡亲倒在血泊中。赵成金气愤填膺，磨刀霍霍，跟随党的地下工作者赵国恩走上了抗日保家的革命道路。他把一些青年人找到一起，成立了民兵基干队。他担任了民兵基干队队长、爆破组组长。还动员弟弟参加了区游击队。为了

抗日政府和群众的安全，他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寇的一次次进攻，保卫花厂峪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握紧拳头向党宣誓："我的头可断，血可流，一定让敌人偿还血债！"

1944年，日本侵略军为了隔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实行"集家并村"政策。将沿长城数十里以内的村庄划为"无人区"，变本加厉地对花厂峪进行"扫荡"、"围剿"，扬言"铲平花厂峪，活捉赵成金"。赵成金与花厂峪人民誓死不进"人圈"，坚持在根据地与敌人斗争。一次，区委书记李华新决定派赵成金为八路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他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步行到200里外的青龙县城。机智勇敢地从敌人眼皮底下买回了我军急需的药品。这年10月，由于敌人对花厂峪根据地实行军事封锁，花厂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吃粮遭到空前困难，只能靠挖野菜、捋树叶掺合点粮食做成"糠菜饭"充饥。生活十分艰苦。赵成金得知三岔村敌伪粮库已仓满囤园，只有二十多个伪军看守，便把向敌人抢粮的想法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和支持。他马上发动群众，做好了准备工作。第二天雄鸡唱白，赵成金就带领本村和附近村庄的民兵、群众一千多人，在部队的掩护下，赶着驮子，推着车子。拿着口袋奔赴三岔村，我军枪声一响，袭击粮库的队伍杀声震天，奋力奔突冲进了粮库大院。看守粮食的敌人以为来了八路军大部队，吓得六神无主，仓惶逃窜。赵成金指挥民兵和群众砸开粮库大门，抢回七万多斤粮食，解决了根据地的缺粮问题，他还率领民兵爆破组在敌人"扫荡"花厂峪所经过的炭子石、白雀沟、白崖沟岭、箭杆岭、老沟岭、花

厂峪口等各个险口要隘埋设地雷，使敌人每次进山“扫荡”都挨炸，魂飞胆丧，不敢轻举妄动。一年多时间，“扫荡”花厂峪的日伪军被赵成金民兵基干队埋设的地雷炸死51人。粉碎敌人60多次对花厂峪根据地的“扫荡”。当地老百姓编个顺口溜称赞赵成金：

赵成金、
真高强、
消灭敌人不用枪。
石头、木箱装炸药。
敌人碰上一命亡。

1946年，赵成金担任花厂峪村村长，致力于领导全村人民进行重建家园的战斗。

1947年冬，花厂峪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可是，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组织土匪还乡队。进行反攻倒算，破坏土改运动。当时，活动于花厂峪周围的3股土匪200多人，大部分被我解放军消灭，只剩下一小部分残匪在负隅顽抗，活动十分猖獗，严重威胁花厂峪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赵成金决心剿净这些土匪，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让乡亲们过过安稳日子，从1947年冬至1948年，赵成金和他领导的民兵基干队，与残匪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48年3月的一天傍晚，赵成金见一个陌生人行踪鬼祟地溜进自已邻居家里，凭他与敌人长期斗争培养起来的高度警觉，马上断定不是好人，立即召集几个民兵，封锁了各个路口，并包围了邻家的院落。然后，他和民兵吴尚庚悄悄摸进邻家的外屋，从门缝里一看，只见那个人正独自在炕

上抽烟。赵成金向吴尚庚递了个眼色，猛地推开门，闯进屋里，那个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吓呆了；慌忙伸手去腰里摸枪，赵成金、吴尚庚两人"噌"地跃到炕上：；不准动！你被包围了！"不等那人有还手之机，赵成金、吴尚庚两人一人扭住他的一只胳膊，将他捺在炕上，不出所料，果然是一个探听情报的土匪。半个月后的又一天傍晚，天空下着小雨，赵成金刚吃完晚饭，突然闯进一个浇得落汤鸡似的土匪，端着大枪对着赵成金和他的妻子说："我们的队伍要到了，快做２０个人的饭。"八路军哪有强迫做饭的，定是土匪无疑，赵成金一怒就要扑过去夺枪，但又一转念，在这个时候硬拚是不行的，应先稳住敌人，再设法通报其他民兵，再动手不晚，他假装很害怕的样子，赶紧把土匪让在炕上，说："长官，你先坐在炕上烤烤火，我这就去挑水，回来马上做饭"。土匪慌忙把枪一横："站住，不许出屋！""没有水咋做饭哪！"赵成金沉着反问，转身出屋去挑水。狡猾的土匪却紧紧跟在后面，待赵成金挑水回来，土匪叫赵成金妻子去做饭，仍不许他出屋，赵成金困在屋里，心急如火。一会儿，妻子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稀粥端进屋，赵成金急中生智，从妻子手里接过粥碗送到土匪面前，土匪双手去接。赵成金"啪"地一下将粥碗砸在土匪脸上。土匪猝不及防，"哇"一声仰倒在炕上，赵成金趁势扑上去，捺住土匪双手，膝盖顶住土匪前胸，妻子马上拿来绳子，，夫妻俩三缠两绕，紧绷绷地把土匪捆上了。经审问。这土匪是周振邦匪队排长张万发，想在花场峪吃完饭连夜奔秦皇岛去找他们的匪队。赵成金从他身上缴获１支步枪，４５发子弹。三颗手榴弹。第二天土匪王殿真又窜向花场峪沟口，赵成金得知消

息后，立即布置民兵和群众上山堵截，自已带着新缴获的武器顺着沟膛子追了过去。王匪见势不妙，掉头向北山坡跑，边跑边朝身后开枪，子弹嗖嗖地从赵成金耳边和身旁飞过，但他不顾一切紧追不放。这时80多名民兵和群众分别从两面山上一齐包抄过来。土匪象野鸡一样顾头不顾尾地钻进一个山洞里，赵成金喊他投降，土匪仍然顽抗，不断向外射击，赵成金便向洞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土匪吓得爬出山洞，束手被擒。

这年秋天，花厂峪的山山岭岭退绿披红，人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开始第一次在沟沟岔岔里收割自已种的庄稼。匪首肖成发隐匿于山深林密的老岭，经常下山抢夺群众的财物、庄稼、杀害我土改干部和区小队战士，并扬言要抓住赵成金、王金等村干部和党员开"屠肉铺"。赵成金丝毫没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吓倒，连日带民兵搜索，将肖成发一股残匪全部消灭掉，只剩肖成发孤身一人。最后，肖成发感到穷途没路，终于耷拉着脑袋下山投降了。

经过一年多出生入死的艰苦奋斗，赵成金带领民兵共抓获、消灭土匪16人。为此，他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表彰。曾多次出席县英模大会被评为青龙县战斗英雄。3次出席省功模大会，被评为甲等剿匪英雄，一次出席东北地区功模大会，被评为民兵战斗英雄。

1949年，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被授予"英勇机智的民兵剿匪英雄"称号，参加了开国大典，并第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51年1月1日，原热河省委机关报《群众日报》刊发了一篇鼓词赞扬赵成金模范事迹：

提起赵成金无人不晓，
无人不知这有名的英雄。
英雄的事迹说不尽，
英雄的功劳数不清。
………

土地改革以后，赵成金担任了花厂峪村党支部书记，他领导花厂峪人民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从1949年到1958年10年间。花厂峪一直被评为模范村。1958年，花厂峪粮食总产上升到51万7千零95斤。这一年，赵成金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59年，赵成金被特邀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奖励半自动步枪1支，子弹百发。

后来，赵成金又担任了山神庙乡党委书记、龙王庙公社党委副书记，他感到自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起早贪晚，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带领人民建设家园。由于长期的战争岁月的磨难，积劳成疾，身患肝炎等病，下肢浮肿。行走都很困难。但他以战争时期那种敢闯敢拚的忘我精神，一直坚持不懈地工作，1962年8月5日，赵成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秦皇岛市人民医院。终年48岁。

赵成金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却永驻青龙各族人民的心中，鼓舞着青龙人民为实现新理想描绘新蓝图而不屈不挠的斗争。

青龙县在民国和伪满时期部分官吏和仕绅

邵毅然 韩文儒

青龙县在清末民国时期归属临榆、抚宁、迁安县分管。1924年二次直奉交战后，由于兵戈扰攘，地方混乱，县内土匪（马达子）相继而起，直闹得人心不安，民不聊生。为了安定地方政局，由八区绅董关墨轩承头会同大丈子、双山子等处的绅商与各界知名人士，赴秦皇岛向张学良的僚属何柱国旅长请求派兵出口镇剿匪乱，安定民生。经何旅长请示河北省府批准，确定长城以北的临（榆）、抚（宁）、迁（安）三县所辖地区设立都山设治局，局址定在大丈子（现在的青龙镇）。

一、青龙首任县长王朝凤

1931年河北省省府为安定边关外这块地方，委任王朝凤为设治局局长，筹措建县和代行县署一切事务。当王朝凤出界岭口来赴任时，途经双山子，看到双山子风水很好，有双凤落地之象，他就把局址改到了双山子。王朝凤借“凤落都山”可飞翔宛阻之意，改都山设治局为都山县。他在任不足二年，政绩平平，直至日军侵占都山县时，该县长及僚属被吓跑。

二、伪满第一任县长张尔舟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日军飞机轰炸都山县县署双山子，并派第六旅二十四团占领了整个都山县，从此，北口外这块地方沦为日伪统治区。原县公署被搅乱，伪县长被炸伤，陆承审被炸死，县长及所属文武官吏被吓得逃往口里。伪满热河省府为继续统治这块土地，又委派张尔舟（东北人）为县长，县址由双山子迁至大丈子。张尔舟为取地名吉利，他以，舟行江河之义”以青龙河为名把都山县改为青龙县，这个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张尔舟是个唯利是图的贪官，他手下还有一帮污吏，正所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甭进来”的脏官衙门，凡有事要求见县长者，首先就得给看门守院的差役们送“门包”否则休想见县长一面。这个县长不仅不理民情，不顾民众疾苦，他还有个怪癖，就是喜欢热闹。比如民间的大秧歌、地方的皮影、七月十五的盂兰灯会等。他手下的官吏和地方的仕绅们为迎合县太爷的爱好，每年正月都要从各村调来最好的秧歌供县长观赏，平时还要看皮影，当时北口外较有名气的李秀、马振刚、齐怀、历景阳等影班为他演皮影，还要把一些他爱听的唱段捐成唱片供他用来消愁解闷，张尔舟最热心的一项文娱活动就是七月十五的盂兰灯会，为办好盂兰灯会，他叫下属们提前几个月就向县城附近的各会会首下达指令，要各会做好灯会的准备工作，要选送各会能歌善舞的俊俏青少年，和各式各样的彩灯，还有煤油、木棍、棉花、蜡烛等，把木棍裹上棉花沾煤油或蜡烛插在彩灯内，到盂兰会的夜晚将彩灯放于河中，让灯漂流而下，其景致十分壮观。与此同时还请和尚念经，据

迷信传说，这是叫死去的阴魂抱河灯去投生，以此来表示地方官长对阴魂超生的一种善举。张尔舟在任期间对执行国家法律是很不认真的，当时的衙门大院内的官吏和伪、警、宪、特们吃（吃抽鸦片）、喝（大酒）、嫖（嫖妓女）、赌（耍钱）成风，他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对下边的乡村经常派警察去抓赌，凡被警察抓住，都受到严励的惩罚。这位县长在任二年多时间，由于官风不正，品质恶劣，很不得民心。

三、伪满第二任县长王东郊

张尔舟因不得民心被调走后，伪省府又委派王东郊（东北人）来当县长。这位县长与前任县长大有不同之处，能体恤民情，他不仅能严格要求自已，而对下属也能严加管束。上任不久，他了解到原县衙的官吏弊病很多，他随既取消了来县衙办事递门包的恶习。这位县长生活作风也比较俭朴，每日吃饭多用老豆腐佐食，很少见他吃肉菜，他有时到下面查询科股工作时，不仅对公务要求严格，对他们生活上也提出不要侈奢要节俭，县长曾对自已随身的差役说："科股人员的生活水平胜我多倍"。该县长在任一年半，后来自已向上级请求调回东北老家。

四、伪满第三任县长王宗禄

王宗禄（山东人）来青龙当县长，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牌位县长"，意思就是挂名的县长。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在日军的统治下，无论军政等一切事务都要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每逢开会议事，他也只能照本宣读，念完主子们（日本人）拟好的文件，他也就完事大吉了。他在衙署的公务

中，看到各科、股上边来的公文或拟出下发的稿件，不但不知如何处置，就连衙署的官印盖在何处都不知道。他在任期间有这样一个笑话，广为流传。那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初冬，我冀东军分区和八路军以及地方游击队日益壮大，不时袭击日伪据点，有一天他的下属警务科的警察们探听到八路军要来袭击县衙的情报，直吓得县城居住的文官、武将全员出动，守卫县署，加岗增哨轮流值班，折腾了一天一夜也不敢睡觉（其实八路军没来），就发生这样大的事情县长却一无所知。次日天明，县长来办公室点卯时，见衙署的室内室外脏乱不堪，却大发脾气说："怎么昨晚下班你们都干什么去啦，连办公室都不给收拾干净啊？"当时来应差的勤务员于贺对县长说："县长大人，您还不知道吗？警务科获悉说昨晚八路军来袭击县城，全县署的上上下下，不分文官、武将和兵弁差役，都在办公室等着轮流执勤站岗，马不卸鞍，人不解带的直折腾了一宿啊！"这位县长才如梦初醒方使知道。从上述的事实可见这位洋奴县长也是不好当的，他的"牌位县长"之称也并非枉言。

五、地方恶霸张振羽

张鹏字振羽是青龙县大丈子北街人。祖籍山东省，其父单身行医（兽医）来到青龙县大丈子，因医术较高明，生意日渐兴隆，就在大丈子北街娶妻落户，娶妻成家后生男女各一个，其男就是当地人民所憎恨的恶霸张振羽。张振羽长大成人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军败退途经此地，丢下很多枪支弹药，因此，北口外长城沿线土匪相继而起，虽经上边派来军队围剿，也未根

除，当时北马圈子头道河子村有个叫刘文轩的仕绅向派来剿匪的军队长官提出建议，需委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说服匪方投降，胜如以武力械斗为好，军队长官接受了此项建议，并委派刘文轩为说客，深入匪窟晓以利害关系，结果很奏效，当时就有小白龙、大林子等匪首前来投降，当时军队就将所有受降的匪队全部带去天津改编，对匪首也都赐了官职，将大丈子北街马瑞（匪号忠厚）到天津被授为营长，马瑞在天津不到一年，经请求来家省亲，到家后，就再没返回部队，那时当地匪队还很多，可地方上一无政府，二无军队，当时一些绅商富户们为了保全自已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公举马瑞为地方自卫团团长，可是他那个团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就连武器兵员尚待筹措，所用资金还在向当地绅商富户征讨，在人员武器筹备未齐的情况下，于民国十七年二月初二却遭到匪首夏五虎等匪队的突然袭击，自卫团被打得七零八落，把马瑞追至崔丈子打死，随后不久，地方再次组织自卫武装力量，成立了有武器又有兵的自卫团，马圈子镇二道丈子的张兴舟为团长，张振羽为副团长，因张振羽是地头蛇，一手遮天，特别对团内的一切权柄或事务都要自已过问，对匪窝的抄袭或匪首家财的没收他都亲临其境，从中捞取大量资财，在分脏没收财物时他还要多贪多占，就这样不到二年时间，他家就成了大丈子这块地方上的有财有势的恶霸。日本占领青龙以后，张振羽虽没担当任何官职，凭他的数栋房屋和深宅大院，有两个妖艳的女儿和一个小老婆，日伪有头有脸的官员们大多住在他的宅院里，日本长官佐滕就住在他家，经常与张的两个女儿鬼混。凡遇有海关处理物资时，虽贴出标价卖物广告，实际上别人无从下手，却都被张振羽买去，再

据市场行情多出几倍的价格卖出从中大发其财。他家土地虽不多，长年雇用三个长工，但对长工们也十分刻苛，按当时的习俗财主家雇工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吃犒劳（改善伙食），而他家仅以豆腐或煎饼、粘糕来应附，一次张振羽妻子在非改善之日吃煎饼，被张振羽发现后，一边骂一边把磨好的煎饼汁子扔到猪圈里去。他对地方的乡亲和左邻右舍也是刻薄至极。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群众的愤恨。1945年青龙县城解放时，因群众揭发有人命案，害死雇农付宝兴的父亲，当既被人民政府处决。张振羽之子张玉海比其父更为横行霸道，在青龙解放时随匪队潜逃到迁安一带，后又逃到北京郊区，对其父被人民政府镇压怀恨在心，于1948年夏季，偷偷溜回青龙，复仇心切，便秘密串通地富、反、坏以及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组织起还乡团，大搞反攻倒算。张玉海起事后，到处找仇人进行阶级报复，一次在大街上遇到付宝兴之母（当时付宝兴之母已改嫁到大丈子西街张林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日夜间，张玉海带着部分还乡团闯入张林家，将其妻和年仅五岁的张林之子一并枪杀，正因为有此两条人命案，于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将潜伏在北京郊区教育界的张玉海逮捕归案，不久被处决。

六、反动仕绅马云飞

马云飞是青龙大丈子北街人。民国后期伪满前曾当过区长，该人口才极好，能言善辩，1933年日军侵占青龙后他就当上了伪协合会会长。死心塌地地效忠日寇，到处谣唇鼓舌大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谣言，破坏我党我军的抗日活

动。他还秘密搜集我地方武装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去日本那里谄媚，讨好日本人的信赖。１９４５年青龙解放时他逃亡外地。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迁安县时，由于该人身份不清被清查出来，马自知过去罪恶多端，人民政府不会饶恕的，不久便服毒自毙。

七、开明仕绅蔡青林

蔡青林是大丈子南街人。在伪满时期曾先后任青龙县土门子区长，内务科、实业科、财政科、教育科科长，为人忠厚朴实，没有官架子，善于联系群众。特别在教育方面为青龙人民做过一些有益工作。１９３１年都山设置局期间，他在土门子任区长时，先后创办了２５处小学，学生达千余人。１９３４年春，他任伪青龙县教育局局长。对北口外山区的教育事业极为重视，上任不久，就把全县的教育工作进行了恢复和整顿。接收了大丈子“福音堂”办起了县立小学，在大丈子又成立了一处女子初级小学，在八区龙山完小的基础上增设了大丈子、双山子、干沟、峪耳崖、四处完小，初级小学由原来的５０处发展到１００余处。１９３７年为解决教师人才不足，决定成立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他亲兼校长，校址在大丈子完小、同年在他的重视和领导下，全县男女学生达１７．０００多人，居伪热河省首位。１９４１年初，他任教育科长时，在县城成立一所国民高等学校，在县署设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县下设１３个教育区，当时全县学校发展到３８０余处，学级达２０００左右，在校学生有１９．０００人，教职员工达２０００多人，由于蔡青林务实精神较好，很受群众拥戴。１９４５年１２月，赵辅臣叛

变为匪，带匪队攻打县城，因他不明真相，也随合了那次叛变活动，赵辅臣叛变被平息后。蔡当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受政府追究，不久便逃到秦皇岛。1954年，蔡的次子蔡××（早已参加革命，在某公安机关任职）知其父还在秦皇岛寄居，便赴秦对其父说明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劝其回籍自首，在儿子的说服动员下，携枪回青龙投案自首，人民政府确对其从宽处理，没给什么惩罚只给带上四类分子帽子，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动下，他还主动请求去秦把马丈子村五道沟的王永（也与他同时参加赵辅臣叛变的随从分子）说服携枪回青龙自首了。在“文革”期间，蔡青林被列为专政对象，经常把他排在黑帮队伍中，但无人把他纠出批判，1968年解除专政，在家安度晚年。

青龙县鸦片的传入

毒 害 与 戒 除

杨 明 保

鸦片，也叫阿片、阿芙蓉、群众称为大烟或烟土。鸦片是从草本植物罂粟中提取出来的止泻、镇痛和止咳的良药。然而使用不当，又会变成麻醉神经的毒品。解放前的长时间里，正是这个鸦片曾给青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

在青龙县，鸦片的传入是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的。当时，长城以北的青龙一带还是人烟稀少、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荒芜之地，清廷为解决满人生计和奖励有功的满人。遂令一批批满人从关内到关外"跑马占圈"，立业安家，强制一批批汉人从关内到关外投充劳动。这样，鸦片和提取鸦片的罂粟种子也就从关内带到青龙。从此少数人开始种植和吸食。到清咸丰9年（1859），清廷发布了戒烟令，明文禁种禁用。可居住青龙边远山区的满汉人仍有不同程度的种植，且急聚扩大面积。到中华民国初年，现青龙范围的东、中、西分别归临榆、抚宁、迁安三县管辖，这种罂粟种植已有一定规模。到中华民国20年（1931），临、抚、迁长城以北地区单设了都山县（行政机构叫都山设治局），加强了对罂粟种植的管理。但是，由于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明应暗许，致使罂粟种植面积有增无减。特别是当时有英、法、日等许多烟贩

子，从外国、外地运进大批鸦片。来这里倾销倒卖，到日本占领青龙前。在大丈子街尚有哈德梅等数名外国人公开经营鸦片买卖业务。由于本地烟土的增加和外地鸦片的大量涌入，致使青龙烟民激增，烟害日趋严重，到日本占领青龙时，青龙罂粟种植面积达一千多亩，吸食鸦片者可达数千人。

１９３３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后，原都山县范围被划入伪满州国热河省的版图，改名青龙县。日本帝国主义为缓解本国财政之紧张状况和为征服中国独霸东亚筹集军费，竟不择手段地在热河推行扩大罂粟生产，增加鸦片贸易的政策。当时青龙县４７，１４８户，２２６，８００亩土地，伪热河省公署就指定青龙２０，０００户种植罂粟，每户平均要种１.１亩，全县最少也要完成１５，０００亩土地种植任务。日伪为完成这一种植任务，层层建立烟政组织，省设有鸦片专卖署承德办事处，后改为热河禁烟善后管理局，县成立禁烟管理分局和专营鸦片的大满号。后来，伪县公署行政科专设有烟政股，各大村、镇皆设有管烟所（鸦片零卖所），各警察署、村公所都有管烟组织和职员。这些组织和成员，大张旗鼓地宣传伪热河省制订的《种烟简章》，发传单、贴布告，极力鼓吹种植罂粟的所谓好处。同时，从省到县，层层下达种植罂粟指标、频频派官员到各村、甲摧促落实，并长期雇用大批人员，组织罂粟戡察班，深入实地，逐地块丈量罂粟的种植面积，确定烟政特税和种烟户上缴烟干任务。由于日伪对罂粟种植极力提倡、指令，再加“一亩罂粟五亩粮”（群众语）的经济效益，使不少农民将肥沃土地改粮种烟，使罂粟像决堤之水，

极度泛滥。当时十字坪村仅有６０户，种罂粟５０多亩，肖营子１００户种罂粟１００多亩。大丈子村张振雨、马树森、十字坪的王明周、双山子村王同都种有八、九亩乃至十多亩。许多地方是村村种、户户种，凡是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的地方，全种了罂粟。有地的农户种，无地的农户租地也种，十字坪村贫农亢利生自家无好地，还租了5亩地种了罂粟。双山子是个商农共居的大村集镇，不仅５０多农户种了，就连无一寸土地的３０多家经商户、买卖家，也有半数以上租地种了罂粟。无地的董立宗，本村没租着地，曾到五十里外的蒿村租种了一亩地、开饭馆子的孙士富还到围场县租种了一亩多。当时，罂粟是日伪确认并鼓励的主要经济作物，种植罂粟又被一些人看作是发家的捷径有致使罂粟种植业飞速发展。据伪热河省警务厅烟务科１９３７年统计资料记载。１９３３年，罂粟全县种植仅有１０９９亩，可到１９３６年；猛增到８１７１.１亩，１９３６年比１９３３年增长了7倍。

罂粟种植面积扩大十分惊人。而鸦片的毒害更为惨重。

按照伪满州国《鸦片法》，鸦片是实行专卖政策，农民种的烟，都要上交伪政府的鸦片专营机构大满号，私人不准经营、贩运、存留，并经常组织鸦片缉私队到各地查抄。可是在社会上流行的鸦片越来越多，一是伪政府一面口喊禁烟，建戒烟所、康生院，搞浮浪检举，实行“渐禁”。一面将农民的烟收购上来，经过加工、炼制。再由官办管烟所公开卖给伪警察署批准发证的烟民。纵容吸扎；二是一些烟贩子，为捞取巨利而从东北、内蒙、围场等地走私贩进大批鸦片，为大批无证烟民提供充足的烟源；三是农民自产烟土除

上交外，手中尚有许多。当时人们曾认为，鸦片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是服就是吸、扎、头疼、心口疼要用鸦片，痢疾、咳嗽要用鸦片，就是感冒、虐疾也用鸦片，甚至着凉了、干活累了也都服一点吸两口。男的这样，女的也这样，大人用、小孩也用。这样成千上万的罂粟种植者逐渐变成了烟民，据多点典型调查推算，当时因病服用鸦片者，在青龙范围可达四、五万人。已经成瘾而常年吸扎的烟民近两万人，十字坪当时59户，常年吸扎的35人，平均1.6户有1烟民，七区肖营子当时不到100户，就有烟民90多人，大体1户1烟人、四区大巫岚翟家大院共14户，67人，成年人49人，而烟民竟达29人，平均每户2个烟民还多、烟民占成年人的60%。六区二道丈子村71户，吸扎鸦片者达80多人，其中扎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13户，下关东的4户，卖老婆孩子的3户，明伙劫道的3人，吸扎中毒身死的7人。

那年间，数以万计的烟民，整天成帮结伙地集聚一起，从早扎到午，从午扎到晚，日以继夜。什么小男少妇、大伯弟媳多凑到一起吸扎，你给我扎，我给你扎，络缚扎烂了就往屁股上，大腿上扎，有的人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块较大面积的好肉。这些人中多数是形如骷髅，神似罪囚，思想、意志、道德失常。鸦片成了这些人的第一需要，有钱要扎，无钱卖衣服、典房地，甚至卖儿卖女、卖妻子也要扎，致使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十字坪村王同，早年家里日子十分好过，房屋地产也多，可全家两口子、俩儿子、俩闺女六口人全扎烟针，仅几年功夫，就将家产扎的罄净。结果大儿子中毒早亡，小儿子不能劳动未娶上媳妇，两

个闺女未嫁出，造成家破人绝。二道丈子村王树平，家里土地１００多亩，汤道河还有个窝铺，两口子将房屋地产家俱全部扎光，最后王树平只好下关东、卖妻子，惨死于东北的荒郊。肖营子村于保江因扎烟针被日本浮浪检举中抓走未回，其子十多岁就扎，到十七、八岁时死于烟毒，于妻因生活无着贫病而亡，两个小女儿被别人收养，财去人绝。大丈子村邵占荣，全家仅三口人，母亲、妻子，当时有土地四、五十亩、房子十多间，山场多处，由于吸扎毒品，使家当尽无，最后老母惨死，妻子卖掉，自已出家当了和尚。大巫岚大院。系翟家于康熙八年奉谕出关，在大巫岚一带“跑马占圈”而设的田庄（俗称翟家大院、今大院村）庄主翟宪章一家，有旗地数千亩，每年收租无数，家里十分豪富，古玩、字画、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应有尽有，可是全家９口人，竟有７口有吸鸦片的嗜好，结果逐渐败家、落套了，家当变卖一空，到解放时，翟宪章一家却成了花儿乞丐。大院村翟成是旧中国大巫岚乡一带有名的富户，家有土地数百亩，房子数十间，牛羊骡马许多，翟成的父亲是抚宁旧东兴当铺总经理，当时人称翟成为少爷，其妻是大家闺秀，人称“小姐”，他们横草不摸，竖草不拿，家里雇用佣人仆妇多人，常年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翟成的妻子除了不吃粗粮外，吃饺子都不吃犄角，长工挑的水，身后那桶都不吃，说是水近屁股是挨屁崩过的，可是全家大人小孩无一人不吸扎鸦片。到日伪统治时期，家业全部扎光。后来翟成沿街乞讨，饿死在抚宁台头营的街上。

此外，有些人由于常年吸扎鸦片，不仅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同时意志衰退、道德败坏、坑崩拐

骗、拦路抢劫、男盗女娼。肖营子村杨绍修，从十多岁就开始扎烟针，为了弄到钱买鸦片，长年偷、骗、抢劫，成为当地一害，后来流窜于唐山、天津继继作案抓钱以供吸扎。由于鸦片中毒严重，终在流浪中丧生。死时年仅２６岁。二道丈子村王祥、王喜等亲哥三，因长期吸扎鸦片而无着，最后三人夜间拦路劫财，因事露被官府收监下狱，死于异乡。七区王营子村何连布，在伪满时就染上了吸扎鸦片的嗜好，家扎的一贫如洗，１９４６年携其妻外逃为匪，为给自已弄到买鸦片的钱，除四处抢劫外，还让妻子开暗娼、接客、最后身败名裂、遗臭千古。

青龙县鸦片发展史是青龙近两万烟民的倾家荡产史，是烟民的妻离子散、走死逃亡史。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我政府即着手戒烟禁毒工作，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５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热河当前禁烟工作的指示》，提出禁种罂粟、缉私鸦片、戒除吸扎三原则，并对各地明确提出建立组织、配备干部，防止鸦片流入平（今北京）、津，从严管理现存鸦片等具体方法。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９日，热河省政府即对戒烟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发出《禁止种植罂粟的指示》。中共青龙县委、县政府根据上述精神，在县区干部会上进行了贯彻、安排。许多地方，一面进行反奸清算、搞复仇，一面强制收购流散于社会上的鸦片，惩办烟贩子，对常年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烟民进行逐人登记，并对其批评、教育、限制，查抄烟毒、没收烟具、强制其参加生产劳动，运动声势很大，效果明显。１９４６年８月，国民党５２军１６０、１６１师进犯青龙，有些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土匪活动猖

藏，土改受到巨大挫折，戒烟停了下来，到１９４７年秋，随着土地复查的深入，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贯彻，戒烟运动又掀起高潮。到１９４８年年底统计，全县烟民仅剩２５２５人，种烟只涉及１３１村，５６５户，种罂粟１９１.７亩。为了彻底根除烟毒，１９４９年4月7日，中共青龙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刘保胜同志，根据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冀察热辽政办处的《戒烟令》和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热河省政府《改造烟民具体办法》，在报告中提出了彻底改造顽固烟民，进一步搞好戒烟工作的意见。会后，很快在全县范围内又打响了改造顽固烟民的攻坚战斗。到１９４９年7月统计，种罂粟已寥寥无几，烟民剩６０３人，到１９５０年底，青龙戒烟肃毒工作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毒害青龙人民的鸦片发展史宣告基本结束。

各地戒烟肃毒的方法大体是：

（１）搞宣传、抓教育，提高烟民戒烟的自觉性。在戒烟运动中，许多地方普遍坚持用党的政策开路，以思想教育领先，大会讲政策，小会搞动员，个别谈心启发烟民回顾吸扎鸦片的危害和教训，干部讲，亲友谈、家属劝，人人做思想工作。八道河、肖营子等地还聘教师编演戒烟的文艺节目，教忌烟歌。土门子、大巫岚一带小学生上街喊口号、写黑板报、作宣传，肖营子村在唱皮影时还有戒烟的内容，使全县烟民皆处于戒烟的强大社会舆论之中。这为实现全县迅速戒烟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２）抓禁种、禁贩、禁存，严加现存鸦片的管理。掐断烟民吸扎的烟源。从日本投降后，各级党委和政府曾连

续发布有关鸦片的禁种、禁贩、禁存的命令，并建立专门组织、配备专职人员进行检查、缉私、收购工作。首先，自1946年春开始，至1950年，各地每年都组织检查小组，由领导带队，深入到田间地头、山沟小岔进行检查，一经发现种植者，立即铲除。有的一年要检查两、三次乃至更多。1948年春，三区安子岭刘万顺在小山沟种了1．5分罂粟，被区委书记杨玉甫拔掉。前边拔了后边又种上了，在第二次检查时又被区里干部张稳安给拔掉，并将刘万顺送到县改造。几年里，全县铲除种植的罂粟每年都在一、二百亩，送县由公安司法改造的种烟者34人。其次，对于烟贩子，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曾在全县各车站、要路口设卡严查，对于查获者一律没收毒品，严惩人犯。四区炮手堡子地主范国政曾贩卖烟土近10两，使40多已忌好的烟民又反复，后经顺蔓摸瓜，将其抓捕归案。八区谢丈子胡满，多次贩毒也被抓捕判刑。玉田县冯家铺冯友良，在凌源买鸦片7两，装在自行车架子里。来青龙贩卖，被查获后亦交司法机关判刑，据统计，仅1949年至1950年就依法惩治烟贩子14人。再次，县里曾多次发出通令，有存烟者，限期上缴（开始是收购，后来是没收），几年里收购和没收烟毒近万两，仅五区响水、河南崔永瑞一人就交出34两。

由于禁种、禁贩、禁存，在社会上留存的烟毒越来越少。有的人虽想继续吸扎，可没有烟的来源也只好作罢。三区双山子顽固烟民朱占生、郭中富二人，在村、区忌过多次，仍不彻底，后来将二人送到县里改造好长时间，可放回后还想扎，但是弄不着烟了，朱占生外出三天仅买到5分烟土，郭中富出外好几天一厘也没买到，郭中富说，不忌也得

忌了。

此外，有些地方，戒烟与土改联系起来，农会明确宣布，凡是不戒烟的不准参加土改运动，不戒烟不分给平分物资，凡是不忌或忌而不彻底的，土地执照一律不发给本人，等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促进了戒烟工作。

（３）、采取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戒烟办法，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于烟瘾不深、吸扎轻微或老弱病者，皆采用专人负责（保人），在家限期戒除；对于烟瘾大，在家戒除有困难者，大部地方，比如肖营子、十字坪、八道河等地皆将烟民集中到村戒烟所，家里送饭，民兵负责轮流维持秩序，干部每日到场作思想工作，烟民边学习、边劳动、边反省。一般一次集中半月到二十天，有的集中两三个月；对于烟瘾深、影响大，在村里戒而不除者，全自带粮、柴、菜集中到区戒烟所，统一集训。１９４７年秋，六区大丈子公安派出所曾集中全区二百多顽固烟民于大丈子北山忌烟，八区也在十字坪集训了全区二十多名屡忌不改的烟民。都收到了良好效果；对于少数屡教不改者，或兼有贩，种等罪行的烟民，大多送县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改造。

总之，家、村、区、县四级结合的戒烟肃毒方法是很有效的，不仅使流行于青龙一百多年的烟毒基本绝迹，成千上万的烟民变成新人，而且通过戒烟肃毒教育了群众，促进了生产，巩固了民主政权。

都山设治局的成立与解体

杨金珍　佟振廷

青龙这块地方，在明代是边塞战场，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明王朝指定蒙古人在长城外二百里以内不许居住，成为林密人稀的荒凉之地。清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〇年）按圣谕满族人出冷口跑马占圈、开垦荒地，人口逐增，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年），将龙王庙、木头橙一带划归临榆县管辖；隔河头、双山子、大巫岚一带划归抚宁县管辖；肖营子、大丈子、土门子、八道河、凉水河一带划归迁安县管辖，称长城北口外地区，民国初年仍分属临榆、抚宁、迁安三县分管，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底，青龙开始成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都山设治局，老百姓称都山县，现将都山设治局（都山县）的基本状况作以记述：

一、都山设治局成立的起因

中华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各居一方、内战连年不断，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两次直奉交战，在长城内外遗留下很多枪支弹药，给当地土匪逞凶提供了武器条件，致使土匪相继兴起，闹得人心慌慌、民不聊生。农民称这些土匪为马达子。小白龙、穿山虎、滚地雷、大青山等匪号，匪众达数千人、扰乱口外、蔓延口里，其中以外号老耗子（辽宁省凌源、建昌县匪队）的土匪最猖獗，这帮土匪有三千多人，在

青龙分成多股行动，自称是哪个山头的、哪个绺子的、哪个字号的、四处骚扰，搜刮民财，打着“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幌子，实际从事坑害百姓的罪恶活动。开始他们以当地的皇粮庄头和地主老财为对象，见到这些人就抓，叫家人拿钱来赎，农民称这是绑秧子或绑票。后来不分贫富、肆意敲诈，更凶恶的是抢男霸女，很多无辜少女受其惨害，官府鞭长莫及、无力制止，在省府指令下，当地仕绅带头组织民团剿匪也未见成效。于是，一九三〇年口外地方仕绅多人向河北省请愿，要求派兵出口剿匪，河北省政府命令驻守在山海关的临榆警备司令官何柱国调动石士安、李××、赵××等六个步兵团五千多人，配合三架战斗机，会同卢龙、迁安、抚宁民团出口剿匪，经过四个多月的清剿，到同年冬基本平息了匪患，何柱国根据地方仕绅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向民国河北省政府请示，提出为了保证北口外地区的长治久安，防止再出匪患，在这块地域单独建县的请求，河北省政府报请国民党南京政府批准，准许在北口外单独建县。

二、都山设治局的区域和组织机构

（一）区域

一九三〇年底河北省政府批准，将原属迁安县长城北口外的七区大丈子、八区汤道河、九区峪耳崖、十区土门子、十一区三岔口、三区罗屯，长城外凉水河半个区；原属抚宁县北口外的界岭口堡、哑叭庄堡、双山子堡、大巫岚堡、杨树窝铺半个堡；原属临榆县长城北口外的五区干沟镇、六区龙王庙，上述地区单独划归一个区域，成立都山设治局，由它来管辖这一地区。但实际划分辖区时，何柱国又提出，义

院口与山海关在军事上，经济上有密切关系，将原临榆的北口外五区干沟镇、六区龙王庙仍归临榆县管辖，所以未纳入都山设治局范围，直至日本侵略者成立伪“满州国”以后、才将上述二区划入“满州国”的版图。

（二）局址

何柱国于一九三〇年召集北口外仕绅八道河的关墨轩、大丈子街张振羽、蔡青林、东夹子沟王继增、双山子莫旭东，高汉章等头面人物，商讨口外建县的具体事宜。经反复酝酿后确定，这个区域都山最大，就以都山命名，称“都山设治局”，管辖七个区。

一九三一年初，河北省政府由长城以南几个县抽调一批官员到口外都山设治局任职。设治局首任局长王朝凤在双山子召集设治局管辖范围内的富户，士绅开会，讨论局址设在哪里好。西部的富户、仕绅说设在大丈子好，因为大丈子背靠都山，都山有“王气”，县长以后定会“官运亨通”，前途无量，东部的富户，士绅则说设在双山子好，因为双山子南边有两座山峰，一座落凤、一座落凰。一县之长为“王”，“王”朝“凤”象征飞煌腾达。于是，王朝凤把局址定在双山子，并得到省政府的批准，从此都山设治局正式成立了。

（三）组织机构及任职要员

1、设治局：

第一任局长：王朝凤，在任一年，昌黎县人，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一年末，因种鸦片被压。

第二任局长：于锡藩，保定人，在任半年一九三二年初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后调走。

第三任局长：王珣，在任八个月，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三年二月设治局解体。

2、公安局：公安局是全县总公安机关，局下建公安各股，各区设公安分局或公安分队、分驻所，主要受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处理。

3、呈审处：是审判机关，呈审员陆××，口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被日本飞机炸死。

4、教育局（教育委员会）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局长有权提出各区教育委员，称查学员，每区建一名。全县只有龙山完小一处，初级小学计二、三十处、双山子、大丈子都没有公立学校，都是民办初级小学校，只有大丈子福音堂教堂立个公办初级小学校。可见文化教育相当落后。

5、财务局（财务委员会），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各区也财务委员，负责收款，款的来源是按耕地亩数摊派。财务局将摊派数目分摊到各区，各区再分摊到各村、各甲。

6、公安大队部，是设治局的武装力量，公安大队是由临、抚、迁边区三个县组成。大队部设在双山子镇，有五个中队共五百人，负责全县剿匪，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费用开支由临、抚、迁三县负责百分之六十，都山设治局负担百分之四十。其组织机构是：大队长由设治局长王珣兼任，大队部设军需处，文书处等，统帅五个中队，五百人，中队下设分队，配有长短枪支。

7、基层行政区域划分：

第一区：由界岭口外至大巫岚，区公所设双山子街。

第二区：包括三岔口、牛心坨、白滩沟（当丈子）、区公所设三岔口。

第三区：包括土门子、大石岭、蒿村、区公所设土门子。

第四区：包括冷口外肖营子、十字坪、八道河、西双山、大丈子，区公所设大丈子街。

第五区：包括汤道河、朝阳山、连衣栈、东梨园，沙金沟为界，区公所设汤道河。

第六区：包括峪耳崖、大地、牛心山（今宽城县境内）板城、亮甲台、安达石为界，铁门关以东，区公所设峪耳崖。

第七区：包括凉水河、三拨子、小马坪、区公所设凉水河。

三、都山设治局的解体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紧接着占领了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伪“满州国”在长春成立。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日军于一九三三年向热河、华北侵犯。一月攻战山海关，二月份分三路进攻热河，其中一路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成立了伪热河省公署，一路于三月五日从凌源县南下，沿干沟、木头橙、大巫岚方向追击败退的中国守军第十九旅、第二十旅，并派两架军用飞机在双山子都山设治局附近投下数十枚炸弹，炸毁部分民房和一些设治局机关，将设治局长王琦脖子炸伤，呈审处陆呈审炸死，从此设治局的官员不敢在此办公，离开双山子逃往口里，日军三月九日占领双山子，十日占领大丈子、十六日占领界岭口，四月十一日占领冷口，十三日占领喜峰口，都山设治局全境沦陷，七月，伪热河省公

署派以张尔舟为首的宣抚班来青龙筹建伪青龙县公署，八月伪青龙县公署成立，划入伪“满州国”热河省管辖，从此，青龙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青龙人民当了亡国奴，迁往口里的都山设治局也就不存在了。

对《皮影艺术家——李秀》一文的订正

杨　友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的事迹和评价准确，不揣冒昧和浅陋之嫌，特上微言：认为秦市《文史资料》第一集和《青龙文史资料》第二集所载《皮影艺术家——李秀》（作者朱玉石）一文有错讹之处，有必要深入调查予以订正。

其文载（市“资料”143页，县“资料”51页）：“一九三六年，李秀三十九岁——于同年去天津演出，被美国官员（不知姓名）邀请到上海，会同皮影艺人齐怀、唐满、历景阳、张绳武等，演唱了《双挂印》、《骂王朗》、《琵琶词》、《莲花庵》等影目，由美国胜利公司录制成唱片，流传美国。……”据我所知，其误有三：

一、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不在上海而设在当时的“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今长春市）。现在民间保存的大量的李秀灌制的唱片都是“胜利”出品。当时上海的唱片公司是“百代”唱片公司，李秀在“百代”公司灌制唱片与否，我不得而知，因无资料。

二、其文列举李秀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影目中最有影响、艺术成就最高的《连环计》被遗漏，因而也就遗漏了与李秀搭当的康雅亭（演貂婵）。

此外，其文中又在后面提到李秀灌制的唱片中有《洞庭湖》。据我所知《洞庭湖》的主演是生角演员齐怀。

撰写原文的朱玉石、解俊山同志（解文与朱文同，解文载《承德戏剧》都曾亲自采访过李秀先生，但那时李先生已离休回乡，年近八十，耳聋眼花，记忆很难做到准确，同时，整理者笔误也在所难免 而我之孔见又是来自世传和一些旧唱片，也不能说绝对正确，希望能够认真调查核实，以不至讹传后世、

对《赵辅臣叛变》一文的订正

阎乃庚

１９８５年政协出版的《青龙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关于赵辅臣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日占领青龙，阎乃庚为参谋总指挥问题，因为不符实际，特此声明要求更正。

一、赵辅臣叛变的队伍，在没有到秦皇岛受国民党编制以前，并未进行过编队。除了赵辅臣本人，因为他原系三纵队的团长，还称他为团长，下边的部队都是各自纠集的兵，谁有一伙人，谁当然就是队长（也称连长），但都不是正式编制，致于在团部里的一些人，谁也没有正式职务。不过，都参加会议活动。

二、根据当时的情况，赵辅臣不可能令我当总指挥，因为他亲临阵地，本身就有作战经验，他又知道我以前没有带兵打仗经验，根本不可能令我当总指挥。有人叫我阎参谋，也是因为原系三纵队的参谋，并不是新的编制。

三、文史资料即是历史，必须作到实事求是，不管是好事或坏事，都直接影响本人及子孙后代，尤其本人尚在，又是统战政策的团结对象，请政协考虑到对社会上的影响，对本人的影响，请在下一集出版文史材料时，提出更正，实为至盼。